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河海社会学 (学生版)

Journal of Hohai Sociology

32

2021 年春季号
总第 32 期

河海社会学 (学生版)

Journal of Hohai Sociology

主办：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河海社会学（学生版）》编辑部

指导老师：沈洪成

主编：孙旌程

副主编：汝艺 吴娟

编辑：童欣 刘静雯 吴晓彤 相妍 房子琪

胡麟 王岚茜 白静艳 徐婧仪 邢小龙

投稿 E-mail: sociology_hhu@163.com

刊号：校 032



欢迎扫描二维码添加关注
《河海社会学（学生版）》微信公众平台

目 录

环境研究

荒漠——绿洲地区的水生态失衡与再平衡研究..... 李万伟（5）

社会问题

超级老龄化下数字化经济助力跨越代际数字鸿沟..... 王 睿（18）

青年社会注意力的形塑机制——以抖音为例..... 董 伟 王毅杰（23）

社区互助养老研究——以大海阳社区“我家厨房”项目为例..... 王盼盼（31）

性别与家庭

民族地区家庭养老支持力的身体塑造与具身实践..... 孟 皓 王毅杰（40）

颠倒的性别与流动的性气质：饭圈泥塑行为研究报告..... 刘静雯（50）

社工专栏

异地搬迁移民社区网格化治理与社会工作：可为与不可为..... 房子琪（56）

退休人员社会关系网络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王 睿 施国庆 刘会聪（66）

书评专栏

发轫与超越：法国教育史研究的总体史观..... 刘静雯（75）

博士毕业论文摘要

善变”的“守村人”：南京市 Z 村乡村旅游发展的个案研究..... 吴 蓉（81）

母职的再生产机制.....	易彬彬 (84)
候鸟式异地养老中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功能研究.....	陈际华 (85)
政府、社区与民间志愿团体：南京文化志愿服务的运行机制研究.....	李惠芬 (86)
家族企业接班人建立权威的过程研究.....	任宇东 (87)
环境治理压力下污染型乡镇企业的行为演变.....	王 昭 (89)

新闻快讯

河海大学施国庆教授团队新冠疫情调查成果获奖.....	(17)
我校师生作品入围首届“全国 MSW 研究生案例大赛”三十强.....	(22)
亓迪副教授最新著作《中国儿童发展的组织生态研究》正式出版.....	(30)
石泉县蓓蕾天使公益协会来我院交流.....	(49)
社会学系本科生在第十七届“挑战杯”江苏省赛中斩获佳绩.....	(65)
校地合作，共建共赢——我院签约五老村街道“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	(74)



荒漠-绿洲地区水生态的失衡与再平衡研究

李万伟¹

摘要:新疆塔里木河流域棉花大规模种植,推动“绿洲化”过度、过快发展,破坏了荒漠-绿洲水生态平衡,导致绿洲荒漠化风险急剧上升。市场经济自发调节、国家政策支持、地方政府圈地谋利、种植户理性选择是推动环境问题产生的主导因素。塔里木河下游生态危机促使地区社会生态转型,通过实施荒漠-绿洲水生态再平衡策略,扭转了从“绿洲化”到荒漠化的恶性反馈机制,实现了荒漠-绿洲地区生态环境的向好转变。

关键词: 水生态平衡 塔里木河流域 绿洲化 荒漠化 棉花种植业

一、导论

绿洲是荒漠中有水源,适于植物生长、人类居住或暂驻,可供人类进行农牧业和工业生产等社会经济活动的地区^[1]。绿洲是干旱区人类社会生存与生活的基础,干旱区的开发与农业活动,均与绿洲存在直接的联系。在我国 222 万 km² 的干旱区中,绿洲面积仅占 3-5%,却抚育了干旱区 90%以上的人口,创造了 95%以上的工农业产值^[2]。在我国新疆荒漠-绿洲地区,绿洲农业开发历史悠久,早在 5 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活动。西周时期,青铜器工具开始普及,农耕经济有所发展。唐朝时期,铁农具得到广泛使用,水稻、棉花在西域各地广泛种植。1884 年新疆建省以后,清政府在新疆扩大屯田,到 20 世纪初,全疆人口达到 216 万,熟地面积达到 1055 万亩^[3]。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绿洲农业进入更高速的发展阶段,1949-2015 年,新疆人工绿洲面积由 2 万 km²,增长到 9.54 万 km²,耕地面积由 1815 万亩增长到 6287 万亩。到 2018 年,全疆耕地面积达到 7863 万亩,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12199 亿元。在新疆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第一产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由 1978 年的 19.12 亿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3637.78 亿元,年平均增速达到 14.4%^[4]。

不过,颇为悖谬的是,在我国西部干旱区人工绿洲面积迅速增加的同时,荒漠化土地面积也在急剧增加。据第五次中国荒漠化和沙化状况监测结果,截止 2014 年,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达到 261.16 万 km²,沙化土地面积达到 172.12 万 km²,主要分布在新疆、内蒙古、西藏、青海、甘肃 5 省(自治区)²。其中新疆自治区荒漠化土地面积 107.06 万 km²,沙化土地面积 74.71 万 km²,均占全国总面积的 40%以上。从荒漠化和沙化的总体趋势来看,与 1994 年全国第一次荒漠化与沙化监测结果相比,新疆自治区荒漠化土地面积由 79.59 万 km² 增长到 107.06 万 km²,沙化土地面积由 52.05 万 km² 增长到 74.71 万 km²,平均每年新增荒漠化土地面积 1.37 万 km²。近年来,新疆土地荒漠化和沙化程度虽有好转,但沙化土地在南疆塔里木河流域仍有扩展。与 2009 年第三次监测结果相比,轻度、中度、重度荒漠化虽

¹本文已刊发于《云南社会科学》2021 年第 2 期。

²数据来源: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政府网 <http://www.forestry.gov.cn/main/65/20151229/835177.html>

然有所减少，但是极重度荒漠化增加 52.55km²；轻度、中度沙化有所减少，但重度、极重度沙化增加了 1782.86km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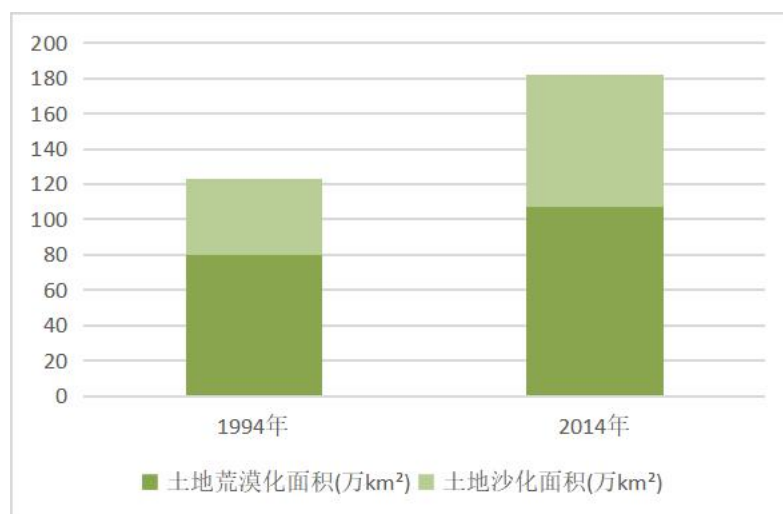


图 11994-2014 年新疆土地荒漠化与沙化状况

西部干旱区绿洲与荒漠同时性扩张的格局，根源在没有处理好荒漠与绿洲的关系，破坏了荒漠-绿洲的水生态平衡。山地-绿洲-荒漠复合系统是我国西部干旱区的生态基础，其中山地是基础，集结、提供水源；绿洲是核心，是干旱区生物和人类生活的聚集区；荒漠是屏障，是绿洲存在和发展的后备基地^[5]。在复合生态系统中，绿洲存在于荒漠之中，彼此对立，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互向对方转化。水资源合理分配是保持荒漠-绿洲生态平衡的关键，一旦绿洲用水过多，就会导致荒漠-绿洲过渡带植被缺水死亡，荒漠向绿洲方向侵袭，绿洲逐渐退化为荒漠。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水资源在荒漠、绿洲之间自然分配，荒漠-绿洲地区生态系统处于天然平衡状态。50 年代以后，随着人工绿洲面积扩大，水资源分配朝绿洲倾斜，荒漠-绿洲水生态平衡被打破，导致荒漠-绿洲过渡带被破坏，绿洲外围土地荒漠化面积占比急剧上升。

“绿洲化”与荒漠化，不仅是自然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在西部干旱区，水资源分配不均现象天然存在，河流从山区流向绿洲再流向荒漠，绿洲获得的水量自然多于绿洲下方向的荒漠。随着人类活动干预，社会水循环增强，自然水循环减弱，水资源分配中的“马太效应”愈加明显。“绿洲化”与荒漠化，既表现为两种自然生态系统的演变，也表现为一种社会干预过程，是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制度框架下由人类社会行为持续推动的结果。作为西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绿洲化”的发展具有独特、复杂的社会机制，既有生产方式的变革，制度政策的引导，市场经济的刺激，也有科学技术的推动。那么，什么是“绿洲化”？西部干旱区为什么会发生“绿洲化”？推进“绿洲化”的社会机制是什么？为什么“绿洲化”之后会发生荒漠化？深入理解这些问题，对于促进西部干旱区在内的生态脆弱区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在我国西部干旱区环境问题研究中，有关“绿洲化”、荒漠化的研究已有很多，但目前的研究尚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大多数是对“绿洲化”、荒漠化单独进行研究，较少从关系的视角去考虑二者的相互影响。在 CNKI 以“绿洲化”、“荒漠化”、“绿洲化&荒漠化”为主题进行文献检索，其中“绿洲化”文献检索到 159 条，“荒漠化”文献检索到 6350 条，“绿洲化&荒漠化”只检索到 64 条。1987 年，赵松乔提出“绿洲化”概念，并第一次把“绿洲化”与荒漠化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指出“绿洲化”和荒漠化在西北干旱区是两个相反相成的过程，决定因素是人^[6]。此后，只有汪久文^[7]、黄培祐^[8]、贾

铁飞^[9]、王涛^[10]等少数学者明确将“绿洲化”与荒漠化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并将“绿洲化”纳入荒漠化的成因中去分析。二是对“绿洲化”及荒漠化的研究多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对“绿洲化”及荒漠化发展的社会逻辑研究不足。在“绿洲化”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绿洲化”过程中的景观格局变化、土壤要素变化和气象水文要素变化三个方面^[11]。在荒漠化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荒漠化防治方面，从具体的技术层面来研究荒漠化防治^[12]。按学科分类，主要集中在环境、生态、地理、林学、草学等自然学科，社会科学领域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

因此，本研究着重从“绿洲化”与荒漠化的关系入手，从社会层面对西部干旱区环境问题的成因与应对进行研究。研究方法主要是田野调查、深度访谈、文献搜集等，研究的经验材料来自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的田野调查，通过深度访谈棉农、种植大户、政府官员、团场职工及其他相关人群，获取大量一手资料。同时，查阅了大量的地方志，中央及地方政府发布的政策、规章等文本资料。研究跨度集中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因为这一时期是塔里木河流域“绿洲化”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绿洲荒漠化风险急剧上升的时期。

二、荒漠的“绿洲化”及其荒漠化风险

“绿洲化”，是指在干旱地区以扩大地面植被覆盖率，增加单位面积土地上以绿色植物为主体的生物产量的过程^[13]。“绿洲化”分为天然“绿洲化”与人工“绿洲化”两种类型。天然“绿洲化”，是指受地形影响，使本来十分干旱的地区，局部重新分配了有限的水分，而使某些地段汇集了较丰富的地面水或地下水，为绿色植物提供了较好的生境，从而形成了最早天然绿洲。人工“绿洲化”，是指人们通过有目的的行为，人为改变某些地域的水分条件与植物种类，从而大大提高了这一地域的植被覆盖率与生物产量，最终导致人工绿洲的出现。与荒漠和天然绿洲相比，人工绿洲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人工渠道代替了河流，二是人工水库代替天然湖泊，三是人为成土过程代替了自然成土过程，四是人工植被代替了天然植被。我们在这里研究的“绿洲化”，主要是指发生在近代以来的人工“绿洲化”。

由于气候干燥少雨，荒漠化是我国西部干旱区生态演替的常态，作为荒漠化逆过程的“绿洲化”，在影响范围及规模上均远逊于荒漠化^[14]。但是，由于自然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干预，两者之间经常呈不稳定状态。在荒漠化占优势的地区，某些局部地段或某些历史阶段，“绿洲化”也可暂居优势；以“绿洲化”为主的地区，有时也包含荒漠化因素；有时荒漠化又与“绿洲化”相互交叉在一起，人们改造荒漠为农田，同时绿洲也会产生严重干旱、盐碱、风沙等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塔里木河流域的绿洲与荒漠互相纠合，先是“绿洲化”后来居上，继而荒漠化卷土重来，最后“绿洲化”与荒漠化齐头并进。在这种相反相成的过程中，“绿洲化”成为荒漠化的诱因和主导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来，塔里木河流域“绿洲化”不断推进，人工绿洲面积不断增长。1949 年塔里木河流域有人工绿洲面积 1.31 万 km²，1998 年扩至 2.81 万 km²，2010 年增长到 4.41 万 km²。从增长类型来看，人工绿洲面积的最大增加类为各类耕地面积的增加，绿洲面积的扩张表现为耕地空间扩张的特点^[15]。从增长阶段来看，以 1990 年为界，可分为慢速增长、快速增长两个时期。1950-1990 年，塔里木河流域耕地面积由 1261.12 万亩，增加到 1897.52 万亩，40 年时间增加了 636.4 万亩，年均增长 15.91 万亩；1991-2018 年，塔里木河流域耕地面积由 1908.89 万亩，增加到 3601.59 万亩，28 年时间增加了 1692.7 万亩，年均增长超过 60 万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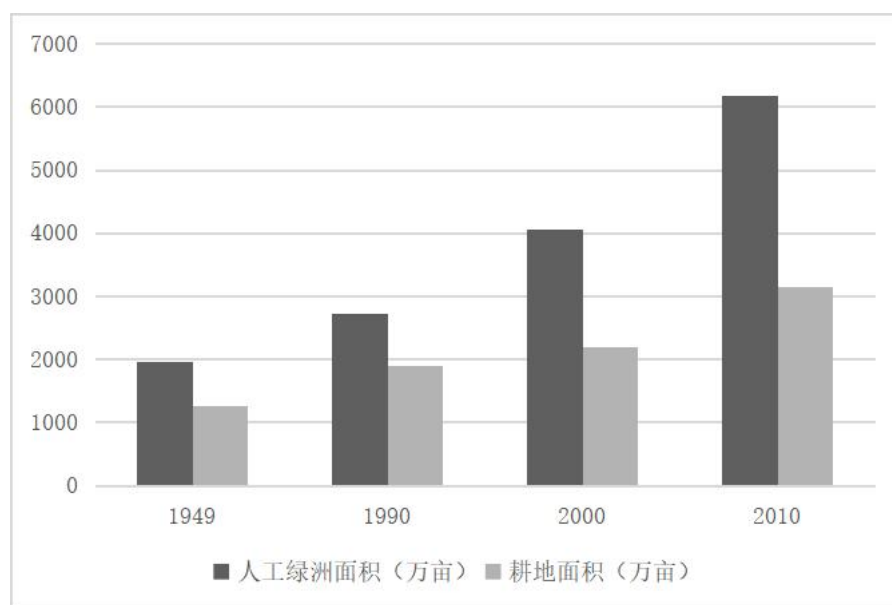


图 21949-2010 年塔里木河流域人工绿洲及耕地面积情况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塔里木河流域“绿洲化”快速推进，与棉花种植业在新疆的扩张密切相关。1990 到 2018 年，新疆棉花种植面积从 653 万亩增长到 3737 万亩，占全国棉花种植面积由 7.79% 增长到 74.27%，棉花产量也从 46.88 万吨增长到 456.6 万吨，占全国总产比例由 10.4% 增长到 80.79%。棉花单产、总产量、调出量连续 25 年稳居全国第一。在西藏自治区内部，由于各种原因，塔里木河流域成为全疆棉花种植面积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1990-2018 年，塔里木河流域棉花种植面积从 446 万亩增长到 2336 万亩，从库尔勒到阿克苏、喀什、和田，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种植带，棉花种植面积占新疆棉花种植面积的 2/3 以上，占全国棉花种植面积的 1/2 以上。同时，就流域内部的种植结构来看，棉花种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比例从 23% 增长到 65%，植棉比超过 65% 的棉花主产区多达 9 个。这一时期，“绿洲化”模式发生了变化，从传统时期对天然绿洲的开垦，转向对沙漠、戈壁、盐碱等不宜于利用土地的开垦。1988-2007 年，新疆新垦荒地 1443 万亩，其中塔里木河流域新垦荒地 751 万亩，极大推动了“绿洲化”的发展。

棉花种植业在塔里木河流域的扩张，最大的动因是经济利益。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国家政策的宏观调控、地方政府的发展需求、种植户的理性选择是推动塔里木河流域“绿洲化”的主要社会机制，其具体推动作用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市场经济的“推-拉”和国家政策的支持。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棉花主产区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其棉花播种面积和总产均占到全国总量的 50% 以上。1992 年，华北地区农用生产资料上涨过快，棉花生产成本增加，棉花收购价格反而比上年下降，棉农种植棉花的积极性受到影响。同年，棉铃虫特大爆发，棉花产量大幅度下降，给棉农带来巨大损失，棉花播种面积锐减。另一方面，由于蔬菜、水果等农产品经济效益远高于棉花，山东、河北两省进行了种植结构调整，也加速了棉田面积的缩减。1995 年，新疆自治区被中央政府确立为国家优质棉发展基地，自治区政府随即提出“一黑一白”开发战略，在全区推广地膜覆盖技术，引进推广宽膜植棉、化学调控技术，使棉花单产大幅度提高。从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来看，新疆棉花与其他主要农产品相比具有较明显的比较收益优势^[16]，与其他棉区相比具有较强的成本竞争优势。1989-1998 年，国家先后 7 次上调棉花收购价格，1999 年棉花市场放开后，新疆棉花价格继续上升，2000 年 4 月，棉价最高达到每公斤 13.8 元。相对较高的经济收益吸

引了大批农民、种植大户、企业到新疆承包土地，进行垦荒植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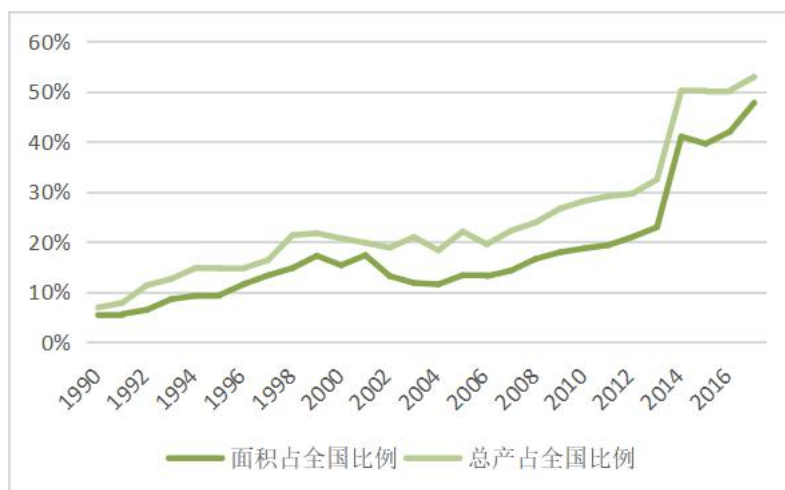


图 3 1990-2017 年塔里木河流域棉花播种面积、总产占全国比例

其二，利益导向的圈地开荒。市场化改革以后，新疆地区地方财政除国家转移支付外，尚有很大缺口。在南疆塔里木河流域，土地是最丰富的资源，随着棉价上涨，开荒植棉，发掘土地的经济效益，就成为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首要选择。2001 年之前，塔里木河流域的国有土地开垦审批权主要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政府为了自身利益，默许各部门、各单位私下开荒，一时之间，塔里木河干流两岸布满地方政府各部门的“飞地”和“小金库”，并出现大量“示范田”、“试验田”等各种名目的垦荒田。通过垦荒植棉或者将开垦权转卖给他人，政府部门都能获取一定程度的经济收入。棉花西进吸引了大批农民、企业来到新疆包地垦荒植棉，但这种淘金式的土地开荒并非人人都可参与，谁能从政府手里拿到允许开荒的“条子”³，才能从开荒致富的锅里分一杯羹。一些有头脑、有资本的农民、企业，通过拉人情、走后门等方式从政府手里拿到土地开荒的“条子”，率先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目前，塔里木河干流 60%的棉田属于种植大户。2001 年以后，国务院要求新疆塔里木河流域“不再扩大农业灌溉面积”，自治区政府也明确规定“塔里木河流域内一律停止开荒”、“塔里木河干流区严禁土地开发”，但是地方层面的垦荒一直未曾停止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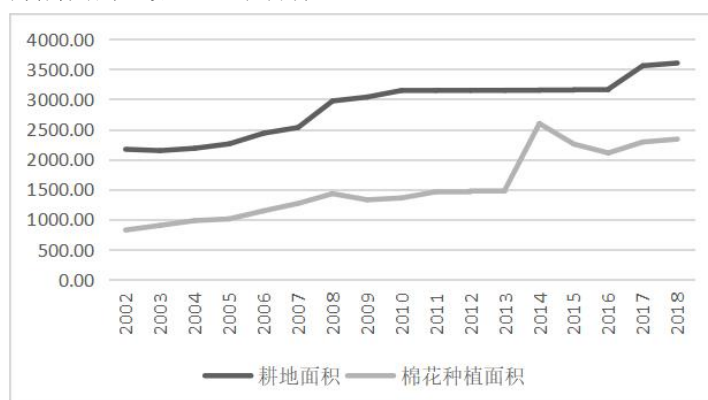


图 4 2002-2018 年塔里木河流域耕地及棉花种植面积趋势

³ “条子”，是指政府国土资源部门开具的，允许个人或单位开垦国有土地的批条。

⁴ 2001 年以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年鉴》，2007 年以后，《新疆统计年鉴》均不再统计新垦荒地面积，但是耕地面积一直保持增长，截止 2018 年，塔里木河流域耕地面积达到 3601.59 万亩，棉花种植面积达到 2335.52 万亩。

其三，农户生计的理性化选择。市场化改革以来，棉花种植业逐渐成为塔里木河流域农户的主要生计方式，棉花收入占农户收入比例达到 50%-70%，在某些棉花主产区，这一比例甚至达到 90%以上。农户选择棉花而不是粮食作为主要种植作物，是市场经济理性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关于这段历史，笔者在尉犁县做调查时，一位访谈对象做了如下回忆：“棉花真正起来是 85 年往后，藏着掖着种，改革开放以后，内地发展经济的影响逐渐传了过来，当时县上还不让种棉花，这么高的棉花要犁掉。我们这边盐碱大，种麦子种一瓢收半瓢，一浇水就死，种 10 亩可能就死 9 亩，种棉花不管贵贱，拉到棉花厂就能卖钱。种麦子是任务，交公粮不能少，没有办法，只能不守规矩，不好的地种麦子，2 月份种麦子，4 月份浇地，麦子一死就上报，死了怎么办，那就种棉花呗。”⁵在农户的理性选择下，棉花取代粮食成为塔里木河流域最主要的种植作物。1985-2017 年，流域棉花种植比例从 14.01%增长到 66.85%，粮食种植比例从 64.32%降到 33.67%。较高的经济效益，刺激种植户从粮食种植转向棉花种植，也刺激他们寻求更多的耕地，越来越多的种植户涌向塔里木河两岸，私自开荒或者承包国有土地。随着草场家庭承包制改革，以游牧为生计的牧民也卷入开荒植棉的热潮。据笔者调查，塔里木河岸边一家地方国营牧场，1990 年该牧场有草场 76 万亩，到了 2017 年只剩下 55 万亩，其中有 20 万亩已被牧民转卖或自己开垦成耕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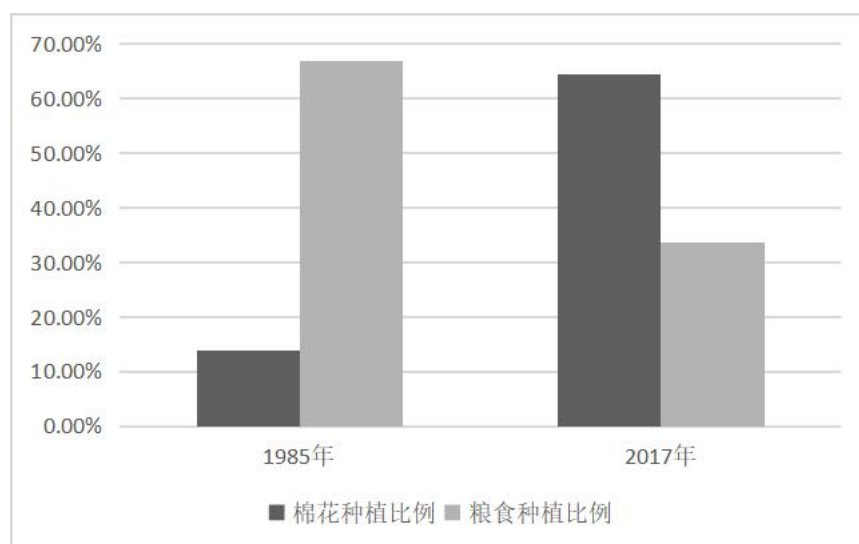


图 5 1985 年、2017 年塔里木河流域棉花与粮食种植比例

棉花种植业的扩张加速了塔里木河流域的“绿洲化”进程，也促进了干旱区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绿洲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是以绿洲荒漠化风险急剧上升为代价的。绿洲荒漠化风险上升，原因在于荒漠-绿洲水生态平衡被破坏，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棉田开垦，破坏大量荒漠植被，导致荒漠植被抵御风沙、保护绿洲的功能下降。在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地下潜水位沿河道向外不断递减，随着地下潜水位变化，自然植被以及土壤也呈现为圈层分布。由内向外，地表植被由水生植物向盐生植物演变，地表土壤由水成性土壤向流动沙地转变。水的变化导致环境植被梯度变化，群落间的渐变表明存在生态过渡带，也就是说，依水而生的绿洲与荒漠之间存在着一条生态过渡带。这条生态过渡带的生态十分脆弱，它最容易受到自然和人类活动的影响，既有可能演变为绿洲，也有可能演变为荒漠。塔里木河流域开垦之前，河道两岸，植被茂密，

⁵资料来源：2018 年 4 月 21 日，尉犁县 DKT 乡 QKL 村村民 SZG 访谈 1。

胡杨林与灌丛、草甸构成宽达数公里的绿色植被景观，这一绿色带为保护绿洲社会生产提供了重要屏障。开垦以后，由于毁林造田、砍伐取材和引水灌溉，胡杨林绿带遭到重大破坏。荒漠-绿洲过渡带被破坏，导致干旱、疏松的土地失去植被保护，在风力作用下很容易沙化。

第二，棉花种植业发展，消耗大量水源，导致荒漠植被缺水死亡。棉花种植业大量耗水，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棉花作为高耗水农作物，生长期需要水量较大。塔里木河流域种植结构中，小麦、玉米、棉花作为大宗种植作物，占到农作物播种面积的 90%以上。以生物需水量计算，三种农作物的亩均耗水量分别为 260m³、210m³、420m³，也就是说，棉花的亩均耗水量约为粮食作物的两倍。其二，棉花作为经济作物，其经济效益远超粮食作物，种植户为了获得更高产量，倾向于增加灌溉用水量。目前，塔里木河流域皮棉亩产约为 160 kg，据农学实验计算，每生产 100 公斤皮棉需要 450m³水量⁶，每亩棉田则需要耗水 720m³。在推广节水灌溉之前，棉农普遍采用大水漫灌的方式灌溉棉田，加之渠系利用系数较低，每亩棉田耗水量达到 800m³以上。其三，棉花种植面积不断增长，占耕地总面积比例不断提升，从而导致棉田用水总量不断增加。1990 年，塔里木河流域棉田面积为 446 万亩，2018 年，增长到 2336 万亩，增长了 1890 万亩，平均每年增长 67.5 万亩，以每亩棉田耗水 800m³来算，每年要多耗水 5.4 亿 m³。

棉田面积扩张，各源流灌区引水量增加，导致流入干流的水量急剧减少。在塔里木河干流区域，地方政府为发展棉田灌溉，先后开挖平原水库 7 座、大小引水渠 134 条，对过境水量层层截留，导致下游水量不断减少。随着上游来水减少，塔里木河下游地下水水位下降至 12 米以下，河道两岸天然植被逐渐死亡，胡杨林面积由 60 年代的 81 万亩减少到 11 万亩，减少了 86.4%。土地沙漠化面积从 60 年代的 66%上升到 85%。随着绿色走廊朝荒漠化方向发展，受荒漠植被保护的人工绿洲也深受风沙侵害。据下游气象站资料显示，农二师塔里木垦区 80 年代以前没有大的灾害性天气发生，80 年到 88 年灾害性天气增多，90 年代以后，大风天气和沙尘暴次数明显增多，给绿洲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危害。受塔里木河下游来水量减少和风沙灾害影响，塔里木垦区耕地面积由 60 年代的 50 余万亩减少到 38 万亩，位于垦区边缘的 34、35 团场一度准备弃耕搬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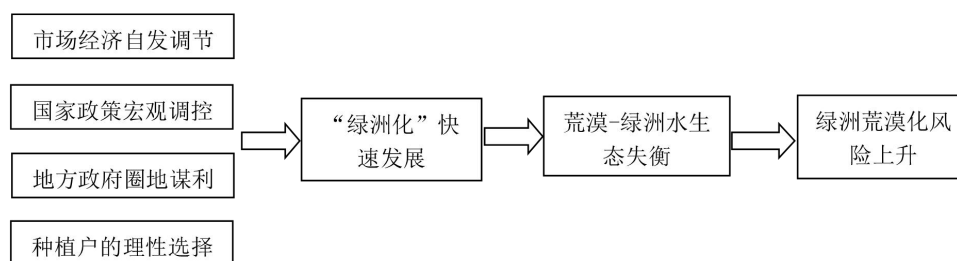


图 6 西部荒漠-绿洲地区环境问题的传导链条

综上所述，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西部荒漠-绿洲地区环境问题的演变形成一条明显的传导链。在市场经济自发调节和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新疆地方政府与种植户为了经济利益扩大棉花种植面积，促进塔里木河流域“绿洲化”快速发展。“绿洲化”过度、过快发展消耗大量水源，导致荒漠-绿洲水生态失衡。荒漠-绿洲水生态失衡又导致绿洲荒漠化风险上升，绿洲环境恶化，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我国西部干旱区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因此，要扭转这一趋势，必须切断环境问题的传导机制，重建荒漠-绿洲水生态平衡，促进荒漠与绿洲的共生共存，实现干旱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

⁶资料来源：2018 年 4 月 21 日，尉犁县 DKT 乡 QKL 村村民 SZG 访谈 1。

三、荒漠-绿洲水生态再平衡策略

绿洲荒漠化风险上升，根源在于没有处理好荒漠-绿洲的关系，破坏了荒漠-绿洲的水生态平衡。人类与荒漠的正确关系应当是，人与荒漠和谐共生，既要避免荒漠化，也不要盲目进行“绿洲化”。塔里木河下游生态环境恶化，引起了人们对荒漠-绿洲之间关系的反思，地方政府开始从推进“绿洲化”转向控制“绿洲化”，并通过控制人工绿洲面积、减少绿洲用水、向荒漠进行生态补水等措施，促进荒漠-绿洲水生态实现再平衡。

（一）荒漠-绿洲关系的再认识

一个地区环境问题的治理，往往与当地社会出现生态转型密切相关。认识生态转型的过程及其基本特征，对于环境问题的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绿洲化”导致塔里木河下游生态危机，倒逼地方政府对荒漠-绿洲的关系进行再认识。

长期以来，在地区经济发展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导下，西部干旱区的荒漠都被认为是“潜在绿洲”。地方政府只重视荒漠的后备生产功能，没有认识到荒漠植被对绿洲生态的保护功能。1990-2015年，新疆人工绿洲面积从6.04万km²，增长到9.54万km²，超过1/2的人工绿洲面积来自于对绿洲外围荒漠植被的开垦，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西部干旱区的“绿洲化”已经超出改造天然绿洲的界限，突破荒漠-绿洲生态过渡带，向荒漠进军。然而，征服荒漠并没有带来“人尽沙退”，反而导致新垦绿洲更快速度的沙化。原因在于荒漠野生植被是在长期与风沙盐碱作斗争中形成的，它们抗旱抗碱抗风沙的能力，不是生长在绿洲之内的植被所能比拟的。荒漠植被的破坏导致人工植被直接暴露在干旱区恶劣的生态环境之下，因缺水导致的土地撂荒进一步加剧了耕地的沙化。

塔里木河下游绿洲荒漠化风险的上升，促使地方政府对绿洲与荒漠的关系进行了反思，认识到绿洲健康、持续发展离不开荒漠植被的保护，地区发展政策也从“征服荒漠”转向“保护荒漠”。保护荒漠，其实就是保护绿洲。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大风沙、干旱天气屡屡袭击塔里木河下游人工绿洲，农二师塔里木垦区棉花生产受到极大破坏，灾害引起的经济损失高达8000亿元。土地荒漠化及自然灾害高频发生，与绿洲外围的荒漠植被减少有密切关系。自此，保护荒漠植被纳入地方政府的生态保护日程。在生态转型中的类型中，这种遇到困难而后认识到生态与经济可以实现共赢的类型属于“生态利益后觉”，虽然它仍是以人类的利益为中心，但它兼顾了人类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对实现更高层级的“生态自觉”仍有重要意义^[17]。绿洲农业，基本上就是生态农业，寻求生态与经济的共赢关系，就是寻求荒漠与绿洲的和谐共生关系。新世纪以来，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对荒漠-绿洲的关系进行了再认识，为干旱区环境问题的治理提供了认知保障。

（二）荒漠-绿洲增减的再平衡

近几十年来，塔里木河流域生态景观发生了巨大变化，总体呈现为“两扩大，一缩小”的局面，即人工绿洲与荒漠同时扩大，而处于两者之间的生态过渡带缩小^[18]。这种变化削弱了生态过渡带对人工绿洲的保护作用，增加了绿洲荒漠化的风险，也不利于干旱区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控制人工绿洲尤其是耕地面积的增长。

第一，要从法律法规方面禁止垦荒，控制人工绿洲面积增长。受经济利益驱使，流域内长久以来都将大规模土地开发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大部分人认为，流域内土地资源很丰富，不开发就可惜了，往往忽略了生态过渡带的生态功能和水资源的有限性。大规模土地开发，导致上游绿洲农业用水剧增，下游荒漠植被缺水死亡，如果开荒行为得不到有效制止，下游绿洲的荒漠化现象将会更加严重。2001年6月，国务院在《塔里木河流域近期综合治理规划报告》批复中明确要求“流域内经

济发展要充分考虑水资源条件，积极稳妥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不再扩大农田灌溉面积”。2005年，自治区政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条例》（修订版）第九条对禁止开荒做出了明确规定：“未经国务院或者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流域内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垦荒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非法开垦的荒地供水、供电。”这一规定对禁止开荒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一是通过提高开垦荒地审批层次，堵上了地方政府通过审批谋利的口子；二是土地垦荒必须要进行灌溉，而灌溉抽水设备大都需要电力带动，通过控制供电，就切断了开荒引水的可能。

第二，要从制度保障方面查处违法垦荒行为，建立禁止垦荒的考核制度保障。受新疆棉花价格上涨的影响，2000-2004年，塔里木河干流区新开荒地13万亩，其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荒8万亩，地方开荒5万亩。此后，非法开荒现象屡禁不止，耕地面积不断增大。大部分种植户认为，开荒后，即使政府对其进行罚款，但继续耕种带来的收益更大，监管人员也不可能长期看守，过了风头便可以照样耕种。2013年，自治区政府下发《关于严禁非法开荒的通知》，明确各级政府组织各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及时发现和制止非法开荒行为⁷，并将制止和查处非法开垦行为纳入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范围。实行联合执法机制和责任制后，各地非法开荒行为得到了有效的制止。截止2017年，位于塔里木河下游的尉犁县累计查处各类违法开荒案件315件，非法开荒面积1.58万亩，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达79件，行政处罚236件，收回土地1.2万余亩。执法行为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塔里木河流域非法开荒的势头。

（三）生态-生产用水的再平衡

实现荒漠-绿洲水生态再平衡，核心在于重建生态-生产的用水平衡，因为水是绿洲生存的基础，是决定绿洲规模的关键因子。控制绿洲规模，关键在于减少绿洲生产用水，同样，恢复荒漠植被，关键也在于增加荒漠生态用水。

第一，推广农业节水技术，提高水价，控制绿洲生产用水。棉田扩张是绿洲生产用水增加的根本原因，理应调整作物种植结构，压缩棉花种植比例。但是塔里木河流域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棉花种植业是实现当地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环境问题与乡村振兴互相纠合，要避免乡村的衰落就需要将乡村产业嵌入当地的生态系统中^[19]。自治区政府以经济效益为诱导，推进节水灌溉，以水价调整为杠杆，提高用水效率，为实现生态-经济双赢做出了实践指导。

20世纪80年代以前，塔里木河流域农田灌溉方式一直是大水漫灌。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家对农业节水事业的高度重视和灌溉技术及设备的不断完善，塔里木河流域节水灌溉事业水涨船高，各种形式的喷灌技术均有应用^[20]。1998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结合地膜覆盖技术和滴灌技术，发明了棉花膜下滴灌技术。与传统大水漫灌方式相比，棉田膜下滴灌可节水80%以上。除高效节水外，膜下滴灌技术还可以给种植户带来5项经济效益：其一，相较于常规灌溉，每亩棉花可增产20-35%；其二，化肥随水直接进入棉花根系范围，化肥利用率提高30-40%；其三，减少了开沟、中耕、打药等机耕作业环节和次数，农机作业量节省30%；其四，有效抑制杂草滋生，降低劳动力投入和农药使用次数；其五，采用管道输水，田间不需修斗、农、毛渠及埂子，土地利用率提高5-7%^[21]。据调查统计，采用膜下滴灌后，每亩棉田可为农户增收300元以上。在经济效益的诱导下，膜下滴灌逐渐成为塔里木河流域棉田主要灌溉方式。2013-2017年，塔里木河流域农业节水灌溉面积从1148万亩增长到1557万亩，其中棉田膜下灌溉比例占到90%以上。按每亩棉田采用膜下灌溉节省亩均定额80%水量，棉田

⁷资料来源：库尔勒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xjkel.gov.cn/gk/zcfg/gfxwj/fzbfw/186431.htm>

膜下灌溉面积占总节水灌溉面积 90%计算, 采用膜下灌溉每年可为塔里木河流域节省生产用水 67.26 亿 m^3 。

塔里木河流域生产用水过多,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水资源价格不合理造成的。长期以来, 当地群众把水资源当作自然的公共资源, 认为可以自由地取用。当地政府一直以来也把水资源开发当作公益性事业, 没有水资源商品意识和基本的市场经济意识。水的商品意识极其淡薄, 大量的水资源被无偿占有、低价使用。2003 年, 自治区政府核定了塔里木河干流区的水价, 由于确定的水价偏低, 只有 0.0039 元/ m^3 , 水的特殊商品属性没有体现出来, 水价低廉的结果实际上鼓励了用水, 进而鼓励了农业开荒行为^[22]。为提高用水效率, 促进节约用水, 2010 年, 自治区政府对塔里木河干流区农业供水价格进行了调整, 由原先的 0.0039 元/ m^3 调整为 0.019 元/ m^3 , 并开始实行超定额用水累进计价制度。超过定额 20% 以内 (含 20%) 的部分, 按照上述水价的 2 倍计收水费; 超过定额 20 以上的部分, 按照上述水价的 4 倍计收水费; 未经批准擅自占用生态用水的单位和个人, 按照上述水价的 10 倍计收水费^[23]。超定额用水累进计价制度实施以后, 塔里木河流域的种植户为了节省水费, 主动采取节水措施, 将亩均用水量从 627 m^3 /亩降到 501 m^3 /亩, 从而间接减少了绿洲生产用水总量。

第二, 改革流域管理体制, 向下游进行输水, 增加荒漠生态用水。据统计, 塔里木河下游荒漠植被恢复, 年均需水量应达到 6.95 亿 m^3 。为实现这目标, 必须建立流域性水资源管理体制, 实行全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 定额分配各地用水量, 优先保证下游生态需水量。

新中国成立以来, 塔里木河流域管理体制经历过三个阶段: 行政区域管理阶段 (1949-1991 年); 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 以区域管理为主的阶段 (1992-2010 年); 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 区域管理服从流域管理的阶段 (2011 年至今)^[24]。在前两个阶段, 流域管理体制以行政区域管理为中心。地方政府及生产建设兵团为了本地社会经济发展, 无序开发利用水资源, 使得塔里木河源流进入干流的水量不断减少, 下游生态环境恶化。1992 年, 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成立, 负责全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 但是源流依然分属各地区管理, 管不住源流, 塔里木河就是一条“干水沟”。2011 年, 为实施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 自治区将四个源流管理机构建制移交给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 由其进行直接管理和控制。这一举措使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管理体制, 跳出了以行政区域管理为中心的“小流域”管理体制, 开始从“大流域”高度进行机制创新。流域性水资源管理体制的建成, 结束了流域各地无序引水的乱局, 为实施水资源统一调度, 向下游进行生态输水提供了坚实保障。

自 2000 年开始, 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对荒漠-绿洲水资源进行合理分配, 先后组织 20 次向塔里木河下游实施生态输水, 累积输送生态水 81 亿多立方米, 水头 15 次到达台特玛湖, 使下游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同生态输水前相比, 2000-2017 年监测数据显示, 塔里木河下游距主河道 1km 范围内地下水埋深由 9.8-10.1 米回升到 2.1-5.3 米, 随着地下水位抬升, 地下水的水质也日益好转, 距主河道 1km 处的地下水矿化度由 5.3-7.8g/L 降至 1.1-3.0g/L, 水环境得到明显改善。遥感监测显示, 下游植被恢复和改善的面积达到 342.75 万亩, 其中新增植被覆盖面积 54.3 万亩, 植被盖度增加最高的英苏一带增量达 5 倍以上, 沙地面积减少 130 万亩, 曾经干涸的台特玛湖一度达到 511 km^2 的水面和湿地^[25], 大量的盐渍化耕地得到改良, 以往难觅踪迹的野生动物也已常见。

四、结论与讨论

我国西部荒漠-绿洲地区环境问题的产生, 各种因素环环相扣, 形成一条传导链条。在这条传导链条中, 市场化的社会机制是主导因素, “绿洲化”是发展过程, 荒漠-绿洲水生态失衡是绿洲荒漠化的直接原因。解决这一环境问题, 就必须扭转从“绿洲化”到荒漠化的恶性反馈循环。面对塔里木河下

游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局面，政府对荒漠、绿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再认识，以重建荒漠-绿洲水生态平衡为抓手，通过推广节水灌溉技术、提高农业水价、改革流域管理体制、向荒漠进行生态输水等具体措施，控制了“绿洲化”的快速发展，也遏制住了绿洲荒漠化风险的继续上升。

新世纪以来，西部干旱区荒漠-绿洲水生态再平衡策略取得显著效果，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环境明显好转。但在保障荒漠-绿洲生态平衡的水资源方面，仍有几点风险需要讨论。

第一，从水资源的来源来看，塔里木河流域的水源主要以冰川融水和积雪融水为主，冰川融水约占其径流总量的 38.5%^[26]。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塔里木河流域各支流冰川融水都有增加趋势，尤其 2000 年以后，冰川融水径流量达到历史最高时期，平均融水径流量达 180.4 亿 m³，高出多年平均值 20.1%^[27]。冰川融水的增加导致源流出山水量的增加，塔里木河流域径流总量有所增加，但是水量增加背后却是冰川面积的退缩，近 40 年来，除阿克苏河外，各源流退缩冰川总面积占量算冰川总面积的比例均在 50%以上，叶尔羌河甚至高达 81.2%。径流量增加为解决流域水资源供需不平衡带来了帮助，但是其水资源不确定性问题有所增加，未来的气候变暖将或许会加剧干旱区水资源短缺的情形。

第二，从水资源使用来看，自 2001 年流域综合治理开展以来，虽然水资源过度开发受到严厉制约，但是社会经济发展需水总量一直呈增加态势，流域用水总量呈年均 1.9%的增长态势^[28]，水资源供需矛盾还将进一步加剧。由于棉花种植业依然是塔里木河流域绿洲经济的主导产业，水资源挤占生态环境用水的现象仍将长期存在。

第三，从水资源分配来看，随着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体制不断健全，荒漠与绿洲水资源分配愈加均衡，但流域本身经商品贸易带出的“虚拟水”却一直处于出超状态。初步研究表明，塔里木河流域主要农作物和动物产品虚拟水总量为 255 亿 m³，通过棉花、水果贸易净流出 174 亿 m³^[29]。这种外向型农业通过产品形式“流出”的水，如同一条隐形的“动脉”，导致本来就缺水的干旱区水资源进一步流失。（论文基础来自于笔者的博士论文调查，在此特别感谢陈阿江教授在论文选题、田野调查、论文撰写过程中，给予的极具方向性和建设性的指导意见。文章中的村庄名称、访谈对象姓名已经做了适当的技术处理。）

参考文献：

- [1]高华君，1987，《我国绿洲的分布和类型》，《干旱区地理》第 4 期。
- [2]王涛，2010，《我国绿洲化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初探》，《中国沙漠》第 5 期。
- [3]方英楷，1989，《新疆屯垦史》，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第 749 页。
-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2019，《新疆统计年鉴 2019》第 7 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5]童小芹，1998，《可持续发展的新疆绿洲及其农业》，《新疆环境保护》第 1 期。
- [6]赵松乔，1987，《人类活动对西北干旱区地理环境的作用：绿洲化或荒漠化？》，《干旱区研究》第 3 期。
- [7]汪久文，1995，《论绿洲、绿洲化过程与绿洲建设》，《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第 3 期。
- [8]黄培祐，1998，《再谈荒漠-绿洲对立统一观与干旱荒漠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新疆环境保护》第 3 期。
- [9]贾铁飞，2003，《绿洲化——荒漠化与西北干旱区可持续发展》，《上海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 3 期。

学版)。

- [10]王涛, 2009, 《干旱区绿洲化、荒漠化研究的进展与趋势》, 《中国沙漠》, 第1期。
- [11]赵文智、杨荣、刘冰、杨淇越、李芳, 2016, 《中国绿洲化及其研究进展》, 《中国沙漠》第1期。
- [12]王丛霞, 2011, 《社会科学视野下的土地荒漠化防治问题研究述评》, 《宁夏党校学报》第3期。
- [13]汪久文, 1995, 《论绿洲、绿洲化过程与绿洲建设》,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第3期。
- [14]杨依、杨越、武智勇, 2015, 《西北干旱区绿洲化及其环境效应综述》,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
- [15]贺可、吴世新、杨怡、王丹、张寿雨、尹楠, 2018, 《近40a新疆土地利用及其绿洲动态变化》, 《干旱区地理》第6期。
- [16]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 《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2002, 北京: 中国物价出版社第203页。
- [17]陈阿江, 2009, 《再论人水和谐——太湖淮河流域生态转型的契机与类型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第4期。
- [18]刘芳、张红旗, 2016, 《塔里木盆地生态用地分类及其时空变化研究》, 《资源科学》第5期。
- [19]王晓毅, 2019, 《生态文明话语下的乡村振兴》,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20]张江辉、彭立新、李晓萍、张胜江, 2005, 《新疆农业节水灌溉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水利学报》增刊。
- [21]张红丽、陈旭东、雷海章, 2003, 《新疆干旱地区推广节水灌溉技术的制度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第8期。
- [22]雍会, 2012, 《公共物品管理视角下塔里木河流域水土资源开发利用》,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第130-131页。
- [2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 201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条例>释义》,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第44-45页。
- [24]覃新闻、托乎提·艾合买提、吾买尔江·吾布力、黄小宁、袁春, 2014年, 《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与调度实践》,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第35-58页。
- [25]李丽君、张小清、陈长清、申梦阳, 2018, 《近20a塔里木河下游输水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干旱区地理》第2期。
- [26]杨针娘, 《中国冰川水资源》, 兰州: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1年, 第137-148页。
- [27]高鑫, 叶柏生, 张世强, 谯程骏, 张小文, 2010, 《1961-2006年塔里木河流域冰川融水变化及其对径流的影响》, 《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第5期。
- [28]沈彬, 李新功, 2015, 《塔里木河流域 TRMM 降水数据精度评估》, 《干旱区地理》第4期。
- [29]邓铭江, 2016, 《南疆未来发展的思考——塔里木河流域水问题与水战略研究》, 《干旱区地理》第4期。

☆作者简介: 李万伟, 河海大学社会学专业2016级博士

☆责任编辑: 刘静雯

※※※※※※※※※※※※※※※※※※※※※※※※※※

河海大学施国庆教授团队新冠疫情调查成果获奖

2021年1月28日，在国务院参事室社会调查中心会同新华网、腾讯网、华侨城创新研究院联合发起第四届“费孝通田野调查奖”征文活动中，河海大学施国庆教授主持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社会心态和社会行为调查研究》获二等奖。本次评选，在2100篇申报成果中，评选出一等奖3篇、二等奖5篇，三等奖41篇。

2021年3月5日，江苏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开展2020年“江苏发展研究奖”评选工作，对2019年至2020年全省政府研究系统及有关智库的优秀成果进行评奖。河海大学《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社会心态与社会行为调查研究》获优秀成果一等奖。本次评奖工作共接受申报成果251项，经过初评、复评、终评等环节严格评审，共评选出优秀组织奖20项、优秀研究成果150项，其中一等奖30项、二等奖54项、三等奖66项。

针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国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进行，施国庆教授牵头组织来自多个机构、多个专业的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面向全国和江苏，进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社会心态与行为调查”专题调查研究，调查社会公众的认知、情绪、心理和行为，为国家和江苏省委、省政府决策建言献策。调查工作的第一阶段是2020年1月20日至2月20日为疫情爆发初期，进行社会公众疫情意识和社会心态及行为等调查；第二阶段是2020年3月1日至31日，主要针对疫情相对得到控制、春节长假结束后对复工复产复业复学引发的人口流动和返校问题进行调查，包括人口流动、返校及风险评估、决策意愿等内容。基于调查，及时提出了包括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特殊社会政策、加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防控体系建设和完善、构建生产生活重要物资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复工复产支持政策贯彻落实学校防控管理措施和增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公开力度等在内的应对措施。

根据调查研究成果形成3份建议，经江苏省政府参事室选用、推荐作为《参事建议》，分别报送省政府，获得江苏省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副省长三次肯定性批示，被省政府防疫工作领导小组及有关部门吸纳、采用，对防疫和经济社会恢复发挥了重要决策参考作用。6份调查报告被省有关部门报送中央主管部门，河海大学报送教育部，其中《应对疫情返校社会形态和决策风险评估调查》等报告被采用。简要调查报告成果分别被中国社会科学报（网）、新华日报融媒体交汇点、南京日报、人民网、锐研平台等媒体等报道。

本次调查由河海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主持单位，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中国移民研究中心、亚洲研究中心、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中心、社会调查研究所、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院、中国社会学会工业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和移民专业委员会等为参与单位。河海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施国庆教授主持调查，公共管理副院长孙中良副教授、社会调查研究中心主任王毅杰教授、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晨老师、朱林讲师和刘会聪、丁百仁、徐隽俤、杨弃、段太香、顾立坤、何悠、卜莲秀、杨冰青等博士硕士研究生参加了调查和报告撰写。



社会 问题

超级老龄化下数字化经济助力跨越代际数字鸿沟

王 睿

摘 要: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正在深入发展成超级老龄化。并且随着信息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数字生活应用场景的覆盖范围会越来越广,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也更加突出,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确保老年人跟上时代步伐,建设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智慧老龄社会,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为此,必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强化创新驱动,推动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新技术的适老化发展,充分发动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力量进行社会倡导,培养专业养老服务人才优化服务供给。用数字经济的优势助力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满足他们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

关键词: 超级老龄化 数字经济 数字鸿沟

一、引言

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根据联合国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约2.54亿人,占总人口的18.1%。据测算,60岁及以上人口将在“十四五”期末超过3亿人,超级老龄化趋势来临。与此同时,老龄化和数字化经济几乎同步发展,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刺激了“无接触经济”的发展,全球电子商务、在线教育、远程医疗、远程办公等经济新模式和新业态快速壮大,导致代际数字鸿沟问题加剧,数以亿计的老年人被阻隔在数字化生活之外。许多老年人在打车、就医、购物和社交时面临许多困难,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逐渐被边缘化。尤其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代际数字鸿沟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疫情防控下,人人出行都需要出示健康码,而老年人却面临着“健康码困境”,不断有新闻爆出老年人面临的数字化窘境,如辽宁一位老人因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而无法扫健康码被赶下车”等事件,引发的矛盾和冲突问题越来越多,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

老龄人口无疑是数字化经济浪潮中的弱势群体,数字鸿沟使中国近五分之一的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权重下降,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针对此问题,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方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智能化服务要适应老年人需求,不让智能工具给老年人日常生活造成障碍。这是老年人数字困境问题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聚焦老年人日常生活涉及的出行、就医、消费、文娱、办事等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

如何面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代际数字鸿沟问题,数字经济如何助力老龄社会应对数字鸿沟,如何迎接数字化经济的挑战和抓住机遇,是整个社会都需要重视思考的问题。

二、概念界定

(一) 超级老龄化

老龄化将是中国各大城市遇到的首要问题。按目前的趋势，到 2025 年中国肯定会进入超级老龄化阶段。有研究估算，2025 年中国的老龄人口规模超过 3 亿，2030 年会超过 4 亿。根据联合国 2010 年对中国人口的前景展望，到 2050 年左右，中国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 30%，而且这一高比重将维持长达 30 年^[1]。而中国的超级老龄化还有以下特征：首先，中国是超大规模的人口老龄化，到 2070 年前，中国将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其次，中国是超快的速度的老龄化进程，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再次，中国超早得进入了老龄化阶段，日本的老龄化是“先富后老”，而中国则是“未富先老”。最后，中国有着超稳定的老龄化结构，据估算，中国的老龄化将在 2054 年前都呈持续增长状态；2054 年后长期稳定在 34% 左右的高位。所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大势所趋。《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18 修正）第一章总则第四条规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积极”就是肯定的、正面的、努力进取的、鼓励的，对于人口老龄化，不能只看到消极的方面，将老年人视为弱势群体，认为老龄化会加大社会家庭和年轻人的负担，而是要以正面的、鼓励的、进取的态度调动老年人内驱动力，让老人积极融入到现代社会中来，建设老龄友好型社会。

（二）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也称智能经济，有别于实体经济，是通过不断升级的网络基础设施与智能机等信息工具，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已经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网络，“数字经济”已经成为老百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十三五”期间，我国数字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跃，新科技、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深入推进，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然而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进程中，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发展数字经济，把数字经济的蛋糕做大，以数字素养培育为特色弥合“数字鸿沟”，是我们现阶段需要思考面对的重要课题。

（三）代际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是指在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社区和群体之间，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拥有程度、应用程度及创新能力的差别，造成的信息落差两极分化的趋势。数字鸿沟的存在和持续扩大，会引发一些系列问题，比如：会使得数字经济的利益分配不均等化，使个体机会不均等加剧，使企业竞争的不平等加剧，使地区发展的不协调加剧等。“代际数字鸿沟”是数字鸿沟的一种，是指一边是越来越多的青壮年人对信息时代来临的狂欢，一边却是老年人疏离网络承受着信息稀缺、信息失衡的落寞——这是一条年龄构筑的数字鸿沟。老年数字鸿沟导致老年人无法平等享受数字化社会在信息获取、社会交往、医疗等方面的便利，成为数字化社会的弱势群体甚至被排挤在数字化社会之外，无法享受数字红利^[2]。因此，帮助老人摆脱“数字困境”，助力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让老人在信息化社会发展中获取更多的幸福感、满足感和安全感，是未来我们共同为之努力的目标。

三、难点与挑战

（一）数字化经济进程不断加剧

近年来，数字技术不断创新，数字化进程不断加速，使得数字化技术与老年人数字化运用能力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不适应和不平衡也越来越明显，使得代际数字鸿沟现象日益严重。

（二）老年人规模和人口占比快速攀升

中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从 1999 年前后的 10%，到 2019 年 18%，再到 2022 年前后的 20%，仅仅用了 22 年的时间，未来老龄化进程还将持续下去，使得代际数字鸿沟现象日益普遍。

（三）各地区经济条件存在差距

有些偏远地区或者农村地区生活条件有限，缺乏电脑手机等上网设备，很多老人大多都没有接触过这些先进的设施设备。也有一些农村进入城市的老人，已经养成的、根深蒂固的消费习惯让他们拒绝承担上网费、流量费等费用，所以也会拒绝使用互联网。

（四）老年人的非理性信念

许多老人由于自身教育背景、所处文化环境、生活习惯、朋友圈等各种各样的原因，对互联网等新兴科技存在抵触情绪或者消极情绪。比如：认为网络不安全，害怕自己上当受骗；认为自己每天的生活不需要使用互联网，满足于目前的生活状态；或者因为自己的学习能力不够强而陷入自我否定或者自我怀疑等。老人在数字技术面前认为自己“跟不上时代”，“在给大家添麻烦”，经常陷入“习得性无助”^[3]，从而自我保护和自我封闭。

（五）现有的网络环境对老人不够友好

目前的主流市场上，互联网软件开发基本是围绕年轻人设计，大多数页面复杂，操作繁琐，且存在大量广告。不会用，看不懂成为老人使用互联网的一大障碍。智能手机只会用来发短信打电话或者聊聊微信，其他大半功能都处于“待机”状态，造成了很多老人索性放弃了进入数字经济的互联网时代。

（六）子女陪伴和支持不够

根据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以上老龄人口已经达到 2.12 亿，空巢和独居老人已经达到 1 亿，然而大多数子女忙于自己的工作事业，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陪伴老人，导致老人的社会活动参与减少。在使用互联网时，子女一般都会对老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询问表示不耐烦，并且老年人在家庭的地位一般都自处高位，所以很多老人也羞于问子女问题。所以，面对瞬息万变的互联网世界中，老人总会觉得无所适从。

（七）专业从事养老服务的人才缺乏

一直以来，由于工资待遇低、社会声望低认同度低、养老护理工作辛苦等原因，从事养老服务的专业人员就尤其短缺，难以留住高水平高层次和有经验的人才，长期从事养老服务的大多为进城务工人员或者农村妇女等。而在数字化经济时代，现有的工作人员结构自身都难以适应新兴科技和互联网，缺少专业的人才教导和引导，老人自然更加难以适应。

四、对策

（一）用积极视角激发老龄社会创新动力

长期以来，社会大众都对老年人有“古板、沉闷、落伍”的刻板印象，认为老年人由于生理、心理、文化素质等原因跟不上时代的脚步，注定被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所抛弃。然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对老年人应该有新形象的描绘，老年人一样可以参与工作，参与社会贡献，有他们的人生价值，呼吁用积极的视角去看待老年人，挖掘老年人在数字经济时代可以利用的潜能。

（二）银发经济发展为弥合老年数字鸿沟提供机遇^[4]

促进老年群体对数字媒介的使用，随着一些老年人逐渐适应了社交媒体平台，在互联网上分享自己的晚年生活和人生见解，凭借他们丰富的人生阅历，积极的生活态度，收获了一大波粉丝，成为抖音微博等社交平台上的网红群体——银发网红，比如抖音上的“爱穿高跟鞋的汪奶奶”，她已经 80 岁了，但是每天仍然生活的精致乐观，她认为年龄只是数字，她的精彩人生还在继续。通过制作小视频分享工作、恋爱、婚姻态度，收获了 1600 多万粉丝，为当下的老年群体树立了紧随时代潮流的榜样。

（三）促进互联化适老化改造

1.政府政策推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推进智能化服务要适应老年人需求，并做到不让智能工具给老年人日常生活造成障碍。老年人的数字困境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2.发挥企业的社会责任；现有的媒介技术不能保证高龄老年群体对数字产品的易感触、易握持、易理解、易操作的需求。应推动与老年人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网站、手机 APP 的适老化改造，改善相关网站和手机 APP，如推出相应的“长者专区”，设立专用的“长辈模式”，加大字体、改善配色、减少弹窗、改进文字输入等，使老年人更加方便、快捷地获取信息和服务。同时要保留传统服务，如保留车票、门票等传统纸质凭证；设立无健康码通道、老人专用服务通道；保留窗口服务、电话服务等传统人工服务；饭店等保留传统点单方式；禁止拒收现金等。

（四）充分发动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力量进行社会倡导

1.举办社区文娱活动，结合具体活动与比赛等，讲解文化娱乐类信息技术手段与智能设备的使用（视频下载与播放、视频分享、音乐播放与寻找、在线网课等），满足老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和与时俱进的新型精神文化需求。

2.通过举办讲座与社区科普互动活动，强化预防信息诈骗与网络陷阱等。

3.建立一支核心志愿者小组，通过小组成员与社区的互动，形成辐射效果，使其身边更多老年人获得能力提升，扩大项目影响与成效。

（五）建立数字经济下专业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一直以来，由于工资待遇低、社会声望低认同度低、养老护理工作辛苦等原因，从事养老服务的专业人员就尤其短缺，大多从业人员为农村进城务工妇女或非专业人员，难以留住高水平高层次和有经验的人才。在数字经济的形势下，这个问题更加凸显出来，现有的人员队伍由于自身能力局限，满足不了教导老人学习新技术的需求，因此迫切需要建立适应互联网数字经济发展的专业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六）家庭成员要担起主体责任

家庭成员离老年人最近、和老年人最亲，是老年人最信赖的人。在帮助老年人适应、融入智慧生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无可比拟的优势。家庭成员要担起责任，耐心地教老年人使用网络，为他们详细演示讲解网上预约挂号、线上打车、手机支付等操作步骤，手把手教会老年人实际操作的方法。

（七）撕下对老年群体的负面标签

一直以来，社会大众对老年人总是存在“古板”“固执”“接受不了新事物”“跟不上时代”的负面标签，同时许多影视作品也在负面构建老年群体的形象，不仅影响了大众对于老年群体的态度，也不符合老年人对自身的认知。如果无法将老龄社会负面标签摘掉，创新动力往往是不足的，需要更多地呼吁老龄社会是一个社会的转型，是人口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必然转型阶段，是充满着挑战又充满着创新机遇的一个现象，而不是就此把老年人“边缘化”，不愿意和老人交流。新闻媒体也应用温暖而真挚的笔触勾勒美好的老年生活，打造出更多为老年群体所喜闻乐见的、积极正面的报道和影视作品。

五、结语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个社会对老年人的关爱彰显着社会的文明程度。当互联网使用日渐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时，一大部分的老人被隔绝在了信息时代之外。当晚辈热衷于网络，而老人由于种种的条件限制不能够跟上时代脚步时，他们就很难融入这

青年社会注意力的形塑机制

——以抖音为例¹

董伟 王毅杰

摘要：在信息碎片化背景下，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媒体开启直播带货新端口，突破时间与空间限制捕获日益稀缺的青年社会注意力。本文从社会学视角考察了青年社会注意力形塑过程中抖音直播带货各主体行动逻辑。社会注意力作为一种资源在不同主体间流动，短视频平台掌握社会注意力的绝对控制权并逐渐由娱乐性向商业性转化；带货主播争夺社会注意力的背后遵循着完整的“流量变现”逻辑；普通短视频用户通过购物完成从观众到消费者的身份转换。随着短视频平台中各种社会资本与力量不断注入，对于青年社会注意力的争夺也加码升级。需要进一步合理规划社会注意力资源的分配与使用，发挥网络媒体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社会注意力 直播带货 消费青年 短视频 网络社会

一、背景与问题

科技与网络发展为新媒体应用带来巨大空间，逐渐从简单图文向融媒体的新阶段发展，而作为当前不断升温的商业模式，直播带货借此“东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1]。2016年被称为“直播元年”，直播行业开始呈现“井喷式”增长^[2]，我们自此进入“人人都能直播，万物皆可直播”的全民直播时代。从最初的室内娱乐聊天直播到户外直播赶海、直播探险，发展到如今的直播鉴宝、直播带货，网络直播的内容与形式极大丰富。作为一种“看得见”的力量，直播产业的繁荣离不开社会注意力资源的集聚。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应用逐渐家喻户晓，在地铁通勤、茶余饭后和休息之前“刷抖音”已成为当下年轻人的生活样态之一。

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的蔓延，使得青年群体逐渐成为消费主力军。南都大数据研究院的一项报告显示，以95后为代表的青年群体经济负担小，依赖电商网购，喜欢追求个性化尝试新事物，并愿意通过预支收入等方式来提前消费。每个月还“花呗”也成为许多青年的日常生活方式，“消费青年”的标签在该群体中愈发凸显。供给远远大于需求是消费社会的显著特征，置身于物质极度充裕的环境中，面对琳琅满目的各色商品，即使作为“消费青年”也会产生选择困难症。消费是青年群体的一项重要需求，如何对其高效引导也成为一门学问。

短视频应用之所以广受年轻人推崇，就在于其通过形象生动的作品满足了青年群体随时随地的信息获取需求。以报刊、广播和电视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提供了“社会知识”与“社会影像”，现代人的生活也正是通过这些知识与影像的想象而被建构，包括消费在内的各项需求也是设计加工后的结果^[3]。而大众传媒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之一便是通过引导人们的注意力从而决定人们的选择，由于注意力受到给予注意一方人数的限制，社会注意力因此也就成为一种稀缺性资源^[4]。

作为信息提供方的短视频平台精准掌控青年群体的社会注意力，在短视频作品基础上加入实时直播端口。尽管抖音直播带货的出现晚于以淘宝为代表的电商直播带货，但凭借自身短视频应用积累的众多年轻用户，抖音直播带货迸发出巨大能量。抖音电商数据显示，小米集团总裁雷军首次抖音直播

¹本文已刊发于《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2期。

带货销售额高达 2.1 亿，累计观看人数 5053 万，订单数量超 57 万单，抖音相关话题视频播放量突破 5 亿。一场抖音直播带货就完成线下门店数月的销售额，而这也仅仅是单场直播的数据。在一系列数字背后，抖音直播带货作为电商与直播结合后的新产物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直播带货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短视频平台社会注意力资源的累积。

然而，直播带货繁荣的背后许多潜在问题已开始显现。中消协近期发布的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显示，“双 11”期间的消费负面信息主要集中在直播带货、不合理规则两个方面，而其中汪涵、李雪琴直播带货“翻车”和李佳琦直播间“买完不让换”等被点名。同时抖音主播“辛巴”团队在直播间销售的燕窝疑似糖水事件也受到广泛关注。不少带货主播甚至通过“买僵尸粉”“刷单”等方式对直播间人数、直播销售额等数据造假，伪造直播间销售火爆的假象以吸引更多注意力。

直播带货中暴露出的“流量造假”等欺诈问题无疑造成社会注意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作为还在不断发展中的新兴事物，对于直播带货的相关研究还不够充分和深入，但在直播带货中产生的社会注意力方面的问题不容忽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社会注意力资源在短视频平台、带货主播和厂商等主体的共同作用下，已通过短视频软件这一媒介在直播带货的过程中生根发芽。而对社会注意力的源头—青年群体而言，各方对社会注意力资源的配置使用不仅涉及青年的经济社会化过程，更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直播带货中的社会注意力形成：从个体青年到集体文化

一项心理学研究显示，个体对外界信息的获取 83% 以上通过视觉，11% 依靠听觉，3.5% 凭借触觉，余下部分则来自味觉和嗅觉。可以看出注意力主要通过个体感官刺激的方式进行累积，具备完整的身体机能是形成注意力的先决条件，尤其需要来自“看得到”的信息。

在信息爆炸和供大于求的消费社会中，产品在生产制造环节的问题已基本解决，而如何从琳琅满目的商品中脱颖而出才是厂商实现从生产到销售的“最危险的跨越”，也即目前产品“被看到”已在一定意义上超越“被生产”。面对青年群体巨大的消费需求，厂商亟须通过新的方式进一步掌控青年的社会注意力。于是，厂商与主播一拍即合，广受年轻人喜爱的短视频媒体开始成为各方角逐的“新战场”，直播带货在很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强势发展。

我们将抖音带货直播作为主要分析对象，从社会注意力形成的身体基础、群体文化再到直播带货中各主体的互动，以层层递进的方式观察社会注意力从形成到利用的完整过程。

（一）感官刺激与心理记忆的联动：个体注意力形成的身体基础

注意是个体心理活动对外界一定事物的指向和集中。注意力指人的心理活动指向和集中于某种事物的能力，是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五大信息通道对客观事物的关注能力。作为人体生理机能能在外界事物刺激下所做出的反馈，注意力需要身体作为发生生物反应的客观物质基础。注意力机制源自人类的视觉注意力机制，是个体利用有限的注意力资源从大量信息中提取有效信息，也是人类长期进化的结果^[5]。作为一种心理特质，注意力表明了心理活动指向，并强调一种增强与提高的趋势。注意力可以分为视觉主动注意力、视觉被动注意力、听觉主动注意力和听觉被动注意力。由于不同感官刺激引发的注意力有主动和被动之分，也就解释了为何许多不经意的瞬间能够在个体大脑中留下深刻映像，就比如我们可以脱口而出许多耳熟能详的广告语。

注意力与记忆力密切关联，二者的互动过程可以简单抽象为，注意力像一只抓手，为人体吸取外界事物的特征信息，然后信息累积形成记忆。个体既会主动通过感官注意力获取外界信息，也会被动受到广告渲染等方式的影响。商家对于注意力资源的获取首先基于个体的感官刺激与反馈，在电视、

网络和街头巷尾间歇出现的广告就像一张大网捕获了个体的零散注意力，然后以滚动播出的方式将这种记忆强化。尽管年轻人乐于不断学习并善于接受新鲜事物，但“遗忘曲线”又说明了个体“记忆仓库”的有限性，新信息的不断堆叠必然会对旧的信息产生压迫，在个体身上产生“喜新厌旧”的效果。

商家自然不愿意自己的广告被新的广告所覆盖，所以除了在传统领域继续加大广告投入外，他们也需要拓展新的领域。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媒体拥有庞大的青年用户群体基数，除以短视频作品的方式投放广告，厂商也将目光投向了更具互动性的带货直播上。只有对个体感官施加更多刺激才能更好地吸引青年注意力，而直播带货将声音与画面优化整合后以实时传输的方式与观众互动共享，成为“活广告”，极大调动了青年的注意力机能。

因此，在分析整体性的社会注意力之前，要先理解个体记忆与注意力的有限性。为何许多网络红人很快就会“过气”，并且一些热门事件也可能在短时间降温，因为一定规模的社会性关注（风气）首先以个体的关注为前提和基础，当个体开始遗忘时，集体性社会记忆也会随之消减。为了给注意力“保鲜”，带货直播往往会不断推出新的带货商品，加入新的带货主播迎合更广泛和新鲜的观众趣味，而这也是在内容制作上具有固定性的传统广告所难以企及的。

（二）“蔚然成风”：社会注意力与文化生产

社会注意力是区别于个体注意力的一种群体性注意力，是整个人类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的趋于稳定和一致的注意力形态，也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基础性资源^[6]。历经漫长累积的社会注意力已发展为一种集体文化的指向，就直播带货过程而言，青年群体在其中除了经济行为外也酝酿着文化生产。文化生产不仅是一种正在形成的理论，更是一种重要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同样适用于青年以外其他群体的分析^[7]。

社会注意力相较于个体注意力表现出明显的规模效应。作为个体注意力的集合，社会注意力是不同个体排列组合后的结果。尽管具有较为稳定的一致性，但社会注意力有着复杂的分布特征。社会注意力资源的分布主要有“时间分布模式”“空间分布模式”“社会关系分布模式”以及“问题与事件分布模式”等多种模式^[8]。这也解释了为何许多带货直播定在周五晚八点开播，因为那时“上班族”已完成工作任务准备进入休闲的周末，人们拥有丰富的时间空闲，或者说注意力空闲。对于短视频平台、商家与带货主播而言，必然要了解社会注意力分布的具体规律才能捕获更多的社会注意力资源。

成规模的社会注意力可以引导社会文化风气，而社会文化风气又吸引更多的社会注意力聚集，其原理类似“滚雪球”效应。对于青年群体而言，同辈群体在特殊时空下的影响尤为显著^[9]。网络文学、“二次元”文化甚至包括“网络红人”等在年轻人群体中都占有一席之地，而其形成过程基本上都经历了社会注意力的初次聚集与再聚集两大阶段。社会注意力的初次聚集主要是从“无人问津”向形成风气转变，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一小部分“标新立异”者的社会注意力聚集。而社会注意力的再聚集阶段则是从“小有规模”向“家喻户晓”方向发展，成一定规模的社会注意力指向吸引了更多对其认同的“志同道合”者的加入，而其规模随着关注的增多与广泛的传播也越来越大。

被广泛关注的直播带货只有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才能吸引更多社会注意力。作为新媒体发展下的产物，直播带货的火爆离不开资本的推波助澜。就像许多网络炒作背后涉及复杂的利益分配格局，“出资人”也希望通过人为的方式将社会注意力资源聚集，而操控社会注意力对于崇尚“增值”的资本而言显然代表了“有利可图”。因为许多年轻人愿意为自己所追求的风尚付出巨大经济成本，例如售价不菲的“二次元”周边产品。直播带货同样可以发挥类似功效，“带货”本就是一种经济行为，并且在资本驱动下主播（明星、网红）与商品的丰富可以最大程度覆盖不同受众，因此直播带货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往往超

出预期。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为现代传媒架起了“高速路”，传媒的控制力量也更加深入。直播电商逐渐成为“流量变现”的重要推手，直播平台的流量创造能力使得企业开始从产品制造和销售主导向“流量为王”转变，流量是当下企业实现产品销售的最重要资源^[10]。而网络流量的本质正是广泛而稳定的社会关注，每周定期观看抖音带货直播已成为不少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三、社会注意力资源配置：直播带货中的青年消费建构

直播带货的繁荣绝非偶然，自2016年诞生以来，这种商业模式取得了资本市场与社会大众的青睞，是国家鼓励、技术革新、流量助推、购物体验升级以及社交渠道拓宽等多重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11]。作为中介方的MCN机构连接了上下游的商家、网红、直播平台等多方利益主体，形成了各主体之间的有效分工与专业协作^[12]。在“流量为王”的时代，短视频用户、带货主播与短视频平台在社会注意力资源配置过程中扮演着不同角色。

（一）短视频用户“消费”与注意力资源供给

现代社会中，个体化的价值观念已深入青年脑海之中，随着生活方式和状态的改变^[13]，青年人的需求层次也随之发生相应变化，而直播带货实现了青年对娱乐需求与消费需求的整合。直播带货具有很强的互动性，能够使用户通过网络连接最大限度地身临其境。传媒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在于开辟新生活风尚，制造新消费意义空间^[14]，而直播带货在当下恰好发挥了这一功能。

直播带货之所以火爆还要归功于强烈的需求。年轻人观看带货直播除“尝鲜”外，直播互动的方式也确实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商品，身临其境的直播方式也能勾起他们强烈的购买欲望。作为粉丝在直播间购买商品显示了对明星的信赖与支持。商家自然是为了销售目标，开辟一个新的渠道拓展销量。而明星主播则是为了将自己的粉丝影响力“变现”。

抖音等短视频直播带货与淘宝等电商直播带货的用户属性有着很大区别。由短视频作品积累的广大青年用户首先以并不具有“消费”属性的观众或粉丝身份在短视频平台活跃，他们观看自己喜爱的作品，在其中点赞、评论与其他用户互动。在自媒体高度发达的背景下，他们也能以作者的身份拍摄短视频。也即短视频用户群体首先基于娱乐的目的使用软件。而淘宝等电商软件的使用者最初就以购物和消费的目的进入，其用户群体从始至终都具有“消费者”的身份。发掘潜在的消费用户，将观众从非消费者向消费者的转换正是短视频直播带货巧妙运用社会注意力的精髓所在。

在直播间购买商品意味着观众实现了向消费者的身份转换，而这一过程凸显了典型的“流量变现”逻辑。可以类比机场候机厅设立各类商铺，特定场所的巨大人流量可以帮助商品销售。同样的，观看短视频的用户也可以在“滑动”的间隙购买商品，因此短视频软件除了投放视频广告外也加入直播带货的窗口进行注意力“引流”。

必须承认在社会注意力流动的过程中，网络媒体的力量不容忽视。其为信息传播提供了巨大便利，网络可以将注意力转化为现实收益，而直播带货似乎成为“流量变现”的一种典型方式。作为对青年社会注意力控制的重要方式，直播带货与广告行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无论普通用户或是忠实粉丝，在观看直播的过程中都将个体注意力控制权上交给平台与主播等主体，他们是注意力资源的提供者。而在直播间购物的过程中，他们也完成了注意力与金钱的“双重消费”。

（二）带货主播“表演”与注意力资源争夺

资本是推动直播带货行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企业为购买社会注意力要投入巨资。而在短视频直播带货中厂商的资本转换与增值离不开带货主播的“表演”。作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中与用户直接互动交

流的人员^[15]，人社部在2020年5月11日发布《关于对拟发布新职业信息进行公示的公告》中通告了拟新增包括直播销售员、互联网营销师等在内的新职业。他们主要指“在数字化信息平台上，运用网络的交互性与传播公信力，对企业产品进行多平台营销推广的人员”。

目前绝大多数抖音带货主播都还属于“兼职”，其中“演员”身份的构成比例远高于“销售员”。带货主播的人员构成主要有明星、网红、“头部”带货主播、实力雄厚的大品牌与企业家、具有一定资本的商家、个体工商户与普通短视频作者等等。不同的主播背后有着不同的青年用户群体，而不同用户代表着不同的社会注意力资源。例如罗永浩直播间的男性青年用户较多，网红背后的中低文化水平青年占多数，游戏主播主要面对青年游戏爱好者推销外设。而不少现实中的个体工商户则利用短视频直播带货销售线下的产品，从日用百货到手机电脑，各种商品应有尽有，几乎将销售的环境搬到了线上。由于短视频直播的便利性与低门槛，不同行业的人员都加入到短视频直播带货当中，而这背后对于社会注意力资源的激烈竞争可见一斑。

在众多带货主播中，罗永浩的“交个朋友”直播间算是直播带货成功模式的典型。他最初以“明星”的方式凭借个人影响力入驻抖音平台，强大的粉丝号召力无论对其个人直播间或是整个平台都吸引了巨大流量。许多观众因为喜欢他诙谐的语言表达而进入直播间，而其直播带货因此也具有“脱口秀表演”的内涵。他的带货直播非常重视用户需求，在专门网址“t.t”中设立了包含商家与用户的不同窗口，收集并了解各方需求。

为了吸引更加广泛的社会注意力，除了通过在平台内部的短视频作品中“表演”作为宣传手段外，有些主播还会依靠微博等社交媒体的转发来吸引注意力。在直播过程中也会通过“低价”的标签邀请观众带领亲朋好友进入直播间享受优惠，这显然利用了社会注意力在社会关系上的分布规律。在卖力的带货“表演”之外，一般最初几场直播也确实是“赔本赚吆喝”，只有形成一定的粉丝与关注度基础才能进一步考虑盈利的问题。

每一场带货直播当中会有真人模特进行商品展示，过去的电视销售中会播放广告视频，但直播带货几乎不会通过视频来宣传而都采用亲自示范，观众也可以在直播间实时评论，直播的互动性被极大发挥。为了更好地通过视觉效果捕获观众的注意力，直播现场的设置不亚于专业摄影棚，多角度多机位向顾客展示商品，通过不同的角度引导着观众的注意力。我们也发现直播场地的设置出现了两极化发展趋势。一方面，在手机等便携媒体设备的辅助下，直播可以不受时间与场地的限制实现随时随地直播，灵活性极大增强；而另一方面如果追求更好的直播效果，专业影像设备的加入又限制了直播的随意活动。

直播带货除了极少数的头部带货主播外，大多数仍依靠“网红”身份的影响力。有厂家与主播共同出镜的品牌专场直播，而这些直播中“合谋演戏”的成分非常明显。除了正常观看人群外，也有在直播互动区评论帮助主播销售的“带节奏”者。许多短视频作者通过带货直播拥有了“表演者”与“销售者”的双重身份，通过与PK对手“争吵”，与委托商家“扯皮”来吸引眼球的现象屡见不鲜。但一般“网红”主播带货商品的质量与品牌都存在一定问题，并且不会一直将商品挂在商品橱窗当中，因为下架后的商品即使出现问题也无法“差评”，这也反映出某些带货主播的不负责任与直播带货的乱象。而社会注意力发挥作用的一个奇怪现象在于，虽然许多观众明知主播在表演但仍然想“凑热闹”，甚至在所谓“低价”的诱惑之下也会购买商品。

主播在直播过程中的礼物“打赏”也是吸引注意力的重要方式，例如在大主播的直播间，无论其是否是带货主播，只要有足够的关注度与网络流量，许多初级带货主播都会通过“刷礼物”的方式获得曝光度

与增加粉丝量，不少主播会刷出价值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礼物。为了提高曝光量，有些还会购买自媒体与营销号的宣传。作为带货直播中的“主演”，带货主播用尽浑身解数吸引社会注意力，而他们在平台内部对于社会注意力资源的竞争也最为激烈。

（三）短视频平台“计算”与注意力资源调控

短视频平台首先为直播带货提供了直接技术支持。5G技术的应用与“云计算”的发展帮助在云端直播的观众容纳量远超线下。线下活动的开展经常受到场地规模的限制，一个规模较大的会场充其量也只能容纳上万人。但线上直播则不同，只要服务器的负载和网络带宽足够，观看人数上百万的直播带货现场也经常出现。此外短视频软件在直播设备方面也进一步便携化，最初的网络直播必须要借助电脑等设备，直播的场地与空间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我们可以发现抖音、快手等短视频软件都没有PC客户端，基本只有手机移动端一个端口，而移动端的流量无疑非常巨大。

短视频平台对其内部流量有着绝对“计算”与掌控。在平台发展之初需要积累用户，而软件平台则通过在电视与网络媒体中“打广告”的方式为平台“引流”。就直播带货而言，抖音平台掷6000万巨资签约罗永浩也是看重其庞大的粉丝数与流量汲取能力。日趋完善的程序算法也帮助平台更好地控制流量，例如用户每天打开抖音看到的第一个视频或直播都是平台通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计算”后的结果。用户的关注列表，主播的点击量，平台热门榜单甚至用户的每一次搜索记录都会影响平台的推送。此外为了控制用户注意力，抖音还增加了“锁定模式”。上下滑动切换本是短视频软件的基本操作，用户对于不感兴趣的视频或直播直接划走即可，但近期有用户发现进入某些直播间后上下滑动的操作失效，只能退回平台主页或关闭软件。类似的操作说明平台希望借此方式锁定用户与流量，也即平台在用户的观看选择上具有很大的决定权。通过用户与主播的一对一衔接，平台实现对于社会注意力资源的精准掌控。

作为平台管理者，用户与主播都要在平台制定的“游戏规则”范围内活动。抖音要求带货直播在今年10月9日起开始必须使用本平台的商品橱窗，不能再使用淘宝、京东等外部链接。此政策虽然仅针对直播带货，短视频仍可正常搭载第三方商品链接，但可以看出发展直播电商已成为抖音平台的重要战略，而禁止第三方电商链接也是“笼络”流量的具体措施。在有关部门对直播带货规范监管的同时，抖音平台也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治理直播带货中的乱象。抖音小店《店铺评分管理规则》要求，在一个考核周期内平均分需大于或等于4分（满分5分）才能继续带货，否则平台将有权依照《电子商务开放平台店铺服务协议》及平台规则与“不及格”的店铺终止合作。

直播带货已逐渐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除了平台、主播、观众、商家之外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直播带货数据分析机构。在将足够的网络流量（社会注意力）引入平台后，平台管理者通过算法“计算”对流量进行精准掌控，在对平台内注意力资源调控的同时也积极制定规则以规范直播带货发展。

四、结论与讨论

网络发展与信息传播不断突破时间与空间限制。相较于传统PC，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媒体设备发展代表着媒体硬件演进的方向，以往信息获取时间的固定与场地的限制在手机的加持辅助下变得触手可及。而在软件层面，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应用的出现更是加速了网络的“便携化”趋势，通过口袋中的手机即可链接到整个世界。

直播带货的繁荣充分印证了“流量变现”的逻辑。短视频软件作为集聚社会注意力的平台，在引领生活风尚的同时也在制造新的消费空间。但必须认识到当前直播带货仍存在带货主播信用缺失、行业门槛模糊、监管薄弱、利益分配格局不均衡等问题^[16]。

近日，中国广告协会制定了《网络直播营销活动行为规范》，对直播带货中的刷单、虚假宣称等问题进行了重点规范。“网络直播营销活动应全面、真实、准确地披露商品或服务信息，依法保障消费者通过网络直播购买产品或服务时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同时，直播营销活动应严格把控产品和服务质量关；商家要积极履行承诺，对所售产品负责到底，并依法提供退换货保障。”

市场经济语境中的传媒权力开始聚拢社会注意力以及塑造人们的消费时尚，同时还建构了“媒介帝国主义”的文化新景观^[17]。在此过程中，正确的流量与社会风气导向至关重要，不能任由公众注意力被愈发密集的“无意义”所稀释，如果人们都满足和热衷于对“无意义”的追捧，公共传播就会沦为纯粹的“流量导向”^[18]，而这无疑是对社会注意力资源的滥用。

对于青年社会注意力资源的争夺还在继续，而直播带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直播带货中主播的商业宣传行为应有底线思维与红线意识^[19]。除了带货主播的专业素养外，短视频平台也需要不断完善，只加入一个电商直播端口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到具有十几年历史的淘宝等电商软件的各方面完备。平台、主播、粉丝或者消费者都处于变化与发展完善的过程。随着直播带货各项规范出台，对于行业劳动者的塑造也在加强^[20]。要进一步合理规划社会注意力资源的分配与使用，最大限度发挥网络媒体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 [1]岳小玲,2020,《电商直播“带货”的内容生产和优化路径》,《出版广角》,第19期。
[2][10][12]姚林青、虞海侠,2020,《直播带货的繁荣与乱象》,《人民论坛》第25期。
[3][14][17]刘文辉,黄永超,2008,《20世纪90年代传媒权力的扩张》,《兰州学刊》第3期。
[5]李琳辉、周彬、连静,等,2020,《基于社会注意力机制的行人轨迹预测方法研究》,《通信学报》第175-183页。
[6]徐浩然,2010,《社会注意力的资源分布与价值评估》,《南京社会科学》第4期。
[7]丁百仁、王毅杰,2017,《公立学校农民工子女“自弃文化”研究》,《青年研究》第2期。
[8]张雷,2002,《社会注意力资源的分布模式》,《中国广告》第5期。
[9]王刘飞、王毅杰,2016,《后排男孩：空间社会学视角下的群体塑造》,《青年研究》第1期。
[11][16]沈宝钢,2020,《直播带货商业模式探析及其规范化发展》,《理论月刊》第10期。[13]林蒙丹、林晓珊,2020,《结婚买房：个体化视角下的城市青年婚姻与住房消费》,《中国青年研究》第8期。
[15][19]孟雁北,2020,《直播带货中主播商业宣传行为的规制研究》,《人民论坛》第25期。
[18]杨京,2018,《社会注意力不应消磨在无意义狂欢中》,《长江日报》第7期。
[20]郑广怀、范一杰、杜思齐,2020,《情商与常态规范：网络主播的劳动过程》,《清华社会学评论》第1期。

☆作者简介：董伟，河海大学社会学专业2018级博士

王毅杰，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邢小龙

※※※※※※※※※※※※※※※※※※※※※※※※

亓迪副教授最新著作《中国儿童发展的组织生态研究》正式出版

2021年1月，河海大学社会学系亓迪副教授的学术专著《中国儿童发展的组织生态研究》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发行。

本书以社会组织参与促进儿童发展的公益现状及特点为主要内容，分别介绍了当下社会组织参与儿童发展的政策环境、儿童公益组织现状分析、儿童公益品牌项目效果评估、类别化社会组织特点、儿童社会组织监测评估和人才队伍建设等问题。

该书重点介绍了两个促进儿童发展的公益品牌项目的成效。其中之一为桂馨书屋项目，该项目以建立乡村小学图书室、展开对小学教育工作者的阅读推广提升以培养乡村儿童的阅读兴趣和习惯，作者在湖南省、河南省、贵州省3个省份6个县共19所小学四至六年级学生发放问卷并开展实地关键人物访谈，以随机对照实验的方式开展严谨细致的比较研究。研究发现以乡村小学为切入口，提升书屋搭建和教师培训，有助于提升乡村儿童的阅读兴趣。第二个为常青藤流动儿童社区融合项目，该项目研究以促进生活教育、家庭成长和社区营造为目标的社区儿童生活馆，旨在促进流动儿童与社会各类人群的接触交流，增进亲子之间、家庭之间的交流，促进家庭、邻里互动，活跃社区氛围。作者以量化和质性相结合的方法，对社区家长、流动儿童、儿童生活馆工作人员、项目组成员和合作伙伴等关键人士进行了深度访谈。研究表明，儿童生活馆为流动儿童及家庭带来积极影响，流动儿童的社会支持感、抗逆力、主观幸福感都有显著提升，亲子关系有显著改善，社区居民参与意识和社区互动明显增加，社区社会资本得到有效构建。

社区互助养老研究

——以大海阳社区“我家厨房”项目为例

王盼盼

摘要：本文研究了大海阳社区“我家厨房”互助养老项目的参与主体和运作机制。“我家厨房”项目的参与主体包括社区党委、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和社区老人。在整个互助养老过程中各个主体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各方协调合作，使得整个互助体系顺利运行。研究发现，“我家厨房”项目存在志愿者激励不足、居民对新型养老方式的接受度不足、社区缺乏互助养老的基本条件、资金来源匮乏等问题。发展社区互助养老，需要建立科学的志愿者管理系统，通过政府和媒体力量进行宣传，因地制宜制定互助方案，激励多元主体参与，拓宽资金来源。

关键词：社区互助养老 运行机制 我家厨房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2000年，我国六十岁及以上人口达1.30亿人，占总人口比例10.46%，六十五岁人口达8800万人，占总人口比例为6.96%。按照联合国提出的老龄化标准，即“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7%”，我国在二十一世纪初就已步入老龄化社会。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0-14岁人口比重为17.95%，15-59岁人口比重为63.35%，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8.7%。2010年以后，我国的老龄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总和生育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

2016年政府出台“全面二胎”政策，但因为改革开放和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抚养孩子的成本不断提高，边际孩子效应下降，以及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等原因，人们的生育意愿依旧不高，总和生育率仍低于1.8。随着生育率的降低，家庭结构向小家庭尤其是核心家庭以及夫妻家庭方向转变，抚养比增大，仅仅依靠中国传统的居家养老的养老方式很难满足当前社会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机构养老虽然能够保障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但由于机构养老费用较高和以及传统观念的约束，在经济尚不发达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难以推行。在这种背景下，社区互助养老逐渐兴起，成为传统居家养老和公共养老的有益补充。目前，为了让老人能够在家庭社区安度晚年，多地发展社区互助养老这一模式，比如，浙江省长兴县引进社会养老机构，对愿意从事养老服务的居民进行培训，上门照顾失能失智老人；北京的养老驿站；南京市的“时间银行”等。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剧，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将日益严重，由于家庭规模小型化和生活成本的提高等因素，仅靠家庭养老帮助老人度过老年生活的方法存在很多局限。我国人口基数大，建立福利型国家既不实际也存在很多弊病。近些年，社会上涌现出一批养老机构、福利院，但这些机构都以营利为目的，缺乏人文关怀，把父母送进机构养老的儿女还会遭受伦理道德上的指责。社区互助养老模式不仅可以让老人在家养老，还可以享受到在机构养老所接受的部分专业服务，既减轻了子女照看老人的负担，还让一部分退休的健康老人和志愿者实现了人生价值、也为自己未来的养老增加一份保障，是“美美与共”的事。因此，对于互助养老的运行模式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建立完善的互助养老体系对于解决目前的养老困境具有积极意义。

（二）社区互助养老的概念界定

作为居家养老的补充，2018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发展互助式养老。互助养老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在抚养比不断增加，年轻人工作生活压力大的背景下，发掘老年人自身的潜力和特长实现“以老助老”，鼓励社区内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愿意参加志愿服务的青老年人和中老年人照顾高龄老人和失能老人。第二种是在较大范围内动员愿意参加志愿活动帮助老年人的志愿者为老人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类服务，志愿者可以把自己的自愿服务时间积累起来换取其他服务，比如“时间银行”^[2]。这种养老方式的主要优点是老年人可以发挥余热，更好的实现人生价值；志愿者可以换取所需服务；调动社会成员自身的内在潜力，减轻社会的养老压力，缺点在于发展较晚，尚不健全，缺乏专业完善的医疗服务系统，资金来源有限等。

除了互助养老外还有两种比较典型的互助养老方式，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居家养老是家庭养老为主，社区养老服务为辅，在为居家老人提供照料服务方面，又上门服务为主、社区日托为辅的整合社会资源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服务的养老模式^[3]。机构养老是社会化养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通过综合性的养老服务机构来为老年人提供老年照护、医疗、陪伴等服务。机构养老有不同于居家养老的一些特点，主要是有偿服务、市场化的竞争、社会福利的公益性^[4]。

目前，居家养老是大部分老年人采取的养老方式，在“十二五”规划中，民政部提出“9073”的养老模式，即90%的老年人采用居家养老，7%的老年人采用社区养老，3%的老年人采用机构养老^[5]。因为受到传统儒家思想中“仁”和养儿防老思想的束缚，加上居家养老中子女对老人关怀的不可替代性，未来居家养老仍会占据主导地位，而机构养老和互助养老将在政府缓解“养老难”问题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西方国家工业化和老龄化速度都要快于中国，他们对于养老服务体系的研究较早。西方各国依据自身经济和社会状况制定了养老体系和养老政策。如今，西方各国的养老模式基本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他们越来越重视家庭养老，同时提高机构养老和社会养老水平。

二战后，随着家庭等非正式照料体系能力的弱化，西方福利国家产生了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由此政府投资新建了许多大型老年福利机构，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院舍化的养老服务^[6]。上世纪70年代后，由于经济滞涨，西方发生福利国家危机，人们的福利观念也发生转变，认为机构照顾是非人性化的，既不能帮助老年人适应生活，又加重政府财政负担。在这样的背景下，养老服务模式逐渐由机构照顾向居家和社区照顾转变^[7]。

1980年，美国学者埃德加·卡恩提出的“时间银行”是互助养老模式的开端，卡恩认为无论人们从事何种劳动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是平等的，他主张人们可以通过参加志愿服务的方式向自己的“时间银行”存“钱”，来换取其他人为自己提供的服务。这种养老模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不仅在美国，在西方其他各国也得到广泛应用。

近几年，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侧重点对社区老人照顾的现状和改革作了深刻、独到的分析。穆光宗认为养老模式可以分为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这些模式的区分主要是看由谁来供养，在现实中往往是多种模式的混合：居家养老是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有机结合，这种组合形式在城市正在日趋增多。矫扬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认为居家养老既可充分利用现有的家庭物质资源，又可根据老年人多年的生活习惯安排日常生活，节省开支的同时有利于保证老年人生活质量^[6]。对于社区老人照料存在的问题方面，学者们也通过调研等途径进行了分析。王金元认为政府制定制度

和安排资金方面缺乏相应的规范性和长久性，这也可能是导致我国社区养老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原因之一^[8]。赵聪锐、周玉萍认为目前社区居民和社区管理服务部门对社区养老的认识度很低。许多居民对社区养老很陌生，不知道社区养老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机构，参与社区活动也就不积极^[9]。

1996年，我国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指出“发展社区服务，逐步建立适应老人需要的生活服务、文化体育运动、疾病护理与康复等服务设施和网点，发扬邻里互助的传统，提倡邻里间关心、帮助有困难的老人”^[4]。同一时期在上海、天津、杭州等地陆续出现了具有自发性质的老年人互助组合养老模式。目前，家庭养老仍是我国主要的养老方式，互助养老只是存在于部分地区，处于试点时期，普通民众对这一概念仍不熟悉，有些甚至思想上处于排斥状态，互助养老的宣传和实践工作仍存在较大缺口，社会对这一新型养老方式的关注程度还需提高。

（四）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1、社会系统理论

社会系统理论中以巴纳德组织理论为代表的社会系统学派提出组织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协作系统，个人只有在一定的相互作用关系下与他人共同协作，才能发挥出作用。巴纳德认为能够进行信息交流、拥有做贡献的意愿并且具有共同的目的是作为一个协作系统的组织所应具有三大基本要素^[10]。互助养老这种养老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主体的多元性，互助养老机制中的每个个体虽然需求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们都想解决养老难的问题，各个主体都用自己的方式为养老体系的维持做出贡献，同时换取自己所需的服务。

2、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福利多元主义这一概念最早由沃尔芬德在1978年提出，他在专著《沃尔芬德的志愿组织的未来报告》中强调社会福利提供应吸收志愿组织力量的加入。福利多元主义主张政府不再是社会福利的唯一提供者，而是社会福利服务的规范者和购买者，家庭、社区以及各种社会组织都应该成为福利提供者。随着我国的管理模式向社会治理方向转变，用福利多元主义的理念指导养老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社区和社会组织成为提供养老服务的重要成员，老年人也应该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使自己的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3、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的方法。在研究过程中，通过查阅相关的论文、期刊、政策和书籍了解到互助养老的研究现状，加深对社区互助养老现状的了解。通过实地到大海阳社区进行调查了解到“我家厨房”项目的始末和具体运作情况，总结归纳了社区互助养老的运行模式、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并提出了建议。

二、大海阳社区“我家厨房”项目的运行模式

（一）大海阳社区的基本情况

烟台市毓璜顶街道大海阳社区成立于2002年7月，辖区东起文化宫西街，西至大海阳路，南起文化路，北至南大街，总面积0.6平方公里，总住户2528户，常住人口7469人，其中60周岁的老年人达到2100人，是典型的老龄化社区，基础设施和资源相对薄弱，管理和服务难度大^[11]。近年来，大海阳社区却逆境翻盘先后获得“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烟台市社区建设示范社区”、“烟台市先锋基层党组织”、“全国综合社区减灾示范社区”等荣誉称号，这离不开社区党委，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多方面的共同合作。

为更好地提升社区的组织力，破解社区治理难题，大海阳社区创新探索出党建带社建的“六个一”

工作法，为社区服务注入新活力，实现老旧社区“逆生长”。“六个一”分别是夯实一个坚强堡垒，这主要指强化党组织的领导建设，打造生态党建共同体；树起一面先锋旗帜，这主要指发挥党员的模范先锋作用；挖掘一位圈子领袖，这主要指挖掘社区居民的自治能力，打造一个孵化基地主要指与社群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和社区党委合作治理社区的四社联动机制；建立一项储蓄机制，这是指类似于“时间银行”的共享互助平台；建起一个网络平台，这主要指信息和资源的交流平台。通过实行“六个一”的工作方式，大海阳社区建立了完善的社区自治，社区互助的体系，由党员带头发挥模范先锋作用，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在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的帮助下开展了一系列的惠民助民项目，比如关注老年人文化生活的“壹家书画院”，以志愿服务换取其他服务的“共享幸福银行”，关注上学孩子午饭的“壹家小饭堂”等。

2016年社区工作人员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社区的部分老人在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上有些困难，很多老人都是自己单独居住，即使和子女一起生活，因为工作原因子女中午也很难回家给老人做饭。很多老人身体状况不好，自己买菜做饭对他们来说是个大难题，子女工作忙碌时老人很难按时吃上可口的饭菜。为了让老人能吃上营养均衡，口感适宜的午饭，社区党委书记萌发了建立社区厨房的想法，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社区厨房于2017年8月30日正式营业。

（二）“我家厨房”项目的参与主体

1、社区党委

“我家厨房”这个项目由社区党委主办，是社区党委书记在工作过程中发现老人的需求，率先发起的。在书记提出要建立社区食堂时，整个社区还缺乏建设社区食堂的基本条件，包括食堂用地、资金、厨师等。社区把这一项目列入社区为民办实事的清单，动员党员寻找各方资源，为社区厨房的建立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在社区厨房的前期准备工作中，社区工作者与居民协商奉献出自己的闲置的棚厦以满足扩大厨房面积要求，与厨房相邻的业主们协商进行厨房的装修改造工作，芝罘区委组织部也将该项目列为了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重点项目，给予了五万元的资金支持。社区工作者对于社区内需要提供就餐服务的老人进行了调查，详细了解了老人的需求以及家庭状况。

社区党委是党的基层组织，是社会治理中重要的一环，在互助养老中，他们是福利的提供者，是互助养老系统中的组织者。社区工作者在社区工作时间长，与居民的接触较多，居民对于他们比较熟悉而且有信任感。社区党委算得上是社区的“守门人”，是当地的权威机构，在互助养老项目前期的宣传动员方面，它的参与有助于项目的顺利进行；由社区工作者们带领社会组织成员进入社区可以帮助志愿者们尽快融入社区生活；社区党委还为项目的运行筹集到了部分资金，缓解了社会组织的压力。

2、社会组织

2016年4月，在烟台市、区组织部和民政局的共同支持下，大海阳社区的于占芬等5名老党员发起成立了烟台市红色先锋公益服务中心，这是一个由党员发起、专门服务党员和困难群体的专业社会组织。经过三年的发展，红色先锋公益服务中心由最初的5个人增加到了2000人，将26个社区社会组织全部纳入旗下^[12]。红色先锋的主要成员是广大人民群众，群众中那些有管理经验和领导能力的人带领成员进行社区自治，响应国家社会治理的理念。

在项目运行前该组织通过参加烟台市福彩公益基金举办的公益创投项目大赛争取到了扶持资金八万元。项目最初有23名工作人员，9位厨师，买菜、洗菜、切菜、洗碗、送餐等工作人员14名。这些工作人员都是组织的志愿者，也都是离退休的老人，年龄大多在五十岁以上。

社会组织在互助养老系统中扮演着管理者的角色，它也是福利提供者。烟台市红色先锋公益服务中心主要承担“我家厨房”的日常管理运营。社区厨房周一到周五为社区老人提供午餐，老人可凭饭票购买。为了精准的为老人提供服务，在餐厅营业前，社会组织就对老人的饮食喜好、禁食情况和特殊需求进行了摸排，虚心接纳了居民对于创建厨房提出的建议。老人需提前一天进行饭菜预定，以方便餐厅备菜，确保老人每天都能吃到新鲜的饭菜，避免浪费。社区厨房不以盈利为目的，饭菜均根据当日食材的市场价按照成本价出售，水电费用均由社区承担。

3、社区志愿者

社区志愿者是“我家厨房”项目得以顺利进行的中坚力量，他们在养老系统中扮演着服务提供者 and 未来的服务接受者的角色。志愿者们不仅在厨房正式成立以前帮助社区和社会组织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厨房正式运行后，主要是由志愿者经营。社区志愿者主要来源于红色先锋公益组织成员，社区党委还为餐厅联系了两位有经验的退休厨师做志愿者。

在厨房的准备阶段，公益组织为厨房的构建进行了一次募捐，有些志愿者不仅贡献了自己的劳动，还参加了募捐。厨房的装修由三名男性志愿者与装修队对接，他们因地制宜，反复修改了很多次装修方案。厨房有一套完善的员工规章制度，从考勤、穿着到服务质量都有明确的规定。厨房安排了每个人的值班时间，对于个人职责做出明确规定，并没有因为是志愿组织就疏于管理。考虑到志愿者们还有自己的家务事，他们每人每周值班一天。厨房对于卫生的详细严格的要求，每天开始做饭前都会打扫卫生，每周都会组织一次大扫除。志愿者们在接到居民的反馈后了解到大家都十分满意他们的服务，目前服务热情较为高涨。

4、社区老人

“我家厨房”项目就是针对社区内高龄老人、失能老人的需求建立的，社区里的老人是互助养老服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养老系统中的服务对象。在项目准备之初，社区工作者就对社区老人进行了调查，了解了老人对于建立社区厨房的需求度和期望。在老人报名预定社区厨房的饭菜时，工作者们就会对老人的个人健康状况和家庭状况进行了解，记下每位老人的饮食禁忌。老人也可根据自己喜爱的食物向厨房工作人员进行预定，厨房会根据实际情况满足老人的要求。

厨房营业以来受到了老人们的广泛好评，他们认为厨房饭菜的口味合适，价格便宜，最重要的是解决了他们吃饭难的问题。通过老人子女的反馈，我们了解到食堂的确帮他们解决了问题，他们可以更安心地把老人放在家里。有很多老人还给厨房送来了感谢信，他们的正面反馈是对“我家厨房”项目的肯定，也是对老年志愿者的激励。

（三）运行机制

通过对“我家厨房”项目的详细分析，考虑到我国其他几个典型的互助养老体系，比如青岛市的互助养老点，江苏“AA制”搭伙养老模式，邯郸的“互助幸福院”，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在整个互助养老过程中各个主体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只有各方协调合作，整个互助体系才能够顺利运行。

社区的高龄老人、失能、失独老人是整个服务体系的动力来源。老人有多样的养老需求，在服务开始前要对他们的需求进行调查评估，明确整个养老服务体系的目标。在服务过程中也要对他们进行回访，了解服务的阶段性效果以及他们的最新需求，为养老体系的运行注入新动力。必要时对有不同需求的老人提供分类服务，避免浪费公共资源，降低服务效果。老人对于服务的积极评价会鼓励各类互助系统工作人员继续做好本职工作，帮助他们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正是因为老年人有多样的养老

服务需求才有互助养老体系的建立和进一步发展。

社区党委是互助养老体系中的整合机构。社区在互助养老过程中主要扮演互助活动的主办者、社区资源的管理者和长效机制的供给者。居委会把参与互助养老系统的各个主体连接起来，是他们之间沟通的桥梁。社区工作者在基层工作中发现居民存在的困难，联系到社会组织和政府资金，帮助社会组织进驻社区，还提供了一些社区资源，为互助系统的顺利运行提供保障，在互助系统的前期建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有社区居委会为社会组织提供支持，社会组织能顺利在民众心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

社会组织是整个互助养老系统的控制机制，整个养老项目的具体运行处于组织的控制之下。组织领导者确定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案，对于人员的职责、奖惩方案，厨房的操作流程，进出账目进行明确的记载。在组织内部还要建立统一的质量评估体系，推动服务走向标准化。通过了解老人对他们服务的满意度和意见，社会组织会进一步改善他们的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

志愿者是互助养老系统的操作系统。志愿者主要负责项目的具体运行，发挥他们自身的专业优势和能力，做好本职工作，保障互助体系的正常运行。老年志愿者的积极参与也可以起到带头作用，鼓励更多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扩大互助养老体系的规模。

三、社区互助养老存在的问题

（一）对志愿者的激励不足

在“我家厨房”项目中，参与互助养老的志愿者们大多是无偿服务，仅靠自己的助人信念和社会赞誉为支撑参加志愿活动。社区建立互助养老点的初衷肯定是希望互助养老项目能够持续运行，那么如何保证有足够的志愿者能够参加互助养老活动，吸引更多志愿者参与进来就成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虽说老年志愿者的健康状况相对而言较好，空闲时间多，参与志愿活动可以丰富他们的日常生活，减轻他们的孤独感，缓解退休后难以适应等问题。但老年人的生理条件有限，他们能够提供的服务的专业度和时间长度有一定的限制，并不能满足当前社会的养老需求。老人参加志愿服务前肯定要对风险进行评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比年轻人更多地风险，相关部门需要考虑给被服务老年人和提供服务老人双方提供保障，避免意外发生后有责任纠纷，减弱老人参加志愿服务意愿。年轻一代由于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参加志愿活动的时间本来就有限，再加上新老一代的代沟较大，缺乏互助养老方面的知识，参与活动的人数较少。

（二）居民对于新型养老方式的接受度不足

在“我家厨房”项目中，一开始参加这个项目的老年人只有22人，对于一个老龄化社区来说参加率很低。社区厨房运行一段时间后，到社区就餐的老人才日益增加，现在已经是最初人数的四五倍。中国人传统“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虽然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大多数老人还是选择居家养老，以免子女戴上不孝的帽子。有些老人认为自己操劳了一辈子，好不容易退休，不想到老年还要伺候与自己不熟悉甚至毫不相干的人；对于另一些老人来说，幸福的老年生活就是帮子女带孩子，等到老了靠子女给自己养老就可以了。还有老人担心即使自己参加了互助养老，等到自己需要帮助时也未必能得到服务，这种延时回报的服务方式得不到他们的信任。互助养老这一新型养老方式被人们真正的了解和接受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年轻一代生活在传统价值观念衰落，生活在金钱至上和个人主义兴起的时代，互助意识薄弱，在与父母的关系上更强调父母抚养自己的权力而非子女照顾父母的义务，比起“时间银行”这种养老互惠模式，他们更倾向于把做志愿活动的时间用来赚取养老金。有些人把老人为自己看孩子看做理所应

当，难以理解老人舍下自己孩子却照顾其他老人的行为；还有部分子女对于志愿者的专业性存有疑虑，害怕老人得不到良好的照顾。

（三）社区缺乏互助养老的基本条件

目前，我国大部分社区缺乏互助养老的基本硬件设施，比如建筑用地，资金和基本的医疗设施等。“我家厨房”项目也是在发展过程中，一步步完善好硬件设施的。大多数城市居民居住的为商品房，在设计房屋建设时对居民的文化生活和照看方面关心较少，没有基本的文娱场所和日间照料机构。城市社区的居民交集很少，他们基本没有参加过社区的集体活动，邻里间的陌生疏远，不向农村社区那样守望相助，缺乏互助的氛围。物业组织属于盈利性机构，在社区居民中的威望和信任程度不够，难以动员群众参加互助活动。一些基层地方组织比如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无为，只有在执行一些政策时才会到社区走走过场。居民也只有有需要到街道办事处时才会对有关部门进行了解，有些基层办事处独自承担起组织基层养老活动的组织工作也有一定困难。

（四）资金来源匮乏

参加互助养老活动的老年人家庭经济状况大多一般，老人的养老金普遍不高，在“我家厨房”项目中被服务的老人每月退休金大约三千元左右，随着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靠老年人自己的资金进行互助养老并不现实。

“我家厨房”项目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福彩公益的赞助，区组织部支持，资金数目不大仅供项目初期的运行，如果厨房要扩建或重新装修则需寻找新的资金来源，缺乏长期有效的资金投入。政府部门尚未出台有关互助养老组织的扶持政策，也并未把互助养老项目划到政府的预备资金里，各地方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均做法不一，尚未形成稳定的财政供给渠道。各种基金会组织和民间组织筹资渠道狭窄，服务能力不足，而且资金流向的透明度不够，目前在社会上还遭到很多质疑。

四、对于社区互助养老的发展建议

（一）建立科学的志愿者管理系统

志愿者是互助养老的实践者，老人即使互助养老的服务提供者又是服务对象，老年志愿者素质的高低对于吸纳更多老人参与互助养老活动有一定的影响。在志愿者提供服务前应该对他们进行培训，包括服务态度、服务理念、心理健康知识、专业技术和评判标准等，只有考试合格的志愿者才可以参与志愿活动。在志愿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应由专业人员对他们的服务进行监督和评估，定期进行总结，发现需要改进的地方。

建立一套全国联网的互助养老志愿服务系统，解决志愿者因搬迁等问题无法获得老年志愿服务的后顾之忧。志愿者们的服务记录方式可以仿照“时间银行”的管理方式按时间计算，不考虑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因为每一种工作都帮助了他人，都有意义。对于那些不愿换取老年服务的志愿者，可以把他们的服务时间折算成现金或者其他服务，比如年轻人可以把自愿服务时间换成产子期间的母婴照顾服务，参加志愿服务活动长的年轻求职者在同等情况下应该优先录取等。

（二）通过政府和媒体力量进行宣传

互助养老模式尚不普及，普通民众对此了解少，甚至没听说过这个名词。要让民众尽快的了解和接受这种新式养老，就要借助政府和媒体的力量。19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刚开始实行时也未受到人们的重视，直到1982年计划生育被写进宪法，并且出台一系列的法律法规，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多子多福的观念才慢慢改变过来^[13]。在互助养老推行的过程中，政府的宣传工作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果政府能出台相应政策并且在官方渠道进行宣传人们会更快了解到这种养老模式。可以邀

请政府工作人员和法律从业人员到村镇为人们开展关于互助养老的知识讲座，鼓励有养老需求，有服务意愿的老人参加。21世纪是互联网时代，运用互联网传播信息有迅速便捷等特点，如果能够把官方的政策用民众的话语解释多方进行报道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在各大网络平台宣传互助理念，拍摄有关互助养老的宣传片、纪录片、小视频，让人们用更直观的方式了解它，让互助成为一种习惯。

（三）因地制宜制定互助方案

各地区的老龄化程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价值观念也有差异，政府部门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开展工作。根据2010年的统计，我国老龄化程度高的城市都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中尤以上海为最，西部地区老龄化程度较低。东部地区老人的退休保障较西部地区的老人更好一些，但其子女的生活压力比较大，容易忽略老人的精神需求。东部沿海城市中还有很多迁移人口，在国家卫计委新近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显示，举家迁移已成当前人口流动的主流趋势，流动老人数量不断增长，已占流动人口总量的7.2%^[14]。如何帮助这些随迁的老人安度晚年，融入新的社会环境，加入互助组织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与东部地区老人相比，中西部地区的老人更多地面临经济问题以及空巢问题，在养老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应该注意他们这些方面的需求。各地应根据实际调查，了解老人的切实需求后，确定互助养老方式，以保证养老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四）参与主体多元化

“互助养老”服务的参与主体不能仅仅是老年人自身，虽然这一养老方式倡导“以老养老”，但仅靠老年自身是无法解决养老问题，“互助养老”是在“居家养老”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后者的补充。家庭是养老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老人养老的主要地点，志愿者带来的关爱和服务无法代替家人的关心和照顾。在任何情况下，家人的照料都应该是养老体系里最重要的一部分。

社区还可以引进专业的社工组织，让社会工作者来链接各方资源，监督养老组织的具体运行工作，减轻社区的压力。扩大志愿者的招募范围，不同年龄的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一样，老年人有共同的经历会有很多共同语言，孩子们却可以减少老人迟暮时的忧伤，给他们带来活力，比如德国的“多代屋”。政府可以出台对于互助养老的支持性政策，倡导人们参与到互助养老体系的建设中来。可以建立起以家庭、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的四社联动型养老体系，聚集多方力量和资源，建立科学养老体系。

（五）拓宽资金来源

目前互助养老服务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由于服务属于非盈利项目，人们理所应当的认为政府应该承担资金筹备工作，往往会忽视社会组织的作用。政府的确应该对孤寡失能老人进行补贴，建立专项养老基金，加大贫困老人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动员各地基金会，福彩公益组织等对互助养老项目进行捐助^[15]。企业也应该积极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对于退休职工给与关怀照顾，提升企业形象。鼓励企业参与慈善活动，对于积极参与慈善事业的企业给予税费减免等优惠。加强对于各类福利组织的监督，鼓励他们为互助养老系统的建立捐助资金，防止组织内腐败贪污的现象出现，保证组织资金流向透明化。

五、结语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效果的进一步显现，我国的老龄化程度还会进一步加深，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会越来越突出。“互助养老”作为老龄化背景下的新兴事物对于解决目前的养老难题，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有莫大的帮助，但这种养老模式在我国还处于探索阶段，有许多地方需要完善。

通过阅读国内外的文献，本文对互助养老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介绍。主要以“我家厨房”这一项目

为例探讨了互助养老的运行模式，分析了互助养老的各个主体，以及各主体在互助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参考我国目前几个典型的互助养老项目提出了互助养老体系存在的问题，对于互助养老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意见。本文的局限性主要在于只是重点探讨了大海阳社区的一个互助养老项目，对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的互助养老模式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提出意见的普遍适用性有待提高。期望以后能有机会实地研究更多的互助养老项目。

建立科学可行的互助养老体系对于缓解社会的养老压力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一体系可以动员多方力量，减轻子女的负担、政府的养老压力，让每个人尽其所能在互助体系中发光发热，对于解决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难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程志强、马金秋，2018，《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演变与应对之策》，《学术交流》。
- [2]董自龙，2013，《我国城市社区互助养老问题研究》，浙江财经大学学位论文。
- [3]蒋汉成，2017，《“参与互助型”居家养老模式探究》，安徽大学学位论文。
- [4]曾榆桂，《武冈市农村机构养老服务供需调查研究》，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位论文。
- [5]睢党臣、彭庆超.2015，《社会保障领域腐败问题的经济学分析与对策研究》，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97期。
- [6]矫杨，2000，《发展社区服务是实现居家养老的重要保证》，《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第3期。
- [7]曹慧珊，2019，《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融合发展研究-以南京市为例》，南京师范大学学位论文
- [8]王金元，2008，《城市老人居家养老的现状与对策——以无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为例》，《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
- [9]赵聪锐、周玉萍，2011，《城市社区养老模式探讨——城市社区老年照顾有关问题分析》，《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第2期。
- [10]彭华民、黄叶青，2006，《福利多元主义：福利提供从国家到多元部门的转型》，《南开学报》第6期。
- [11]冷晓燕，2018，《芝罘区大海阳社区-党建带社建-老社区焕发新生机》，《中国社会组织》第35-36页。
- [12]冷晓燕，2019，《烟台市红色先锋公益服务中心-让幸福“大海阳”变得更加幸福》，《中国社会组织》第44-45页。
- [13]阎云翔，2017，《私人生活的变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87-273页。
- [14]王瑜，《流动老人占流动人口总量的7.2%随迁老人进城易融入难》（http://www.sohu.com/a/216566603_267106）。
- [15]王伟进，2015，《互助养老的模式类型与现实困境》，《行政管理改革》，第65-70。

☆作者简介：王盼盼，河海大学社会学专业2020级硕士

☆责任编辑：徐婧怡



性别 与家庭

民族地区

家庭养老支持力的身体塑造与具身实践¹

孟 皓 王毅杰

摘 要:现阶段,家庭养老仍是民族地区养老的主要模式,而养老支持力则决定了家庭养老的成效。本研究结合西南民族地区YN乡家庭养老实践经验,依据身体社会学理论,探讨家庭养老支持力在养老过程中的具身实践和身体塑造过程。研究发现具身实践凭借身体训练、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和身体表演三个过程渐进的呈现养老;另外,塑造身体的力量也并非单一,而是由家庭中的“家屋”身份认同、话语和时空结构共同构成。此研究将有助于理解民族地区养老实践中身体的特征、运作方式和效用,进而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有意识的加强对养老支持力的身体塑造。

关键词:家庭养老 养老支持力 身体塑造 具身实践

一、引言

家庭养老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模式,它是指养老支持力来自于家庭成员的一种养老模式,基于家庭、社会以及个人之间存在的联系性,穆光宗将家庭养老分为完整的家庭养老和不完整的家庭养老模式,完整家庭养老模式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在家养老和子女养老相结合的形式;不完整的家庭养老模式是两者分离的一种形式;而姚远将家庭养老的概念区分为家庭养老模式和家庭养老方式,两者虽在类型划分上存在差异,实则都是强调养老的支持力来自于家庭成员。

在民族地区,家庭养老模式是主要模式,学界的研究集中于民族地区养老的影响因素、模式探索以及老年人现状描述和存在问题分析;然而,伴随城市化进程加速,社会流动的增强,城乡一体化政策全面推进,家庭养老赖以生存的根基受到动摇,家庭养老支持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如何应对这一难题?

事实上,养老支持力蕴含着在多大程度上动员各类资本,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的意涵。不论是养老金支持还是养老服务提供都映射出支持力的效用,而养老研究归结到底还是围绕着“谁能提供养老支持力”展开。据此,学者们提出构建多元养老支持力才是解决养老困境的题中之义。大致归纳为以下四类:第一,家庭、政府、社会和社区四位一体的养老支持系统建立方能全方位的提供养老支持力,缓解养老困境;第二,老年人身体机能的衰退需要配套的医疗机构,因而构建民族地区“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是多元支持力的现实体现;第三,基于文化层面,探讨在遭遇现代化冲击下,民族地区家庭养老秩序松动引起的孝与养的失衡;第四,家庭养老与社会其他要素间关系研究。麻学锋论证了民族地区家庭养老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涉性。合而观之,这些研究聚焦于家庭养老的外围空间,从制度性、

¹ 本文已刊发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文化性等宏观层面着手，探讨如何提供更加合理的支持力，而内在逻辑是将老年人预设为需要帮扶的“弱者”。

事实上，上述研究忽略了一个重点，老年人是具有主体性的行动者，在外界环境施加作用力的同时，其本身也会生成相应的行动策略，而现有的研究大多缺乏基于老年人主体性、关系模式和行动逻辑的讨论。支持力，本就是行动者根据主观意识发出的行动，实现对于接受者的一种认可和支持。而这种行动的实现，一方面端赖于客观结构化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来自于被称为“行动着的自我的场所”的身体。

身体社会学则为我们提供一种异于传统宏大叙事的视阈，将“身体”概念引入其中，形成勾连结构与行动的中介。它帮助我们更清晰地洞察社会现象，厘清现象背后的逻辑规律，从而建构起知识结构和意义表征。随着乡村振兴政策的深入，对乡村地区老年人的关注亦在加强。如今，学界基于乡村场域，身体与养老行动结合的研究较匮乏，鲜有学者对养老实践中的身体进行解析。已有成果也仅基于身体社会学视阈下对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状况的调查研究，且更多着墨于老人生活状况，运用身体社会学的分析路径也较为宏观和宽泛，未能清晰洞见养老过程中身体的表征、运行机制及原理；基于此，本文将立足于身体，试图剖析养老过程中身体实践逻辑以及洞悉身体的形塑过程，更好的还原家庭养老中具身化的互动过程。

二、个案介绍、调研方案与分析框架

（一）个案介绍

笔者于2019年4~11月对西南地区YN乡进行实地调查研究，重点选取LS村和ZB村两个摩梭人村社。LS村和ZB村的选择基于典型性的原则，从外来资本介入程度、家庭经济收入状况等显著性因素来划分，笔者希冀基于这些差异性，剥离出一般性原则。2019年LS村共238户685人，人均年收入为22000元，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为182人，占比为26.5%；ZB村共90户1203人，人均年收入为9850元，60岁以上老年人为285人，占比为23.6%。两村在地理位置上存在明显差异，LS村地处泸沽湖畔，拥有得天独厚的空间位置优势，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大量外来资本介入社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日常生活秩序；ZB村远离泸沽湖景区，受外来资本介入程度较低，传统文化及道德规范主导了当地日常生活秩序。

表1 调查研究方案设计

	调查对象	调研方法	调查过程
第一阶段	当地乡政府、泸沽湖管委会	结构式访谈	笔者多次前往当地政府部门访谈并收集相关文本资料
第二阶段	当地村委会	结构式访谈与非结构式访谈相结合	笔者对YN乡2个村委会展开详细访谈，了解本乡老年人的具体情况、养老现状、政策支持等信息。
第三阶段	当地村民家	非结构式访谈	对YN乡LS与ZB两个村村民(共32户)进行入户调研，主要采用深度访谈、个案研究以及参与式观察等研究方法

为了更好了解老年人养老状况，笔者对两村数位60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内容包括：日常生活状态，精神慰藉程度以及家庭成员关系。访谈发现摩梭老年人在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均呈现出良好状态。在经济供养方面，老年人完全能够实现生活需要的满足，家庭经济收入的分配也倾斜于老年人；在生活照料方面，由于家庭成员众多，照顾的压力被分摊，进而提升了家庭成员日常照顾的质量；在精神慰藉方面，由于摩梭老年人具备丰富的精神养老资本（灵性资本、家庭

关系、社区资源），因而精神生活质量高。在养老支持力方面，摩梭人独特的养老方式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加充沛的支持力。母系氏族的家庭结构使得家庭成员在义务、责任等方面迥异于其他民族，采用走婚的婚姻方式，男女双方分属不同的家庭，共有子女的抚养权归属于女方，相应的子女承担赡养母亲的责任；而男方的赡养责任则由自己母系家庭的侄儿侄女来承担。随着现代文明的冲击，男方的赡养方式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养老支持力由单一化变为多元化，不再仅限于侄儿侄女也加入自己子女，这就使得摩梭人养老支持力更加多元。

（二）调研方案

此次调研主要采用深度访谈、个案研究、参与式观察等方法，其中深度访谈是本文的重要资料来源。调研活动主要分三个阶段，具体阶段调研内容如表一所示。首先，针对研究对象，制定一整套详实的访谈提纲，按照当地老年人基本情况、养老现状、存在问题、难点、成因等内容进行设计；其次，深度访谈可以帮助笔者获得最大化的信息资料，在调查研究中采用深度访谈有益于笔者洞见身体与养老行动的关涉性；再次，凭籍摩梭人当地朋友作为“翻译”可以无障碍地与不懂汉语的老年人进行交流，直接捕捉信息；最后，将信息进行整合与分离，从杂乱的信息中提炼出一般性规律，实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三）分析框架

社会建构论的身体观强调，身体源于社会建构，一些结构性的要素将会塑造身体；而这些被塑造的身体又会发挥自身效用，有意识的引导行动的发生，据此归纳出以下的分析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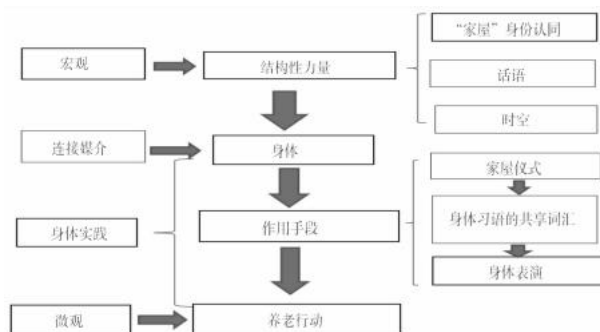


图 1

图一呈现了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互动，摩梭人家庭养老的发生是一个身体主动实践的过程，它凭籍三个过程（家屋仪式、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和身体表演）得以呈现，身体在其中扮演着连接媒介的功效，而整个过程中身体被家庭中一些结构性力量所塑造（家屋身份认同、话语和时空），这些力量凸显着摩梭人家庭结构的特征。需要注意的是塑造身体的三种力量并非完全对应三种手段，这是因为塑造的力量是混合作用于身体上，并不会产生如弗兰克所说的四种理想身体，反而产生了混合有三种力量的现实身体；在身体实践作用手段的选择上，主要是基于显著养老效果。

三、身体与养老：家庭养老过程中身体实践的表征

身体与养老的关涉性，本质上体现出身体在养老结果样态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这是实现养老过程中身体实践的呈现。身体实践是行动者凭籍身体对于外部环境的刺激，作出的主动性选择，它是一种具身化的体验。然而，存在一个不争事实，那就是老年人身体衰弱、精力渐退，他的身体逐渐从公共关注中隐退。此时，老年人身体是否还能驱动实践？如果能，它又是如何推动实践的发生？这些内容值得深入研究，笔者基于微观互动视角，围绕着身体如何驱动养老实践展开，试图还原摩梭家庭中养老的生成过程。

（一）家屋仪式中的身体训练:养老实践的认同教育

家屋仪式是指在家屋情境内，成员共同参与的家庭集体行动，它通过戏剧表演的方式呈现出一种心理意向，而这种意向是家庭成员将某种虚幻转换为现实的愿景。在家屋仪式中有着明确的实现目标，或长或短，或近或远，但总体来说，均是家屋集体意向的表征，希冀依靠仪式将家庭成员拉入家屋目标轨道中来。一般来说，仪式会赋予角色与其社会地位相符的力量。

在仪式中，被赋权的老年人身体，会尝试与其他角色身体之间建立关联，而这种联系有助于保障仪式的进行。对于那些正常状态的身体，老年人身体会给予肢体或言语的肯定；对于有越轨倾向的身体，及时进行纠正和调试，保证身体的正常状态，从而维持仪式的进行。这种老年人身体的回应，其实就是一种身体训练，看似简单却在摩梭养老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家屋仪式中的身体训练，老年人身体可以向养老支持者身体实现养老思想的代际传递，而这种传递是无意识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

用餐仪式是摩梭家屋仪式中的一个缩影，往往就餐前，这个仪式就已经开始。过去的分餐制强调的是将有限的食物合理分配，食物分配的行动过程呈现的是一幅敬老的图景，有意识的强化着养老支持力的身体认同。

分餐有一整套规矩，给老祖母分比较好的、嫩的肉，如:鸡肝、鸡胸肉；舅舅，姨妈分的是鸡翅、鸡腿；剩下的留给家里的小孩子、兄弟姐妹；鸡肋骨、鸡脚这些留给自己。（ZB 村民访谈，AQDZM20190505）

现今的经济较好，不再分餐，但却以另一种方式在强化着家庭成员的养老认同。从饭菜位置的摆放、筷子递送的手法、敬锅庄人员的选择，到用餐的先后顺序无不映射出仪式中老年人的权利和地位；它是一种主动的仪式教育，通过家屋仪式赋予生活情境，在持续的家庭成员身体互动中，强化老年人身体地位。

家中的达布端上饭菜，摆放的位置有一定的讲究，将那些嫩的，爽口的硬菜放置于靠近祖母和舅舅的位置，第一双筷子一定是先放置于祖母、舅舅面前；此外，添饭和倒水也很有讲究的，给老人添饭时只能顺手，不能反手，递茶送碗则要用双手。如果做不好，家中老人都会直接批评。（LS 村民访谈，AQN20190505）

（二）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养老行动的过滤器

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是指在特定的场域内形成，并被人们认可的一整套身体行为秩序准则，它会对身体信号进行分类，从而为行动的发生提供依据。它由共享的非言语沟通方式组成，包括:穿戴、举止、姿势、动作等。戈夫曼将身体意义的产生理解为，由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来决定，且后者不受个体直接控制。人们会根据这套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来建构起个体交往互动的平衡。

当养老支持力的无意识身体进入身体训练或者身体规划的情境中，身体意识开始觉醒，一系列与身体相关的反馈信号随之出现，如:仪表仪态的端庄、态度的端正和微笑或者点头的出现。事实上，身体反馈信号并非完全利于养老实践的，对于这些副作用于养老的身体信号（轻蔑的表情、焦躁的情绪或者摇头等）而言，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形成了甄别准则。凭籍与该准则性质的差异，伴随观看者身体回应的方式，赋予身体相关的意涵，如:点头被视为与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是同质的；摇头或者叹气则被视为与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是异质的。换言之，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都是被当地社区所认同的沟通方式。

身体信号在经过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筛选后，将形成两条路径:一条是实现认同的路径。当身体信

号通过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后，直接进入共享词汇建构的轨道，个体将自觉开展养老实践；另一条是不被认同的路径，由于进入的身体信号与共享词汇之间的异质性，这导致无法进入预设轨道。在此，外部力量就会展开对于偏离轨道的修复，从而帮助返回到共享词汇搭建的轨道。此时修复的手段主要体现为教化和惩罚。

我们村里大部分家庭都有亲戚关系，也就有很多大家达成默契的原则，比如：对于村里年纪大的老人，不管哪一家做好吃的，都会在五月节这天送给老人一份；任何一个村里的老人生病了，全村人都会去看。如果我不这样做，全村人都会看不起我的，那么以后我在村里就再也抬不起头了；那些不去看老人的年轻人会被长辈教训，甚至全村人都会不跟他来往，一段时间后他就没办法在村里呆了，只有自己改变才能回到群体中来。（LS 村民访谈 GSYD20190415）

（三）身体表演：养老行动的呈现

摩梭人家庭养老行动的展开恰似日常中的一幕戏剧，拥有戏剧表演中的全部要素：表演者、参演者、观众、舞台设置。老年人是表演者，养老支持者是参演者，两者在养老问题上共同表演了一场戏剧。演出前，该戏剧的角色就已经确定，角色的确定则意味着个体总是会极力的表现自己扮演的角色并准确的传递情感，而不仅仅只是情绪发泄。这种情感是表演者和参演者在表演中极力聚焦的核心；表演中，表演者凭籍各类符号媒介（衣着服饰、行为动作、言语）运用身体语言向观众传递某种意义，而台下的观众也予以充分的回应，正因为它的存在，这使得演出者和观众之间互动的桥梁得以建构，而这又是演出再生产的关键。

那么演出过程中身体意向是如何转换成养老行动的？事实上，整个转换过程是在表演情境中实现的，以下我们就来探讨这一转化路径。

基于威权，老年人身体定义了表演情境，当然这一情境中一定是嵌入了某种主观意义，包含有维护老年人养老权益的意愿。当参演者身体进入该情境中，不自觉的产生了认同或者不认同的倾向。如若认同，表演者和参演者会彼此达成一致，采用身体配合的方式传递一种养老意涵，并在那些未分离于乡村社会活动的村落知识的儒化教育作用下，潜移默化的转化成为养老实践；然而，并非每个参演者从内心深处都认同这种情境，那么这场演出是否还能进行？此时演出将会进入另外一条路径。由于社会要求身处其中的个体都要能够压抑自己内心的感受，只对别人表达那些暂时能被别人接受的想法，且在对别人重要而自己却显得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保持沉默，这就会形成互动关系中的“临时妥协”^①。如若，参演者内心并不认同该情境，但基于“临时妥协”的作用力，并不会直接产生明面上的排斥或反对，而是会采用继续配合演出的妥协策略。因而，在此演出过程中，参演者会以自己的方式来对抗该情境，例如：出工不出力、台下的抱怨等。演出结束，这种临时妥协关系可能会瓦解，参演者将又会回到原来不认同的状态；此时，熟人社区中的道德伦理、社会秩序、行为规则等要素开始发挥作用，规范了这种“越轨”行为，将它重新拉回正常轨道，这也就保证了演出的再生产。

娃里米节（农历五月初五）是摩梭老人的传统节日，这天需要饮用泡有各类花朵和药材的苏丽玛酒，还要祈求神灵和祖先保佑村庄风调雨顺。此时，一场在“喝醉”的舅舅和侄子之间的身体演出拉开序幕，主角们在舞台上极力表演，而观众对此给予反馈，呈现出养老中的身体配合。

在这一天，每一个外甥都要去背自己的舅舅，那时候的我还年轻，玩心重，不太愿意去的；记得有一次，我和伙伴在外面玩得正开心，通知我去格则家背我老舅，换作是谁都是不愿意的；但是没有法子呀，不去村里人会教训我的。其实，他根本没就醉，趴在我背上还跟我说是装醉的，就是要让你来背我；我心里当然不开心，能够好好背吗？哪里颠我就走哪里，也让他不好受；只是在村里时间久

了，年纪大了，我就不再会这样，老舅年纪大了，能背一年算一年，以后想背都没有机会。（ZB 村民访谈，GSDS20190504）

老年人身体和养老支持者身体的表演是在特殊的情境下展开的，它既包含有时间符号，又蕴含行动目标。演出的剧本提前写好，而舞台的布置也是带有明显的目的性，为的就是呈现良好的结果。舅舅身体和外甥身体在舞台上极力配合，呈现出观众都想要看到的结果，此时的观众既是观看者，又是监督者，台上表演者的行为举止都会引起他们的身体反应；当外甥身体不情愿的入场后，“临时妥协”的功效发挥作用，避免外甥身体与舅舅身体产生正面冲突，从而导致表演的中断。于是两者在舞台上达成了“一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实现真正的合作，随后外甥身体的主体性发挥功效，采用“哪里颠就走哪里”的方式呈现出来。

四、对身体做了什么

家庭养老中身体的塑造身体实践不断的作用于家庭养老，产生养老支持力，驱动了养老发生。那么身体实践如何发生？以下我们将着墨于身体的塑造过程，也就是“对身体做了什么”。笔者认为在摩梭人独特的家庭结构下，身处场域内的个体会被施加一种强制力，它采用身体训练的方式对个体行动进行规训。家庭场域内结构性力量的多元性决定了身体训练方式的多样性。因而，笔者从众多结构性力量中选择了最具代表性的三个要素（“家屋”身份认同、话语和时空结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真实地反映摩梭人家庭结构特征，且与身体互动最为紧密，最能诠释身体的塑造过程。

（一）“家屋”身份认同下的身体塑造

家屋身份认同——个体身份认同的一种类型——是指个体成员在家屋情境下产生的对于家屋成员关系的身份认定、情感归属、自我认知以及家屋未来发展规划。家屋情境和身份认同间具有紧密关联性，身份认同是在家屋情境中展开的，是个体在家屋情境中获取的一种意义，本身蕴藏着结构性特征，而它的发展轨迹又会囿于家屋情境的变化。戈夫曼在污名的阐述中认为个人是从照镜子过程中获取了自我认同。这面镜子就是家屋情境，尊老爱老的养老观念深嵌其中，不断修正着家屋成员“偏离”的自我认同。那么，家屋身份认同又是如何影响个体成员身体？“家屋”身份认同的强弱均会引起个体成员身体表现的变化，当外部力量质疑或阻碍了家屋在社区中角色的顺利扮演，身份认同强的家屋成员会对此反应强烈，并在身体上表现为愤怒、不安、沮丧；如若外部力量对于家屋角色给予的是认可和称赞，那么，家屋成员身体的反应表现为开心、满足等状态；身份认同弱的家屋，成员身体的反应是平淡的，并不会因外界力量的信息，而产生明显的波动。

希林认为人们将身体理解为成为过程的实体，身体的规划也被认为是个体自我认同的构成。^③家屋成员的身体规划实为身份认同的体现，以家屋认同为基础，成员凭籍身体管理、规制，将自我身体切分成多个部分，重新认识并赋予监督、维护和重构，顺利实现家屋共同目标。为满足家屋老年人养老需求，家屋成员调整原有的身体规划，重新制定自我身体发展策略，并对身体进行严格管理。

2009年，我大学毕业后就留在昆明工作，我学的专业是计算机，后面就认识了我现在的媳妇，她是思茅人，我俩本来是准备定居在昆明。2012年家里出了点事情，我阿妈住院了，但是当时家里一个子女都不在，我两个妹妹也都在外地安家了。事后，我们觉得家里面老人的年纪大了需要有人照顾。本来按照摩梭大家庭习惯来说，至少我妹妹要有一个回来当家，照顾老人。但是我是家中的老大，最后就回来了。（当笔者问起回来的原因）回来其实也不需要什么理由，我们摩梭人的最终归属还是在大家庭嘛，只是苦了我媳妇，打乱了她和原来的计划，原来我们打算在昆明安家，两年内就要娃儿，现在我们两个分居两地也还没有娃儿，原来学的专业也都废了。（ZB 村民访谈，ALNM20190503）。

ALNM 的个人经历是基于“家屋”身份认同下身体做出的选择。身体的离场，并不意味着塑造过程的消失，它会采用其他的手段来干预身体的成长以及选择；当老年人身体的权益遭遇威胁时，“家屋”身份认同会被强化，当然这种强化手段包含内隐于个体身体中的道德秩序和外显于个体身体的身体管理或规划，凭籍内外共同作用，重新形塑个体成员的观念和意识，进而重构家庭成员关系，实现老年人养老权益。

（二）话语中的身体训练

话语是被真理、权利所建构，它将特定的意义组合起来，生成社会关系；话语又是实践的内在部分，且较好地呈现实践的展开原则。养老行动的展开离不开被建构的养老话语体系。

同时，身体在话语中逐渐生成，并且存在于我们的话语之中，它是高度可塑造的现象，可以贯注各式各样变动不居的权力，而知识根植于身体，受身体形塑，与身体结合。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框架：话语——身体——知识。

在摩梭文化场域中，话语是村落文化实现心智控制的媒介，映射的是知识体系和思维习惯；它推动村落文化中养老思想意识裹挟着技术手段施加于身处其中的每个成员的身体，这个过程经过长期运作逐渐塑造出一整套行动准则，这也塑造了摩梭社区成员的社会关系；与此同时，这种社会关系加速了社区成员之间互动的频率和深度，有助于地方养老知识的生成，这种知识不仅是一种普遍性的知识，更是有关价值评估、行为规范的规范性知识，它能有效地甄别人们的各类行为，修正价值观、提供意义判断，从而规训了养老支持者的身体，调整了行为模式，使得整个过程更加符合摩梭老年人养老的根本利益，愈益成为当地社区主流知识。

事实上，摩梭话语被家庭权利的掌舵者——老年人所控制，并加以建构。原本一些简单的话语经过处理，会变成富含丰富蕴意的话语。这种被重塑的话语是摩梭村落文化与特殊家庭结构结合的产物，它被赋予道德准则，一旦越轨者跨越边界，意味着它突破了整个家庭乃至社区千百年来建构的道德伦理，必将遭受相应的惩罚；人们为了保障话语的延续性和稳定性，采用符号化的方式来加以巩固，如在一些具有特殊意涵的日子（民族节日）里讲述的话语。

摩梭人的话语如何作用于身体？囿于篇幅，笔者将从众多话语中选择拼接叙事来阐释。

拼接叙事是指有意识的将几段看似毫不相关的话语材料进行组合，使其合并成一整段具有因果关系的逻辑话语，最终达成说话人的主观目标。而拼接内容的选择往往基于说话人的主观目标而展开，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会蕴藏明确的策略性；在话语阐释时通常加入一些熟悉的情境知识，增加事件的真实度；凸显事件之间的关涉性以及结果的严重性，也是拼接话语的特点。

拼接话语的使用常见于摩梭人代际之间，家庭情境中父代为了彰显自身威权，维护养老权益，对于子代身体进行的话语控制，以下的例子能帮助我们理解它的意涵。

我小舅跟我讲隔壁村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儿子不孝顺，经常不给老人吃饭，稍不如意还会乱骂人，他们村里人看不惯也都跟他说过好多次，但是没有啥用。有一天他去田埂放牛，竟然被一个雷给劈死了，这就是报应，对自己的父母不好，老天是看在眼里呢。后来我才知道真实情况，确实隔壁村有人死了，只是他是病死的，根本就不是被雷劈。（LS 村民访谈，CRDJ20190503）

其实上述案例中，我们看到了拼接话语的应用，事实上完全不相干的两件事：不孝顺和被雷劈，硬生生被拼接到一起。它的讲述者——老年人，是基于培育倾听者的养老意识的目的而展开的，在话语叙事中一些不可抗拒的力量（老天爷、雷电）被有意识的引入来提高话语的合法性。往往这些话语是由具有较强目标驱动和理性决策的因果逻辑所组成。是故，拼接话语极具导向性。

（三）时空结构中的身体塑造

特殊的节日是摩梭人时间符号的表征，一方面，凭籍这种方式实现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另一方面，时间符号中蕴藏的老年人权益也被潜移默化的传递到个体成员身体上，形成身体的时间记忆，这也就是摩梭人对于这些重大社会活动记忆深刻的原因。在时间施加控制于身体的过程中，个体成员通常是毫不知情的，主动地接受它的控制，这似乎就是一种内隐式作用。养老资本也在长时间的积累中，驱动养老行动的发生。

在这些重大社会活动中，有一些是与老年人直接相关的，如娃里米节（农历五月初五）和仁旦节（农历十一月十二）。仁旦节这天要去野炊，去之前会准备一个竹盒，其中放有各类水果和牛羊肉、肉灌腿以及一个猪舌头。肉灌腿代表勤快，老人把你养大不容易，你得勤快把他们照顾好，他们养你小，你需要养他们老；猪舌头代表会说话，不会得罪长辈，长辈就算说错也是好意的，不会反驳长辈的意见，懂得尊重。在那天一早家中长辈（一般是舅舅，有些家庭也可以是阿妈）要和家中的小孩将这些规矩说一遍。（ZB 村民访谈，GZDJ20190502）

摩梭人家庭空间结构的区隔是凭籍建筑单体结构的分割和具体物件的空间位置摆放来界定的，关于建筑单体结构研究，更多是通过摩梭家屋建筑不同的空间分割、规划以及建构，从而区分出摩梭家屋生与死、男与女、圣与俗的界限，这一套秩序将有利于摩梭社区的稳定和谐。整个摩梭传统建筑的核心位置是祖母屋，分为里外两层，无论哪层的中心均为老年人的寝室；而具体物件的空间位置摆放则更能凸显摩梭人空间格局中老年人家庭地位的意涵。

就餐时，座位的摆放是需要遵循年龄与辈分的。面向上火塘左侧（左柱）的是成年男性，首位为最年长男性；上火塘右侧（右柱）是成年女性的座位，首位为全家地位最高的老祖母之位。

我们每个摩梭人家都有火塘，火塘上供有锅庄石和冉巴拉。在他们之间有一个高灶台，它其实代表的就是我们的老年人，用自己的身躯联系着神灵和我们的祖先（对于笔者提出的质疑，进一步解释到），你看嘛，这个形象不就是一个老人吗？有头，有肩膀，就是他用自己的身体扛起了我们摩梭人家庭和神灵之间的重任。（ZB 村民访谈 GZDJ20190507）

因此，摩梭人空间的格局分布隐喻地表达了老人在家庭中至高的地位，家庭成员浸润于此，不自觉地身体上形成了记忆，这种记忆形式会伴随家庭成员一生的行动。

五、结论与讨论

现今学界，养老研究更多偏重于从结构性或制度性的角度探讨如何解决老年人的保障问题，这其实已经作出老年人是弱势群体的理论预设。虽然积极老龄化政策试图在老年人主体性作用上呈现政策意图，但是亦不应忽视主体性背后“身体”的作用。

本文基于身体，深入探究身体与家庭养老之间的逻辑关系。文中提出的“身体与养老”和“对身体做了什么”正是对家庭养老过程中身体实践和身体塑造的解析。研究表明，身体实践与家庭养老之间具有紧密关涉性，身体实践基于身体媒介展开，凭籍家屋仪式中的身体训练、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以及身体表演三个过程，持续提供了养老支持力；而养老支持者身体又是被三股力量所塑造：家屋身份认同、话语和时空结构。当然，由于身体的塑造不是端赖于单一力量，因而形塑出的身体不可能是弗兰克提出的理想身体形态，而是一种混合的身体形态。运用身体作为媒介来解释摩梭人家庭养老问题，其实有助于转变养老问题上将老年人固定为弱势方的惯性思维，提出一条新的思维路径：在养老过程中，老年人并非是完全被动一方，他也会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体来获得更多养老优势资源，从而在养老中占据有利位置，而这也将有益于我们思考在家庭教育中如何更好地利用好身体；建构良好的家庭氛

围、和谐的成员关系以及话语结构，这将有益于内生养老资本，培育和塑造服务于老年人的养老支持者身体。但需要指出的是摩梭老年人身体实践是基于特定的场域，是否适用于其他场域，还需后续持续研究证明。

限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全面研究。一方面，未能详述受规训的身体以及身体如何运用自己的方式生成反作用力来对抗这一规训；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的冲击，传统的社区村落结构也在悄然变迁，原有的摩梭大家庭结构在发生显著的变化，摩梭人养老的未来前景也将面临着一系列不确定性，文中也未能对这种变化过程展开讨论，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将在未来的研究中展开更为详细论述。

参考文献：

- [1]穆光宗，1999，《家庭养老面临的挑战以及社会对策问题》，《中州学刊》第1期。
- [2]姚远，2000，《对家庭养老概念的再认识》，《人口研究》第5期。
- [3]聂炎，2008，《欠发达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家庭养老意愿影响的分析》，《贵州民族研究》第1期。
- [4]张跃、王瑜、李超超，2004，《少数民族养老模式研究——以云南少数民族村寨调查为例》，《思想战线》第2期。
- [5]谢冰、叶慧，2010，《关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的调查与思考》，《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6]马红鸽，2015，《合作收益视阈截至下农村养老支持力体系构建研究》，《社会保障研究》第1期。
- [7]于绯，2020，《民族地区“医养结合”耦合模式选择、层级体系构建与实践策略——基于粤北N自治县和S自治县的考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 [8]高法成，2011，《孝与养的失衡：一个贵州侗族村寨的养老秩序》，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138页。
- [9]麻学锋，2009，《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与社会发展相关性分析》，《深圳大学学报》第3期。
- [11]Anastasia Meidani.2007, *Les Fabriquesducors, Toulous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Mirail*.
- [12]刘茜茜，2019，《身体社会学视阈下周至县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状况调查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63页。
- [13] [英] 克里斯·希林，2010，《身体与社会理论》第78~79页，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14]Goffman,E.*Behaviour in Public Places.Notes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Gatherings*.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3:35.
- [15] [美] 戈夫曼，2008，《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第8页，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16]丁百仁、成萍、王毅杰，2019，《结构赋予与个体分化：校企联合模式下职校生的身份认同》，《青年研究》第2期。
- [17]王刘飞、王毅杰，2014，《农民工身份意识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建构论视角和893份调查问卷数据》，《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18]Goffman,E.*Behaviour in Public Places.Notes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Gatherings*.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3:35.
- [19] [英] 克里斯·希林，2010，《身体与社会理论》第5页，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 [法] 福柯, 2017, 《福柯说权利与话语》第 34 页, 陈怡含译,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1] Foucault, M. 1974,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Tavistock. 1974: 72.

[22] 沈洪成, 2018, 《教育治理的社会逻辑. 木丰中学“控辍保学”的个案研究》第 15 页,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3] [英] 克里斯·希林, 2010, 《身体与社会理论》第 76 页, 李康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孟 皓, 河海大学社会学专业 2018 级博士

王毅杰,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相 妍

※※※※※※※※※※※※※※※※※※※※※※※

石泉县蓓蕾天使公益协会来我院交流

2021 年 5 月 13 日上午, 石泉县蓓蕾天使公益协会会长胡贝贝、协会工作人员黄继峰和见习生孙佳奇等一行三人来我院交流。学院蒲晓东书记、副院长陈涛副教授、MSW 教育中心主任王毅杰教授、副主任武艳华副教授、亓迪副教授参加了交流。

座谈会上, 胡贝贝会长首先介绍了石泉县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情况, 并就如何进一步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培育孵化社会组织参与儿童关爱保护能力、加强儿童关爱保护服务的专业性等方面与我院进行交流。

针对以上情况, 学院领导、老师表示, 第一, 可以发挥我院社会工作学科优势, 链接专家资源, 以培训、讲座、督导等多种形式提供智力支持, 提升服务专业性; 第二、可以开展深度调研, 教师科研围绕石泉儿童发展并进行研究转化, 提升宣传效果; 第三、可以链接江苏社工发展先进组织经验, 以社会组织人才培育、项目运行、评估与督导等多种形式提供培育孵化经验, 提升组织参与能力。

蒲书记最后表示, 帮扶石泉县发展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我们可以充分发挥挖掘智力资源, 积极利用好相关政策, 积极促进社会工作在石泉的发展。

颠倒的性别与流动的性气质：饭圈 “泥塑”行为研究报告

刘静雯

一、引言

“饭圈”是疯狂的。这个充斥着多样性的话语表达、虚构性的亲密关系、隐性的资本运作的粉丝圈层糅合着明星、粉丝、经纪公司、投资方、监督方等多个主体，其间夹杂着权力的分层、亚文化的生产、“流量为王”的竞逐等。粉丝群体内部分化严重且被强制附着消费的意义符号，打榜、投票、应援需要充分的财力支持，而反黑、控评、秩序管理则需要付诸大量的精力。明星与粉丝之间的关系是利益纵横的复杂联结，以互联网为依托展开持续的投入和消费以及沟通和互动。跻身“饭圈”的偶像明星们俨然成为了被大众凝视的商品，由粉丝群体赋予其相应的意义符号，成为参与偶像信息传播、形象塑造的主体^[1]。偶像明星就像一块被粉丝映射各种定义的白板，也像橱窗内展出的能够被任意弯曲躯体的模特，其存在不仅是将自身行为赋权给粉丝，且是提高群体聚合力的精神领袖。

近期，随着改编自网络小说作家 priest 《天涯客》的武侠剧《山河令》的热播，两位主演张哲瀚、龚俊收获了公众的认可，一时间热度暴涨。由于剧本的角色设定，张哲瀚所饰演的周子舒柔弱且清冷，惹得一众粉丝滋生怜爱之意，争先恐后的寄予他“老婆”的意义符号，正如一句张哲瀚粉丝的应援口号“世界老婆千千万，我有老婆张哲瀚”。剧播至今，“老婆”已经成为与张哲瀚强关联的高频提及词汇，俨然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臆想身份的代称，而是一套完整的符号意义体系。正如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说到的“在消费社会中，我们消费的并不是物的有用性，而是通过消费体现着自己的社会地位与身份的过程，因此消费是符号意义体系结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的根据。”^[2]

女性粉丝称呼男性明星“老婆”的现象在“饭圈”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吗？其实不然，这种性别逆转的想象滥觞于日本动漫文化和欧美同人文化^[3]，也能够早期韩圈中寻得踪迹，比如韩国 SM 公司旗下的四位较为俊美的男偶像被粉丝称之为“SM 四大美人”并且在队内制造王道 CP，虚构队员之间的情感叙事。而在国内粉丝圈群体中，性别逆转的构思也逐渐普遍起来。2018 年《偶像练习生》播出，为追求舞台效果而浓妆艳抹的练习生们呈现出了模糊化的性别，糅合进了部分的女性气质，为粉丝结合各选手的性格气质而撰写 CP 文提供了丰富的物料。2020 年发生的肖战 227 事件就是源于某位网络写手在撰写王一博和肖战的同人文时，赋予了男性明星以发廊小妹的角色，引发了肖战粉丝的大规模反抗和报复。

性别被逆转，也就是“逆向玛丽苏（MarySu）”被谐音成为“泥塑”，主要指将明星的性别进行倒转，赋予男明星相应的女性气质，如“娇柔”、“妩媚”、“漂亮”等，赋予女明星相应的男性气质，如“飒爽”、“阳刚”、“帅气”等，粉丝以自己的性别赞美偶像，探索偶像的不同面向，带给大众丰富的审美体验。

因此，本文以互联网时代下话语权逐渐壮大的“饭圈”为背景，着重关注粉丝社群内普遍出现的“泥塑”行为，了解并整合身为粉丝或路人的受访者对“饭圈”和对“泥塑”的感知，挖掘并思考现象背后的深层意涵。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观察法和访谈法的研究方法收集资料，对各大网络媒体平台上针对具体明星的发帖、发文、评论、讨论等进行观察，主要涉及微博话题、热门评论、微博粉丝群、微博超级话题、百度贴吧等，结合具体时间点和事件还原行动过程，并对参与其中并担纲角色的个体进行访谈。访谈主要在微博、微信上进行，后续也有面对面访谈的补充，内容主要按照访谈提纲所列展开，根据受访者的回答对其中的某些问题进行追问和记录。

（一）文献法

文献阅读是展开调查研究的基础。本文文献法的运用主要包括检索“粉丝圈”以及“泥塑”相关的学术文章、新闻报道、公众号推文等，了解粉丝圈的构成与运作逻辑，通过韩圈、内娱发生的事件了解并整理泥塑行为的产生与发展，“泥塑”虽然是在2016年才建立词条，但其实已经在小范围圈子里存在了很久，这种性别逆转的行为在早期韩圈里的存在感比较高，只是在近年改头换面成为了如今的“泥塑”一词，因此，“泥塑”叙事其实是具有较长篇幅的内容。

表1 主题相关文献列表

编号	类别	文章篇数	关键词
C01	中国知网学术期刊	144	“饭圈”、“粉丝(文化)”、“粉丝社群”、“泥塑”
P01	高质量文章及发帖	32	“饭圈”、“泥塑”、“老婆”
N01	高质量新闻报道	19	“饭圈”、“泥塑”、“老婆”

（二）观察法

观察法是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去直接观察被研究对象，从而获得资料的一种方法。本文观察法的运用主要包括主动参与粉丝社群，观察担任不同角色的粉丝发表言论、布置任务、审核任务等过程，观察制图、修图、做周边等活动。主要集中在对“泥塑”行为的观察，比如在张哲瀚超话中检索“老婆”相关的帖子并查看评论；在讨论区查看粉丝对“老婆”称呼的看法，路人对“老婆”称呼的看法；加入某选秀节目建立的微信群中检索“老婆”、“妹妹”、“姐姐”等关键词，查看讨论记录；在晋江论坛上查看对“泥塑”的相关讨论和看法；在豆瓣上查看对“泥塑”的相关讨论和看法等。

表2 主题相关观察内容列表

编号	观察地点	观察内容
S01	微博超话 微博粉丝群	1) 张哲瀚超话的发帖类型、任务分配、对“老婆”、“妹妹”、“漂亮”等词的提及频次、相关内容在其他平台的热度(如B站) 2) 米卡(2021创造营选手)超话内的“老婆团” 3) 赵珂Kz超话中某条图文贴下的评论几乎全是“精致”、“漂亮”“姐姐”、“老婆”等词汇
S02	微博评论	1) 对张哲瀚被粉丝叫“老婆”的讨论; 2) 对吴京被粉丝塑造成女性形象并p成表情包的讨论 3) 泥塑粉和整肃粉在评论区的“开战”场面
G01	微信群聊	因2021创造营(选秀节目)而创建的某微信群聊中关于男选手被粉丝叫“老婆”、“妹妹”的内容讨论,聊到“泥塑粉多到直播平台把‘老婆’设为违禁词”的内容
J01	晋江论坛	1) 对吴京被有意“女性化”、《战狼》作品被抹黑,衍生出“战狼PTSD”、“含京量”的讨论; 2) 对“泥塑粉”是否是“黑粉”的讨论
D01	豆瓣日记	1) 对泥塑、gb、abo、双性受等热词的讨论帖

	2) 粉丝对自家哥哥被“娘化”不满而发帖并引发讨论 3) 路人对饭圈“泥塑”行为的了解和看法帖
--	--

(三) 访谈法

访谈是实践调查的必要途径，通过访谈能够更好的深入了解事实，逐渐确定研究主题。本文访谈法的运用主要是以“饭圈”和“泥塑”为切入点，以访谈提纲为依托，在微博、微信、线下的场合内对粉丝群中有话语权的大粉、管理员、某明星粉丝、网络写手、路人粉、某特定电视剧粉丝等进行访谈，以期了解他们对“饭圈”和“泥塑”的认知和感受，探讨围绕着几个问题：1、疯狂的饭圈是怎么发展至今的？2、泥塑缘何产生又缘何发展？价值如何？3、泥塑文化是否等同于女化或娘化，这是否又等同于退化？4、从泥塑行为中能看到什么？

表 3 访谈对象列表

编号	访谈时间	访谈方式	特征
S03	2021.4.5	微博访谈	女，90 后，韩圈粉丝，跨国追线下演唱会、买专辑、买代言、做物料、切瓜（听 melon）、刷油管（YouTube）
S04	2021.4.20	微博访谈	女，00 后，张哲瀚粉丝，负责前线出图、制图修图、宣传、管理超话
W01	2021.4.25-4.27	微信访谈	男，90 后，创造营、青春有你粉丝，参与网络社群、花钱投票、应援、观赛
W02	2021.5.17-5.18	微信访谈	女，90 后，杨桐粉丝，参与网络社群、做物料、买周边、线下跟粉丝团活动
W03	2021.5.15	微信访谈	男，90 后，路人粉，耽美小说网络写手，为平安京、恋与制作人等游戏氪金
M01	2021.4.28	面对面访谈	女，90 后，剧粉，接触饭圈较少
M02	2021.5.23	面对面访谈	男，90 后，路人粉，接触饭圈较少

三、符码交叠的喧嚣——诠释“饭圈共同体”

粉丝圈作为特定的网络社会新兴群体，获得了转型期富有弹性的发展空间，也获得了国家对娱乐消费业转为宽松的政策红利，逐渐聚合成为有秩序、有组织且有依托的群体。从早期的歌星、影视明星，到如今的流量小生，偶像练习生，舞台上光鲜亮丽而又业务能力较强的偶像们总能够获得一大批追随的粉丝们，借助互联网强大的空间联结性，粉丝们迅速组成了有归属感的共同体，共同讨论偶像的作品、行程、妆发、生活等，担纲宣传、反黑、控评、净化广场、投票打榜、翻译物料、搬运、集资、应援等不同的任务，一个较为成熟的粉丝圈往往应当具备以下的分工：站姐、打投姐、反黑控评组、网宣组、线下应援组、财务组以及管理层（D01）。内娱早就从“内容为王”转变而成“流量为王”的时代（P01），明星需要好看的数据而拿到更多代言，拿到更好的资源，这就需要粉丝们造势，集资、应援、对代言产品的购买力等都是衡量明星热度的标准。

饭圈虽然大多被认为是私域，但随着话语权的壮大以及对不同圈层的挤压程度，其愈发向公域逼近，而饭圈女孩们（男孩们）纷纷氪金，为喜欢的偶像们一掷千金。“我原来是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为一个遥远不可及的爱豆投入感情和金钱的，还有一些学生省下自己吃饭的钱去买专辑，但入坑（徐明浩）之后我就慢慢理解这种把自己投放到爱豆身上的感觉了……我就也会去购买专辑买周边什么的，包括不开心的时候去看他的现代舞视频 doodlediary 那些，就觉得自己也被表扬了一样。”（S03）；“氪金不是很正常的嘛，我对纸片人都愿意花钱的嘛，反而不喜欢那些个小鲜肉啥的，太假了，还是游戏好，我可以把他们想象成真实存在的随意 YY，也可以花钱抽卡，解锁新剧情，多好啊！”（W03）

这大概就是人们对饭圈“疯狂”的首要认知——烧钱。近期发生的《青春有你3》“倒奶事件”就是众多粉丝为了给偶像打投而购买某饮料，扫了瓶盖处的投票码后直接丢弃，造成了触目惊心的浪费（N01）。“哎呀进了这个圈才觉得真的是烧钱啊！虽然是大家平常做物料都是为爱发电，但是一旦到了需要打榜做数据的时候，还有上代言的时候，那真的是争相赶着送钱，在超话里晒订单。”（S02）

饭圈的疯狂还反映在要倾注大量的精力以获得成员身份。首先必须深谙饭圈规则和行业黑话，只有对小组特性和词汇缩写清晰明了，才能够获得相应的归属感和集体感。“尽管我已经看了不少seventeen的物料，但还是花了两天的时间才分辨清楚谁是次花谁是次美。在豆瓣，bts叫套，exo叫地，seventeen叫次，nct叫划。”（D01）大量使用这些缩写使得圈内的讨论被加密，提高了入圈的门槛；获得粉丝身份后，日常要做的任务有很多。“就拿一个韩娱粉为例，前线出图、视频采访杂志的翻译、切瓜、刷油管、搬运资源、媒体外联等等。当然了，粉丝肯定是有分工的，一般是分组进行的，层层分配任务下来。”（S03）饭圈内部的运作是相当复杂的，这不仅是指粉丝围绕爱豆展开的各种日常任务，还有粉丝内部的分层互动，与国内/国外媒体的联系，与偶像工作室的工作对接等等，而在这个饭圈共同体中，由于网络的匿名性，也时常会发生把对某个明星的爱转换成了攻击其他明星的武器，或者共同喜欢明星的粉丝割裂成为好几个群体，比如CP粉与唯粉之间的尖锐矛盾，饭圈内部总是这么的喧闹哗然，无法平静。

四、社会性别的流动——解构“泥塑文化”

“泥塑”即为“逆苏”，扩展而言是“逆向玛丽苏”。粉丝话语中经常被提及的“玛丽苏”来源于1970年代某外国作者在《星际迷航》同人文中创造的有美貌且有才华的MarySue这一女主角，之后就被饭圈搬运而来，指涉某偶像很有外形魅力或人格魅力（S01、P01）。而“逆苏”则是将偶像的社会性别进行了逆转，赋予其相异的性别气质。“泥塑啊，这个现在在饭圈可太多啦。就是说颠倒一下偶像的社会性别，这跟生理性别不同，他吸引到我的也是这种被后天赋予的性别气质。就像我家老婆（这里指张哲瀚）演周子舒的时候是骄傲的、清冷的、洞察世事的，但又是温柔的，勇敢的，垂怜弱小的，真的很激起人的主体呵护欲”（S04）；“我不怎么接触饭圈的，但我还真听说过这个词，意思就是叫男明星老婆之类的对吧？哎呀，就是女粉丝想跟他们做姐妹呗，又或者就是怜爱之情嘛”（M01）而如今，这种颠覆传统异性恋言情叙事中两性关系，也就是以“我的性别赞美你”的现象愈来愈多，演变成了一种“万物皆可泥”的状态，不仅是影视剧演员，还有流量小生，选秀节目练习生等一众外貌姣好，才华出众的偶像们。“我感觉现在明星被“泥”的都特别狠，就创（指2021创造营）里面，我们利老师（指利路修）就被叫漂亮莉莉。”（G01）；“孙滢皓这名字听起来就是个女孩啊，附上他自己泥自己的女装照，孙姐真的好辣！”（D01）

我们不禁开始思考，为什么对偶像赋予相异的性别身份会获得如此大的热度？为什么粉丝会不惜打碎传统玛丽苏叙事，用同性别气质的故事素材捏一个逆性别的偶像？根据微博、晋江、豆瓣等平台的发帖内容以及微博、微信的访谈记录，我将受访者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回答整合成为以下几点。

（一）构建虚拟的亲密关系

偶像身上折射着粉丝的性幻想，寄托着粉丝对理想亲密关系的构想。“我对这个人表达欣赏和喜爱的最高表达，可能就是把TA纳入我的家庭。”（S02）将偶像称为“老公”、“弟弟”、“老婆”、“妹妹”都可以用这种逻辑进行理解。然而特殊的一点是，女性粉丝将男偶像颠倒了性别，纳入自己的亲密关系的同时也纳入了自己的性别战线，以此获得同一性别圈层的认同感，也寄托着粉丝对自身性别的认知和付诸于美好的愿景。“我原来不理解泥塑的，后来我觉得粉丝也许是想跟自己的爱豆做

亲密的姐妹吧，毕竟女孩子这么美好，有这么多可爱的事物，就很想让他们也感受一下！”（M01）

在强调社会氛围和亲属制度的大环境中，粉丝以虚构的亲密称呼将偶像拉入了自己的差序格局中，获得精神上的相对满足，而这个时候，“泥塑”提供了另一种身份建构的可能，这种独特性足够吸引偶像的注意。“这挺正常的，首先不排除性别认知的影响，比如说男生1（指同性恋），叫自己的偶像老婆也很正常，其次就是要引起偶像注意了，毕竟之前从来都没喊过这个，突然蹦一个“老婆”来引起偶像注意……这种称呼能拉近距离，让自己从言语、心理上离偶像更近。”（W02）

（二）发掘超越性别的美感

波伏娃的《第二性》中提到一个观点“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P01）这句话昭示着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相对分离，生理性别总是带有一些先赋性，被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话语和性别规范所形塑，而社会性别带有后致性，由各种丰富的符码构成。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构建并非是在纵横相交的表格中选取泾渭分明的词汇，而是一种流动的状态，“泥塑”恰恰就是打破传统性别范式，寻找更多异性别的可能性的探索。“咱们性别不要卡那么死，泥塑其实就是一种打破刻板印象，比如男生就是老公，女生就是老婆，泥塑就是打破了常规。”（W02）；“男性就一定得阳刚、壮实、坚韧，女性就一定要娇弱、温柔、轻声细语吗？男生也可以跳女团舞，化浓妆，流眼泪啊，相同的，女生也可以很霸气，很刚，就像袁咏仪那样，很招人喜欢啊！”（M02）

饭圈的粉丝热衷于逆向玛丽苏叙事，不再满足于将自家爱豆拘泥于传统的生理性别范式，而是将他们流露出来的温柔、娇弱、情绪化、撒娇等特性划为同性别的范畴，用男偶像的肋骨造出“女像”（P01）并且主动代入男性的角色去怜爱偶像（W01），从而表达自己的喜爱。当偶像的社会性别流动起来，饭圈的粉丝们也能从中挖掘更多的跨性别美感，“影帝黄渤也可以是青岛贵妇，秦昊也可以是秃头男妈妈，我家（指创造营选手米卡）超话里还有专门的老婆团，泥塑能够带来很多探索的乐趣，自己就有了一种掌控两性关系的快感。”（W01）

（三）重构主流性别话语

传统性别秩序是男性被赋权而女性被压抑的模式，女性作为父权制体系下持续被男性凝视的客体，承受着权力的压迫性和资源的不对等，长期以来被桎梏于两性范式中难以拥有自由表达的机会。“直男通过输出秩序建立自己，而泥塑打破泥偶，混沌爱恨，撕裂秩序，重建一切，泥塑是给予，是分享。”（S01）泥塑给予了粉丝们超现实性别秩序的精神快感，能够打破被定义的性别气质，打破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两极分化的思考模式，让每一种性别都包括一切美好的品质。

由于泥塑大多是由女粉丝进行的，呈现出一种实现权力翻转和颠倒性别气质的尝试，20世纪60年代披头士乐队的模糊性别风格让很多年轻女性从被压抑的氛围中解脱出来（C01）。这种颠覆传统性别秩序的叙事赋予了女性更多幻想的自由，从被压抑的现实中跳脱出来需求寄托，能够借助泥塑而更自由的抒发自己“隐秘”的欲望。“除却那会讽刺吴京、《战狼》那件事，我觉得泥塑整体而言是积极的，泥塑不是侮辱男性的工具，也不是刻意制造性别冲突，而是一种寻求更多性别气质可能性的尝试，又或者可以说是对平权的渴求吧。”（J01）；“对于现代女性而言，现实生活中的男性可能是木讷或强势的，或女性觉得自己在父权社会回收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当精神诉求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满足，就会转向爱豆……ABO和泥塑也成为了女性释放精神压力的方法，以此释放自己在现实中积累的委屈和不满，将自己塑造成权力的主宰者。”（D01）

在泥塑粉眼中，“优秀的灵魂都是雌雄共体的”（S04），他们想要倡导的是一种性别价值的多元和美学表达的多元，颠覆解构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然而，实施泥塑的对象往往要足够漂亮，要面容和

身材姣好，这种漂亮的标准是否反而落入了男性凝视的限制中（C01），这不禁引发我们的思考：以打破传统社会性别范式，构建多元性别观念为主旨的泥塑是否并未打破二元性别的壁垒，这种内在的矛盾性是否加重了性别对立，这是泥塑粉需要思考的内容，也是我们需要深入探究的领域。

五、结语与讨论

在“疯狂”的饭圈中，被凝视的偶像明星们被粉丝群体赋予丰富的意义符号，折射着粉丝虚拟亲密关系的构建和性幻想，其生理性别俨然不再成为娱乐圈层的定位符，而是不断被创造和衍生的社会性别塑造着他们。曾经的玛丽苏叙事以中规中矩的生理性别书写着偶像间的情感联结，在粉丝心中难以激起精神快感，因此，“逆向玛丽苏”——即“泥塑”叙事展开了素材书写。

在泥塑叙事中，女性粉丝将美好的性别气质赋予了男偶像，称其为“老婆”、“妹妹”等，也有粉丝将男性气质的词汇赋予女偶像，称其“飒爽”、“酷盖”等。这种性别逆转的猎奇使得偶像的社会性别流动起来，挖掘了超越性别的美感，打破了传统性别范式的桎梏，改变了性别刻板印象，部分缓解了女性在社会中被男性凝视的焦虑感，能够借用此工具表达自己隐秘的欲望。然而，在“泥塑”演变成“万物皆可泥”的状况下，这种行为已然脱离了“圈地自萌”的饭圈私域，而是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土壤。

在泥塑叙事吸纳众多注意力的现状中，我们需要冷静下来思考，泥塑对性别政治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对现实的性别议题的探讨有无影响力，泥塑究竟是重构了主流性别话语还是最终作茧自缚，刻意制造了性别对立，被赋予了丰富象征符码的泥塑究竟是娱乐消费层面的意义更多还是两性关系层面的意义更多。

我想，不应当对泥塑行为予以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应当深度体悟他们的精神世界，了解他们的价值需求，毕竟谁都不想莫名其妙的戴上污名化的帽子，就像饭圈也不想永远疯狂一样。

参考文献：

- [1]周琼、曾样样，2021，《群体传播时代的集体行动和仪式狂欢——对“饭圈出征”网络行动的个案分析》，《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第3期。
- [2]让·鲍德里亚，2014，《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3]陈伊琳、黄雨竹、徐敬之、冯颖，2021，《泥塑文化与性别观念探讨——基于粉丝文化背景》，《视听》第3期。

☆作者简介：刘静雯，河海大学社会学专业2020级硕士

☆责任编辑：胡麟



易地搬迁移民社区

网格化治理与社会工作：可为与不可为

——基于陕南 S 县的调查

房子琪

摘要：本文立足于陕南 S 县的易地搬迁实践，通过对 S 县易地搬迁移民、当地社会工作者进入搬迁地后的实地访谈，结合当地易地搬迁移民社区网格化治理的实践，探讨社会工作在易地搬迁移民社区网格化治理中的可为与不可为。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易地搬迁移民经历了空间区隔：归属感缺失、逐步接受：适应性获得、积极参与：共同体建设三个阶段，同时在社会工作介入易地搬迁网格化治理后，其可为与不可为促成了易地搬迁移民的网格化治理由空间区隔向空间融合的转变。

关键词：易地搬迁移民 社会工作 移民社区 网格化治理 可为与不可为

一、问题提出

2015 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颁布，标志着我国扶贫开发迈入脱贫攻坚阶段。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2020 年是我国“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近几年的脱贫、扶贫事业如火如荼进行，同时也取得了令全国上下可喜的成绩。在脱贫攻坚中，易地搬迁作为一种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解决自然环境劣势的重大历史实践活动^[1]，为脱贫事业贡献了巨大的力量。通过易地搬迁脱贫一批是“五个一批”精准脱贫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当前中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推进精准扶贫最为直接和有效的实现形式^[2]。易地搬迁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有力武器。

根据《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十三五”期间，对近一千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着力解决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1]。一方水土多指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土壤贫瘠、环境恶劣、贫困的地区；一方人是指对应生活在自然与人文条件较差，而导致贫困的居民。所以，国家制定并且实施扶贫搬迁规划，为“这一方人”寻找适合居住、生活、发展的新地区，来达到保障人民脱贫、维护人民利益的目标。在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既是指导思想，又是目标与口号。各个地区也严格响应政府的号召，将其检验易地移民搬迁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发挥各方力量优势与资源，来为易地搬迁移民提供服务与保障权益。

可以说，易地搬迁一方面对于身处恶劣环境、深陷贫困深渊、生计难以保障的人民摆脱贫困状态、正常生产生活与安居乐业发挥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对于国家的脱贫攻坚战的顺利打赢、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繁荣与复兴意义巨大。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易地搬迁过程中暴露出的诸如易地搬迁移民的社会融合、资本建设，非自愿移民的满意度、对于搬入地环境的适应、文化与民族冲突、生活方式的不习惯等等的问题严重影响易地搬迁后移民的幸福感。易地搬迁后，移民的生计方式经历了时空上的巨大变化，暂时性生计断裂，难以恢复到以前的生计状态^[3]。在这其中，社区社会治理中包含了易地搬迁移民的生计、生产、生活等的方方面面，在易地搬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移民进行易地搬迁后，原有村落共同体开始向社区共同体转型，原有村落管理变成了社区管理，从村落到社区的聚集也部分消解了乡土社会群众自治组织即村民委员会的运作空间，新型社区管理的规划理念和策略倒逼传统村落以权威为基础的治理规则转型^[1]。另外，移民与当地居民的地域空间也悄然发生变化：原有的移民村落是一个在差序格局主导之下的结构完整、关系网络紧密的熟人社会共同体；而在嵌入的外迁社区空间，生成了由水库移民与迁入地原住民组成的“双主体半熟人社会”^[4]。所以，探讨易地搬迁移民在搬迁后以社区为单位的适应、融合等方面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了社会治理的要求：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同时为了顺应时代发展、进行深化改革，以网格化管理和服务为代表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应运而生。网格化社会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与服务方式，构建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机制探索^[5]。社区网格化治理是依托统一的城市管理以及数字化的平台，将城市管理辖区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成为单元网格进行管理与治理。社区网格化治理是一种治理的革命和创新，它不仅冲击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模式，而且首开协商共治，促进多元主体参与的先河，是一种改革意义重大的政策创新。目前已被上海、南京、深圳多地广泛应用，并且取得类似“仙林经验”“枫桥经验”等的典型。将易地搬迁移民的社区治理放在网格化治理的时代背景与视野下，是否会碰撞出火花？这也是本文想要探讨的一个点。

社会工作作为一项具有人文关怀、解决社会问题的专业，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是弱势群体。所以尤其关注移民中的例如老弱病残、妇女、少数民族等弱势群体。社会工作在介入易地搬迁移民社区网格化治理过程中，可谓大有可为。社会工作往往会利用独特的专业优势来为处于困境中的移民群体解决问题、提供服务，高质保量的协助政府、各个实施主体以及易地搬迁移民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是政府的“好帮手”、各实施主体的“协同者”、易地搬迁移民的“倾听者”。但是社会工作并不是万能的，在很多方面往往面临着不可为的困境。所以本文立足于易地搬迁与社区网格化治理的背景下，社会工作如何在其中发挥应有的专业优势，克服其中的不足，为易地搬迁移民提供良好的服务，以有效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美好愿景。

二、田野呈现与研究方法

（一）理论依据：可持续生计框架与社会资本理论

科尔曼从功能的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定义，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以社会结构资源为特征的资本财产，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而没有它则不可能实现^[6]。”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生计资本包括了金融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五类^[7]。可持续发展与生计框架关注与重视的是这五种资本在受到政策或环境影响时的生计策略的变化，进而影响生计的可持续性^[8]。事实上，以上资本都可以概括归纳为社会资本。

在易地搬迁过程中，社会资本的构建是促进易地搬迁移民适应当地生活、进行社会融合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标志。在社区网格化治理的背景之下，社会工作在介入易地搬迁移民的实践过程中，需要用带有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关注其需求与问题，关注易地搬迁移民群体的资本建设，协助其恢复与建设

金融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

（二）田野点与调研方法

陕南 S 县是贫困县，也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全县约三千平方千米，总人口近二十五万。S 县南部为山，地形崎岖，多发生地质、洪涝等自然灾害。因为南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基础设施、服务设施落后，发展条件较差，基础设施配套困难。很多村被评为无发展潜力的村，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生态环境较恶劣，农作物长势不好。S 县北部相较于南部，生态环境较好。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较少，发展潜力较大。由于此地气候较适宜，所以盛产花生、板栗、食用菌等秦岭特产。应国家和陕西移民政策的调整，在“十三五”期间，根据专家与政策制定的规划，将 S 县南部建档立卡贫困户，易地扶贫搬迁到 S 县北部。

对于受制于恶劣的生存和发展中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的深度贫困户来说，向条件较好的地区移民，是一种有效的脱贫手段。事实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三西地区”（甘肃定西、河西和宁夏的西海固）就已经开始实行易地扶贫搬迁，后又在其他省份推广。2020 年底大火的扶贫红色剧集《山海情》就生动地描述了这一过程。《山海情》的故事发生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讲述了宁夏贫瘠甲天下的西海固移民搬迁到玉泉营，经过福建对宁夏进行扶贫帮扶，建立了合作样板“闽宁村”，后来开阔“闽宁镇”。在这一过程中，因为易地搬迁环境的变化、政策的变动，随之发生在各类人物身上的扶贫故事。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那个易地搬迁的时代大背景下，根据扶贫政策的导引，通过建立两省的对口帮扶机制来扶持贫困地区走上富裕之路。易地移民搬迁的成功，除了电视剧讲述的两省对口帮扶的扶贫机制的鼓励与促进之外，还离不开当地移民百姓个人的努力与付出。

本文立足于陕南 S 县的易地搬迁实践，通过对易地搬迁移民、当地社会工作者进入搬迁地后的实地访谈，以及当地移民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实践与社工在其中的可为与不可为来了解此次易地搬迁中的优势与困境，从而进行反思并提出建议。

三、易地搬迁后的移民社区网格化治理

易地搬迁前后，移民的社区建设与治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搬迁前，移民生活在传统村落中。中国的传统社区是费老所说的深深扎根于土地、对于自己土地和家长的深深认同感的“乡土中国”样态。乡土社会中空间边界稳定，社会同质性和集体意识强，传统意义上的“社区共同体”容易形成；而搬迁后，来自不同地区、多个村落的居民同时聚集在一个安置点，形成差异化的多元空间，从村落到社区的空间压缩与集聚不仅改变了传统村落共同体的物理空间形态和社会地域边界^[9]，也改变了移民生活的社会空间形态：不同的地域、文化、地区的移民很难在新社区中找到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10]。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在最近几年流行与应用，它强调居民以及多元主体的社区参与，社区的自治性更高。因为国家政策与制度的下放与规定，非自愿移民对于新社区的适应性与认同感相对更困难，对于社区的融入、参与就更加困难。但是以上情况对于自愿移民与非自愿移民来说同样适用。即每个人对于新环境的接受与适应需要时间。以下从以时间视角为脉络，以社区适应的空间视角为内核，尝试从三个阶段分析易地搬迁后的移民在社区网格化治理中的心理、社会适应状态。

（一）物理层面：空间区隔·归属感缺失

易地搬迁是自然空间的转移与变化，但是移民个人的社会空间与心理空间在搬迁这一过程中的起伏转承更为巨大。冯雷指出，相较于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对于人的影响更加直接^[11]。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因居住空间强制性地移而发生断裂与重建^[12]。移民刚到新的社区，往往会产生对于新的物理环境的陌生感。因为周围都是陌生的人，没有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与社会网络，会产生对于社会环境的

排斥感。以及产生对于物理环境的不适应、社会环境的不熟悉的失落感。“你说要迁移的话，把我们村整个都迁到这一个地方来就行了。但是现在都打乱顺序了，我都不认识谁是谁。本来对环境就不熟悉，这样一来，连说话的人都没有了。有的时候儿女去上学了，我就自己坐在窗边看外面，或者看电视，觉得没啥意思的，还是想回去呢。”（20190418, lhy, 移民）

另外，由于原本的村落 S 县南部，多是房屋、宅基地为主要的房屋形态，但易地搬迁后的楼房安置，居住地空间的压缩往往会让移民群体感到“这不是我的房子”、“不能接受”、“我觉得很陌生，好想你”的感觉。“我的天哪，你看把我们放在楼房里，就那么小的一个个单元格，一点也不方便。就像是住在别人家里，老是想我们以前的家，那才是家呀。”（20190421, wxh, 移民）

因为移民对于社区环境的陌生以及人际关系的断裂，所以参与社区活动更是少之又少。“啥，社区活动啊，倒是听说过有那个新居民认识大会这个会。但是我没去，我们家都没有去的，主要是也不认识人，就是不熟悉。对这个社区，到底也不知道社区是干什么的，也不想参与什么活动。等着以后再说吧。”（20190418, lhy, 移民）

易地搬迁是国家扶贫、减贫的政策，此制度也是国家主导并且规定。虽然在考查了大部分移民的意见后进行的规划与制度安排。但是仍然对于小部分不愿意搬迁的移民来说，是一种“逼迫”下的无奈。《山海情》中马得福的姑姑一家不愿搬迁，即使姑姑搬来了，但是也因为丈夫和儿子没有来而整天郁郁寡欢以致生病。这种国家强制的制度逻辑与移民生活逻辑实际上矛盾重重、冲突不断：如陌生的邻里关系、高额的生活成本、文化割裂的阵痛、新社区共同体意识的缺失，各种因素的叠加使得移民群体越来越不安，即使可能摆脱贫困，但是他们依然想要回去那个叫做“家”的地方。很遗憾，返迁、拒不搬迁或者上访的抗争在斯科特看来是“弱者的武器”^[1]（郑娜娜、许佳君，2019），确实如此。

（二）心理层面：逐步接受·适应性获得

当抗争无效或者宣告失败后，易地搬迁的移民们开始渐渐接受这个现实。逐步转变为适应与认同，虽然过程很难，需要付出时间与情感的代价，但是他们不得不如此。“来了好几个月了，也渐渐的适应了一些。其实我们老家和这边差距也不是很大，就是这边环境好点儿，他们这里的方言我们也能听得懂。偶尔的时候，买菜、出门的时候会碰见一些人，也慢慢熟了。就是可能不知根知底，很多掏心窝子的话不想说。”（20190722, wch, 移民）

对于有些整村没被拆分的易地搬迁的移民来说，接受与适应显得更快速一些。“我们这个村当时是一起搬过来的，就在都这几栋楼里，所以相互之间都认识，还挺好的。除了环境刚开始的不适应，这个我觉得很好，最起码还有熟悉的人嘛一起说说话啥的，就有那个啥叫情感寄托哈哈。”（20190709, zhx, 移民）前述提及，社会空间对于人的影响是巨大的。整村搬迁在易地搬迁中的满意度是最高的也得益于此。事实上，在易地扶贫搬迁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因为分散移民而带来了原有社会关系网断裂和社会支持力量削弱的问题^[13]。而以上访谈对象 zhx 所在的搬迁安置区，没有出现上述问题，所以这很好的保证了移民群体的社会空间的正常运行、社会资本的良好流动。

另外，一方面，因为搬迁地 S 县北部环境的改善、气候的适宜，移民可以通过种植当地的农作物，例如花生、食用菌等作物来改善贫困的现状；另一方面，政府对于移民群体的关心、移民社区治理的建设与开发，使得移民群体开始逐渐理解易地搬迁对于国家与个体本身的意义。以上从环境、经济条件改善，政府、社会、社区的关心与支持方面来使移民群体意识到易地搬迁的意义所在，从而有利于其从内心去适应新的环境，实现“稳得住”的目标。

（三）社会层面：积极参与·共同体建设

在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贫困治理实践中，社区治理与建设理念与精准扶贫具有一定的价值契合性，体现为强调通过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增强社区发展能力，进而促进贫困社区的内涵性发展^[14]。尤其是对基于扶贫的易地扶贫搬迁而言，移民安置社区的社区治理与发展能力建设是促进易地扶贫搬迁实现长效脱贫目标的关键手段^[15]。其中，网格化作为社区治理过程中高效、创新的手段，发挥了社区治理的社会性，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所以探究其优势为易地搬迁移民社区治理的意义与有效性。其中，刘玉蓉认为社区网格化管理有利于打破外籍人口治理中的“信息孤岛”、弥补外籍人口治理中的“空白区”、建立外籍人口治理中的“风险预警器”^[16]。

社区网格化治理强调的是多方参与、协同治理、协商共治。在移民社区网格化治理的多元主体中，除了政府、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服务者。被服务者——移民群体的参与也是重要的一环。在经历了前期空间区隔中的归属感缺失、中期的慢慢接受中的适应性获得阶段，易地搬迁移民群体因为内部以及外部环境的因素能够比较好的参与到社区当中，为移民社区共同体的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以下是在访谈中，体现出移民群体参与社区的一些原因与方式：

第一，经济水平的逐渐提高，移民群体对于生活满意度也相对应的得到提升。对于社会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参与性增强，而且与生活满意度相互促进与提升。“自从搬到这里来呀，因为上面的帮助、我们自己种蘑菇、核桃这些，收入比以前是增加了不少。从这方面看还挺好的，虽然还是贫困吧，但是总归是比以前好了，有的时候也开心了不少。这不闲的没事儿的时候就社区那个活动中心转转，有的时候那个社区的小张呀，会来邀请我参加社区活动，时间长了就认识了不少的人，去的次数也多了。”（20190418，lhy，移民）

第二，社区工作人员的关心与走访，使得移民感受到社区对自己的关心与照顾。爱与关心是相互的，移民参与社区的积极性也就渐渐提高了起来。“咱们那个社区啊，有那个社区工作人员也很关心、照顾我们，平常填报信息啊，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啊，逢年过年来给我们送东西之类的，感到很温暖。他们办的一些活动什么的也是为我们好，就觉得不去参与的话不大好。参与了觉得挺好的，还开心。”（20190812，gsr，移民）

第三，社会关系网络中熟人的带动促使移民群体也会主动、被动地参与社区活动。“那个xx家的经常会带我去社区参加那个什么活动。虽然咱不清楚是什么，但是认识的人会多一些，然后我们一起说说话。就通过参与这些活动我认识了很多朋友呢。”（20190722，wch，移民）

第四，积极的激励、奖励措施与手段也会促进移民群体参与社区的热情高涨。“参加那个活动真不错，不仅学到了一些东西，还有奖品呢，那个工作人员说有那种参与活动可以积累次数，参与次数多了会有大奖品呢。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多去参与这些活动还可以放松放松，何乐而不为呢！”（20190709，zhx，移民）

四、易地搬迁移民社区网格化治理中的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专业、一个职业，旨在通过专业的方式为处于困境的个人、群体、社区解决问题与困难，挖掘潜能、促进个人能力的恢复与发展。它具有复原、配置资源、预防、发展、稳定社会的功能^[17]。社会工作的其中一个方法为社区工作，其中，社区工作的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社会工作作为其中的一股力量，为社区建设、社区治理贡献着自己组织、链接资源、引导、鼓励、整合等的力量。尤其在参与社区网格化治理过程中，社会工作既可以作为多元主体参与的一方，又可以作为组织与链接者的角色。社会工作在介入易地搬迁移民群体、易地搬迁移民社区网格化治理中有着独特的优势与潜力，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少局限性。以下通过文献与实地调查到的资料来进行社会工作介入易地

搬迁移民社区网格化治理的可为与不可为研究。

(一) 社会工作的可为：易地搬迁移民社区网格化治理中的专业优势

1. 赋权视角优势

赋权视角社会工作中被广泛应用的理论视角，它认为案主的无权状态是因为环境中的无权、被压迫造成的，所以致力于挖掘案主的潜能，为案主增权赋能。赋权主要有个人、人际、社区三个层面。赋权的视角为社会工作关注易地搬迁移民群体参与网格化治理提供了可能，因为易地搬迁移民群体参与社区治理从本质上来说，面临着“无权”状态。

“你看这次易地搬迁是上面的规定啊，我们这些小村民即使不同意又能怎么办呢？只能当哑巴喽。政府给安置的房子是不错，你看这不是楼房嘛，而且这里环境有利于庄稼的生长。但是啊，感觉还是差点儿什么，就觉得自己没有了之前那些干劲了，那些集体活动也不想去参与。”（20190824，zdn，移民）

移民往往因为易地搬迁而失去原有的工作机会。社会工作对此类群体在就业、创业、恢复再生产进行介入时，需要充分考虑利用优势视角与赋权理论为其增权。首先，可以进行对移民群体的非农安置工作，可设置“扶贫车间”、“扶贫工厂”等为有工作需求的移民提供工作岗位，增加经济收入，很好的实现“能致富”的愿景目标。不仅为移民摆脱贫困提供机会，也为移民群体参与社区治理，创造良好的物质与精神条件：“我就觉得吧，让那些不大主动参与社区的一些移民群体改变是要有一些技巧的。就比如给他们提供一些工作岗位、或者用一些方式保障一些经济收入，他没有后顾之忧。就是最基本的物质基础保障了，才有可能考虑精神方面的需求，就比如参与社区活动了，主动配合网格员填报信息，表达需求啦等等。”（20190811，wj，社会工作者）。其次，需要充分发挥移民群体参与社区网格化治理的主观能动性。在移民群体的个人、人际、社区社会层面进行增权赋能，在参与社区网格化治理的过程中让其看到自己身上的优势与资源并充分的发掘。提升自己参与社区的意识与能力。“在工作的过程中，会发现有一些有文化的、做过大大小小的干部的那些移民，是有一些参与意识与领导能力。他们对于移民社区的一些问题很敏感，也常常能够提出来，并且表达自己的需求。所以就想着后期在每个单元网格里成立一个社区自治小组，由这些人来组织、号召其他居民进行参与”（20190812，lmy，社会工作者）

2. 资源链接优势

资源链接是社会工作独有的工作方式，将资源链接到案主的手中，是社会工作介入，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的一种间接手段。社会工作因其独特的人文关怀，尤其会关注移民中的诸如老弱病残、妇女、少数民族等弱势群体。

一方面，社会工作通过链接有利于移民群体的政策资源来达成对于此类服务对象的服务目标。例如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与技能培训政策、城乡低保与医疗救助政策、社会救助政策、农村五保户政策、妇女发展政策、少数民族发展政策、土地权益保障与维护政策、财政补贴政策、就业创业的政策等。其中，对于移民群体在社区的生产、生活适应，通过学习社区治理中的网格化管理与治理政策，链接到社区工作人员、易地搬迁移民群体手中，以达至有效移民社区治理的目的。

“多亏有了这些在社区工作的人员，他们把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政策都给我们说了，得到了很大的方便。就是我在老家本来有几亩地，来了以后这就没有了嘛。那天无意中和小张聊天，她说我要是还想种地的话可以申请的，所以她就帮我办了，很感谢她呢。”（20190722，wch，移民）

另一方面，社会工作通过有效链接基层政府、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资源参与移民社区网格化治理

的建设中来。推动政府购买移民社区建设、移民社区融合等社会工作服务项目。通过招标、项目化的方法吸引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为弱势移民群体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持与服务。同时，社会工作者可作为移民群体的人力资本为其提供满足需求、解决问题的服务。推动社会组织在移民社区网格化治理中的参与与孵化，发挥多元主体参与社区网格化治理的力量。

3.专业方法优势

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这三大方法在移民社区网格化治理的过程中，对移民个体破除区隔与排斥的问题，对其进行良好的社区融入、社区适应，社会资本的建设、归属感的建立意义重大。

(1) 心理层面：破除心理区隔，促进归属感的建立

对于易地搬迁的移民群体来说，心理层面的影响是深度的、长期的。社会工作在其中可以帮助移民群体增强对于新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与其携手共建幸福美好的新家园，促进移民群体的社区资产与公共服务的恢复与再发展。第一，可以通过个案辅导缓解移民个人的紧张、焦虑、无归属感的心理状态。同时社会工作者需要链接心理咨询师等资源为其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第二，利用小组工作的方法在移民安置区寻找相似的服务对象，利用小组活动为其提供情感支持、鼓励、情绪疏导等服务。另外可以设置兴趣爱好、共同文化信仰的移民组成支持小组，分散由于环境改变带来的不良情绪。

(2) 社会层面：破除边缘化，促进社会资本的建设

社会层面包括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这里重点构建移民个体的社会资本：一方面，在社会环境方面，社会工作者需要协助移民个体构建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包括亲人、邻居在内的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社工、社会组织、项目主体、当地政府等的正式社会关系网络；另一方面，通过利用社区工作方法来建立与增强移民对于新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增强移民安置社区的凝聚力。在社区网络中，积极帮助移民与安置区居民建立联系，形成移民与安置地居民互相合作的关系。同时，积极鼓励移民参与到社区的发展活动中，为移民融入社区生活创造机会。“社区里经常会搞一些活动什么的。就比如开展活动之前要问一下我们需要什么，问题有哪些。我还想说我们问题可多了去了，你们能给解决吗。然后过几天社区的就有活动了，让我们去参加协商、投票的，也有去参与一些娱乐性的活动的，感觉参与了也蛮不错的，至少有的需求他们是看到了，要给我们解决的。”（20190709，zhx，移民）。通过例如广场舞、书法、下棋比赛等文娱活动的定期开展以及社区协商、社区选举、社区议事、居民代表大会、成立社区自治组织等方式，增加移民与当地原住民的互动，促进安置社区的社会整合与社会资本的建设。

由上论述可以看出，社会工作在易地搬迁移民社区网格化治理过程中，很好的实现了包括促进移民个体的赋权、人际关系的互动、社会资本的建设、参与社区网格化的公共社会治理与促进移民群体安居乐业、脱贫致富的生计治理的有效结合。

(二) 社会工作的不可为：易地搬迁移民社区网格化治理中的专业局限

1.帮扶无力局限

由于易地搬迁制度是一种自上而下、带有强制力与权力的制度手段，其本质是为了易地搬迁移民摆脱贫困，打赢脱贫攻坚战。但是制度的强制力与移民的自主性往往会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在对易地搬迁弱势移民群体进行社会工作介入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对于移民群体需求的无法满足、问题的帮扶无力的现状。在对社工访谈中，我们发现会出现移民群体因适应不了新环境、新社区而想

要回迁、想要获得更多物质资助等的诸多问题。

“那些本来就不愿意迁来的移民户，我们的工作也是没办法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老是想要回去，就是感觉融入不了新环境，说家里有很多挂念。即使是穷也没关系。这种情况经常会发生在一些年纪大的人身上。那我们就有些无力与无奈，你说这是政府的要求，我们也改变不了呀，所以就只能安抚，劝说，希望时间会改变吧”（20190812, lmy, 社会工作者）

2.工作负责局限

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一般是由政府购买，驻扎在社区内为弱势群体提供服务。但是，此类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局限性是要完全按照政府的要求去做，包括服务人群、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资金的使用、服务场地等的规定等。对于移民社区中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购买，也是如此。政府往往在没有调查与评估的基础上，进行任务的下达与服务的购买。有时，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该对政府购买方负责，还是该对服务对象负责的这样一种两难困境。例如政府购买的服务中没有关于移民社区治理与社区融合的项目，但是服务对象有此类的需求，那么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局限可能仅限于为其提供帮扶、链接资源、满足政府购买方需求的服务。

“社工就是那个样子的，你应该也清楚，就是我们工作很多，既要应付政府的要求与命令，又要对服务对象负责。就有的时候感觉自己忙的像个陀螺，最后还没有忙出点儿事情来。其实这个移民社区的治理啊很多社区都在做，移民也有这个需求，但是我们所在的这个项目就没有此类内容。”（20190804, nxl, 社会工作者）

3.社会认同局限

社会工作的职业与专业在我国并不普及，尤其是在较贫困的地区。很多移民都不知道社会工作者是什么，只是知道是在社区工作的人员。这种不认同与不理解也经常至社会工作者于尴尬的境地。

“社会工作者，没有听说过呀，就是在社会上工作的人吗？”（20190824, zdn, 移民）

“有的时候去入户了解移民的情况，说自己是社会工作者他们都不开门，只有说自己的社区的，居委会的，他们才给开门让走访。有的时候就挺难得，开社区活动的时候，他们就不就是来玩的嘛，别说那么多废话了。我想多给普及点社工知识都不行（苦笑）。还有就是召集居民参与社区协商啊，居民自治这些，就要打社区居委会的旗号。一般说社工项目，让他们来参加，他们都不会来的，因为不清楚这个是什么组织。就连社区网格员都比我们吃香呢”（20190811, wj, 社会工作者）

以上可以看出社会工作者在易地搬迁移民社区网格化治理中，面临很多困境与局限，针对其中的问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症下药来解决出现的问题。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立足于陕南 S 县的易地搬迁实践，通过对 S 县易地搬迁移民、当地社会工作者进入搬迁地后的实地访谈，结合当地易地搬迁移民社区网格化治理的实践，探讨社会工作在易地搬迁移民社区网格化治理的可为与不可为。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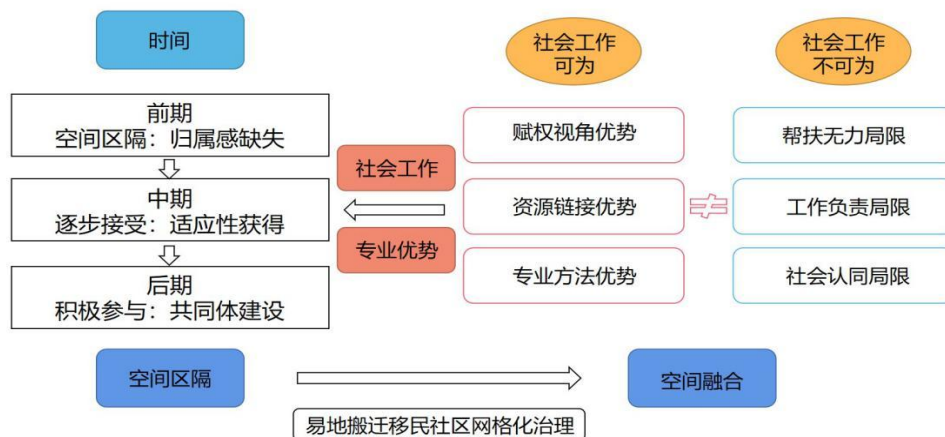


图 1 易地搬迁移民社区网格化治理

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易地搬迁移民经历了前期物理层面的空间区隔、归属感缺失；中期心理层面的逐步接受、适应性获得；后期社会层面的积极参与、共同体建设的三个阶段。在整个过程中，易地搬迁移民群体在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的介入与影响下，其心理、社会层面发生着适应性的转变。在介入易地搬迁网格化治理中，社会工作的可为与不可为促成了易地搬迁移民的空间形态由区隔向融合的转变。针对易地搬迁出现的问题以及社会工作在介入移民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困境，希望提出在建设移民社区时，注重从自上而下的管理与制度安排，向上下互动的移民社区自治、构建移民社区共同体转变的建议。

参考文献：

[1]郑娜娜、许佳君，2019，《易地搬迁移民社区的空间再造与社会融入——基于陕西省西乡县的田野考察》，《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9 卷第 1 期。

[2]何得桂，2016，《山区避灾移民搬迁政策执行研究——陕南的表述》，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 页。

[3]閻小操、陈绍军，2021，《重启与激活：后扶贫时代易地搬迁移民生计转型与发展研究——以新疆 W 县 P 村为例》，《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第 5 期。

[4]陈绍军、任毅、卢义桦，2018，《“双主体半熟人社会”：水库移民外迁社区的重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5]任克强，2019，《持续提升网格化社会治理效力》，《群众》第 20 期。

[6]科尔曼、邓方译，1990，《社会理论的基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7]DFID，2000，《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 London: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8]刘金龙、金萌萌，2020，《易地移民搬迁能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吗？——基于陕南 S 县的调查》，《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7 卷第 2 期。

[9]田鹏，2018，《“乡土连续统”：农民集中居住区实践样态研究——基于后乡土社会理论视角》，《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 期。

退休人员社会关系网络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 H 高校为例

王 睿 施国庆 刘会聪

摘要：退休人员退休前后的社会关系网络变化是其社会适应和再社会化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必须关注的问题。本文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社会支持理论和活动理论的理论视角，以 H 高校 150 份问卷调查为依据，分析退休人员的社会关系网络变化。研究表明，H 高校退休人员的社会角色更加多元化，社会活动更加多样化、社会空间积极外扩、社会支持网络更加丰富。影响各种类型的退休人员社会关系网络变化的因素主要包括个体、家庭、社会环境和社会政策。建议从个人、家庭和社会层面采取措施，如关注退休人员的思想需求、加强家庭情感支持功能、链接资源和完善政策等，以加强退休人员的适应能力和幸福指数。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高校退休人员 社会关系网络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生育率降低和人均寿命延长导致的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现象。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在世界上也是居第一位的。到 2001 年，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带来了比发达国家更为突出、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强调有效应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和亿万百姓福祉。总而言之，中国人口结构正在快速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正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成为国家和人民关注的焦点。

退休是国家对老年人的一种福利制度，男性满 60 周岁、女性满 55 周岁即可退休，享受养老保险待遇。随着老龄化进程不断加深，退休人员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退休前虽然大部分人都有思想准备，但是一旦离开多年的工作岗位和人际交往环境，打破了一直以来固化的角色，很可能产生社会参与感和存在感的变化。

而高校退休人员总体特征如下：

(1) 思想认知。高校退休人员大多具有专业的知识和较高的学识，对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各类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和主见，与人能够有效真诚的沟通。且大多数的人的思想觉悟较高，有一定的情怀和追求，退休以后大多也有自己的安排规划。

(2) 经济基础。相比较一般的老年社会群体，高校退休老人有比较稳定优越的退休保障，单位福利待遇较好，晚年生活较为殷实。家庭生活方面：生活品质和生活质量较高，且由于他们文化素质高，思想观念先进开放，受教育程度高，所以大多数生活自主性比较强，可以很好地打理自己的生活。

(3) 生活环境。高校退休人员大多有自己的生活圈子，且长期以来形成的工作，生活，人际交往圈子都与单位有关，所以对单位有特别的归属感和依赖感。

二、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

(一) 理论视角

社会网络理论。社会网络是一种基于“网络”（节点之间的相互连接）而非“群体”（明确的边界和秩序）的社会组织形式，指社会个体成员因为互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体系，关注的是人们之间的互动和联系。社会网络代表各种社会关系，把从偶然相识的泛泛之交到紧密结合的家庭关系的各种人们或组织串联起来。本文注重分析 H 高校老人退休前和退休后的社会网络，找出其变化，分析其具体原因，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和相应的对策。

社会支持理论。社会支持是指一定的社会网络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无偿帮助的行为总和。Cobb^[1]认为，社会支持由三方面信息构成，分别为使个体相信自己是被关心和爱的、相信自己被尊重和有好价值的、相信属于共同的信息网络，并在这个网络中互相承担责任。姜乾金^[2]认为，社会支持指个体受到社会各方面给予的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帮助，其中各方面包括家庭、亲朋、同事等社会人及单位、家庭、工会等社团。周林刚等^[3]认为，从社会支持系统来看，可以将其分为三个方面，社会支持的受者、施者及社会支持的内容和方法，受者是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个体，也可以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施者是国家、社会、社团，亦可是家人、朋友、同事；内容和方法包括许多方面，如情感、物质、信息等。本文在社会网络的基础上，分析 H 高校退休老人的社会支持来源的变化。

活动理论。活动理论是罗伯特·哈维格斯提出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有活动力的老人比没有活动力的老人更容易感到满意，且更能适应社会。因此老年人应该积极参与社会，在社会参与中肯定自我，保持生命的活力。活动理论有四种假设：（1）角色丧失越多，参与的活动越少；（2）保持高水平的活动，会使老年人所要求的角色认同在角色支持中拥有更多的资源；（3）稳定的角色支持，可以保证稳定的自我认识；（4）自我认识越明确，生活满意度越高。本文根据活动理论，深刻分析了 H 高校退休老人退休前后的社会角色，社会活动，社会空间和社会网络的变化，为促进老人退休后更好的再社会化提出对策和建议。

（二）研究方法

本文以江苏省 H 高校退休及即将退休教职工为调查对象，调查所用问卷是课题调研组自制的《高校和卫生系统退休人员再社会化调查研究问卷》，根据研究目标共设计 58 个问题，包含退休人员社会生活和交往情况、退休后计划、家庭情况和工作情况的对比等内容。

在充分了解当前相关课题研究的成果与现状后，课题组调查从 2020 年 9 月 22 日起至 11 月 15 日，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资料。调查总共回收 130 份电子问卷，39 份纸质问卷，有效回收问卷 150 份，有效回收率为 88.75%。

调查显示，男性离退休教职工占 52.56%，女性占 47.44%，男女比例接近。从退休前工作职务来看，专业技术岗位达 59.17%，行政管理岗位占 20.12%，工勤服务岗位占 11.24%，其余岗位占比很小。

三、社会关系网络变化状态分析

（一）社会角色变化对比

角色原本是戏剧中的名次，它指的是演员扮演的戏剧中的人物。在社会学中角色是一套有关权利，义务的规范，形成了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而社会角色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与人们再社会关系体系所处地位相一致的，社会所期望的一套行为模式。退休作为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促使退休人员离开了原有的工作环境和生活圈子，打破了原来的生活规律，使之职业角色转变为较为闲暇的角色。角色转化是退休必须要经历的环节，就是脱离原来的常年的工作角色，在进入新的角色，而退休人员若是能对其新的角色建立起的角色认同，就有利于投入角色适应，更加享受退休后的生活。^[4]

H 高校退休人员退休前后的角色变化具体表现如下：

对于问题“您退休后参加下述工作吗？”调查结果如图 1 所示：



图 1 退休人员参与各类工作情况

H 高校退休人员退休前大多从事专业技术岗位和行政管理岗位等。他们的固定身份角色是教授，老师或者管理人员。根据问卷调查显示大多数人员退休以后人仍然参加各种工作，且工作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其中占比最高的分别是退休人员组织活动，社团 / 党组织活动和评审咨询活动等。社会角色更加丰富多元化。

对于问题：“您退休前后社会交往的圈子主要是哪些？”调查结果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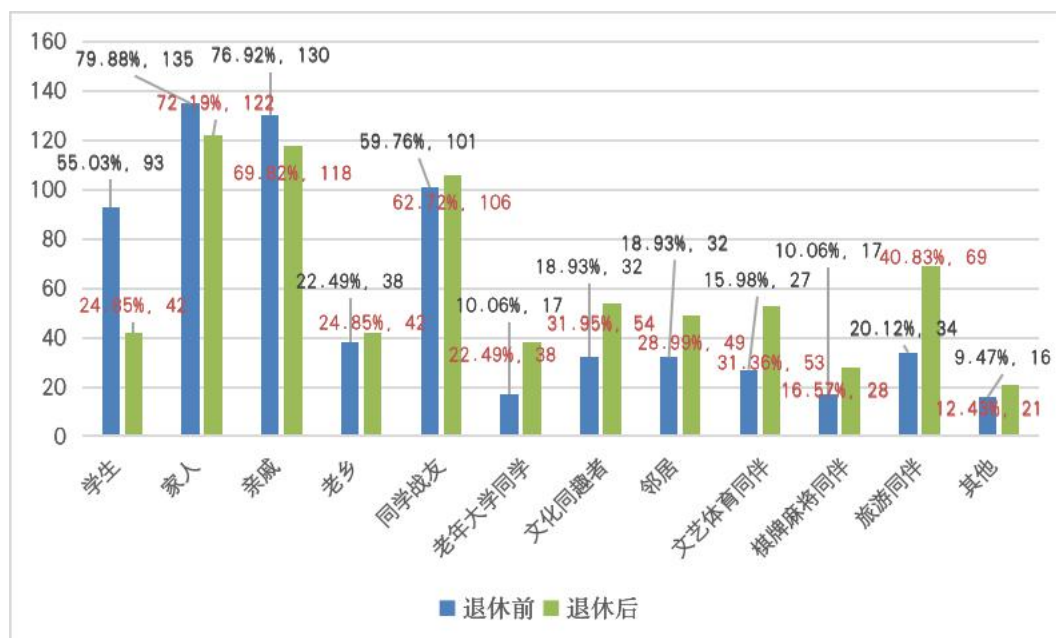


图 2 退休人员退休前后交往圈子对比

根据问卷调查显示，H 高校退休人员退休前主要接触的人员分别是家人，亲戚朋友，同学战友和学生。退休后虽然这几项仍然占有很高比重，但是其他选项比重都有较大幅度上升，其中老年大

学同学，旅游同伴，文艺体育同伴等上升幅度最大，与学生圈子交往比重显著减少。由此可见，H 高校退休人员退休后的角色转变更多是新角色进入的过程，是一次新的尝试，可以给个体带来新的新鲜感和幸福感。

（二）社会活动变化对比

社会活动指以他人为对象，旨在达到预期目标的个人或者群体的有意义的行为。包括全部的社会互动，是一种满足社会期待的角色扮演过程。分为小群体活动，社区活动和大规模的社会组织活动等。退休人员参与社会活动会受其健康状况，代际照料，经济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H 高校退休前后社会活动变化具体表现如下：

对于问题：“您退休前、退休后参加过或打算参加哪些活动？”调查结果如图 3 所示：



图 3 退休人员退休前后参加活动对比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H 高校退休人员退休前主要的社会活动是阅读电视，而在退休以后其他选项比重都有所提升，其中养生保健，养动植物，旅游摄影比重上升最多。可以看出，退休以后 H 高校的退休人员积极参加各类社会活动，可以很好地安排闲暇生活，对于再次融入社会表现出积极的愿景。

对于问题：“您认为您目前最享受退休生活的哪些方面？”调查结果如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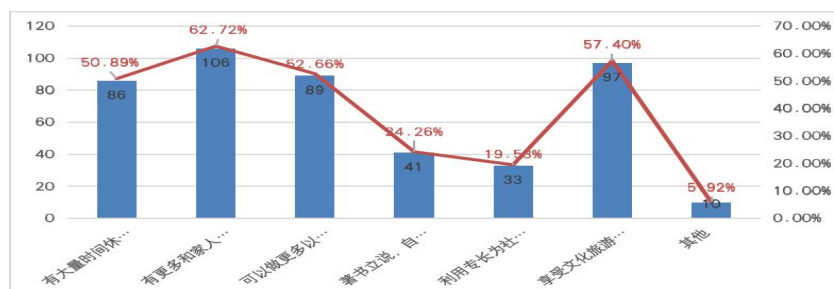


图 4 退休人员退休后生活

根据问卷结果显示，大多数退休老人对退休后生活是满意且适应良好的。他们认为退休后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享受天伦之乐，有大量的时间休息娱乐，体验之前由于忙碌工作没有体验过的新事

物。

（三）社会空间变化对比

社会空间是社会活动和社会组织所占据的空间。涂尔干将空间看成社会范畴概念，认为空间是人们对所属领域的认识，以共同的情感价值为划分社会空间的依据。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的产物。”^[5]将空间至于社会环境中，认为空间概念和人类的行为分不开，强调空间的社会性定义。社会空间分为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物理空间具有实在，有形和可测量的特点。但在社会生活中，人际交往涉及到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它的心理和社会意义。心理空间就是指主体在与他人交往中所呈现的主体对他人的心里开放程度，开放度越大，心理空间越小。还有一种空间，以一定的物理空间为基础，在社会互动中形成各种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这就是社会空间。^[6]

H 高校退休人员退休前后的社会空间变化具体表现如下：

对于问题：“您退休前后社会交往的圈子主要是哪些？”调查结果如图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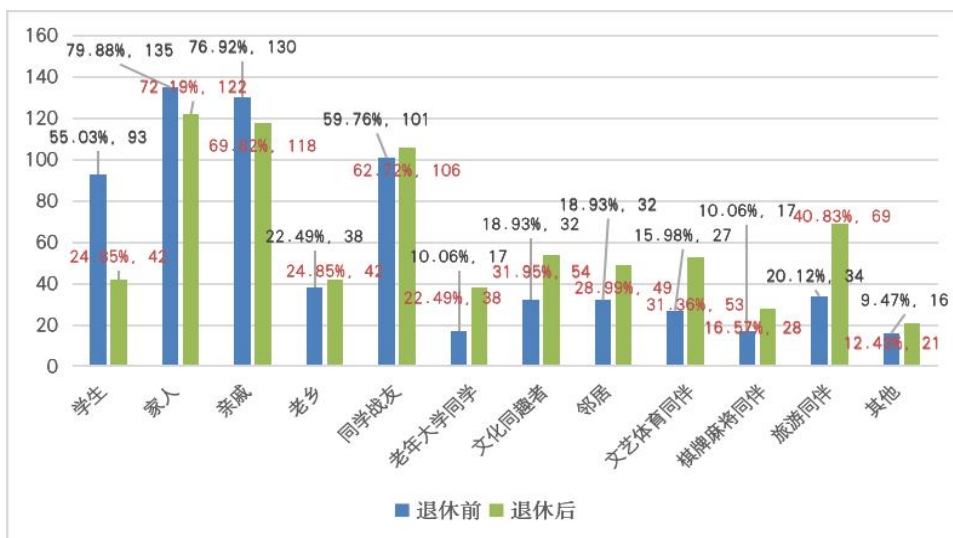


图 5 退休人员退休前后交往圈子对比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H 高校退休人员退休前的交际圈主要是家人，亲戚朋友，同学战友和学生。而在退休后，其他方面的交际圈有明显提高，例如老年大学同学，旅游同伴和文艺体育同伴等等。可以看出退休前的社会空间主要是家庭和工作单位，而退休后增加了老年大学，文艺娱乐场所，以及不同的地方旅游等。由此可见，H 高校退休人员退休后的社会空间也是外扩的积极的。

（四）社会网络变化对比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不但要参加多领域的社会生活，而且在任何领域都会形成多种角色关系，这样在人们身上就会形成纵横交叉的关系。某一社会成员或某些相互联系的社会成员为基础形成的纵横交叉的关系称为“社会网络”。一般把社会网络分为亲属网络，朋友圈子，同事网络，兴趣群体等。人们从社会网络中获得社会支持和社会资源。退休人员由于脱离了原来的工作环境，其社会网络也会发生变化。

H 高校退休人员退休前后的社会网络变化具体表现变化如下：

对于问题：“您退休后有结交新的朋友？”调查结果如图 7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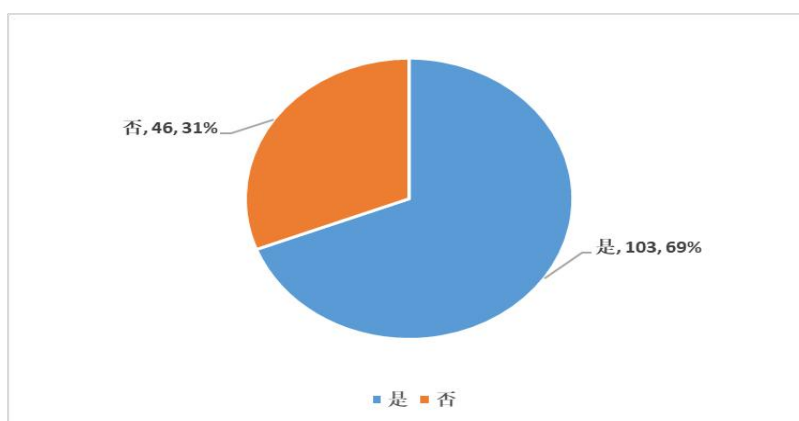


图7 退休人员退休后结交新朋友情况

根据问卷调查显示，H 高校大多数退休人员退休后都有结交到新朋友。他们的社会网络变化是积极的外扩的。

对于问题：“若是退休后新结交的朋友，主要是哪些原因结识的？”调查结果如图 8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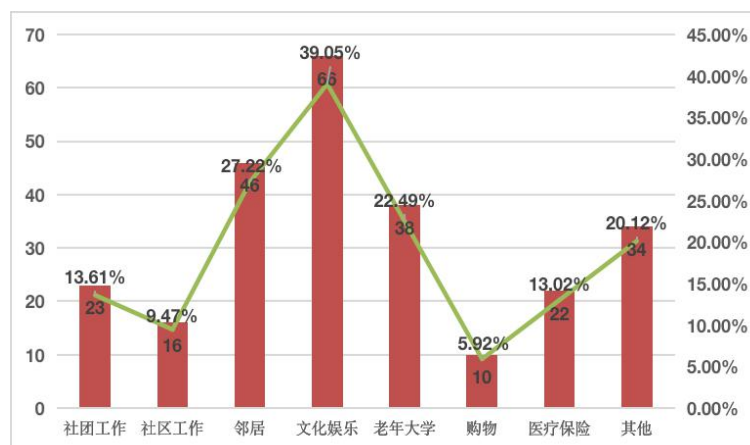


图8 退休人员退休后结交新朋友原因

根据问卷调查显示，H 高校退休人员新结交的朋友主要是通过文化，娱乐，体育健身舞蹈活动，邻居和参加老年大学结识。从中可以看出，H 高校退休人员的退休后积极参与各类社会活动，扩展交际圈子，可以从更加丰富的社会网络中获取更多的社会支持资源。

针对问卷的具体问题，从社会角色，社会活动，社会空间和社会网络四个方面的具体分析，H 高校退休人员的社会关系网络变化总体来说积极的。对退休生活评价较好，再次融入社会没有困难，有足够的养老保障，并且享受退休以后的闲暇时光，有更多时间和亲朋好友相聚，能很快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做以前没有体验过的事情，学习新事物，重新找到社会价值，享受退休生活，积极的投入继续社会化或再社会化中。

四、退休人员社会关系网络变化的主要因素分析

退休作为人生的一个分水岭，面临社会角色从“工作角色”到“休闲角色”，的转变，社会活动空间从“工作重心”到“家庭重心”的转变。虽然针对 H 高校来说，整个变化趋势是积极的，但是对于各种类型的退休人员，其社会关系网络变化是不一样的。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

（一）个体因素

主要分为年龄，性别，健康状况，退休前工作岗位，退休前退休规划和个人性格等因素。

从年纪来看，一般来说，退休年限越长，年纪越大的老人，对退休生活的适应度越高。因为随着时间推移，老人慢慢适应了退休的另一种生活节奏，重新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定位，建立了新的生活交往圈子。

从性别来看：一般说来，女性在退休前承担主要的家庭责任，而男性在退休前承担主要的经济责任。^[7]所以一般来说，退休后工作这一重要的生活组成部分从生活中退出后，女性可以从投入更多的时间到家庭事务中，实现退休后的生活调试。而男性不上班以后会产生“无所事事”难以适应的感觉，需要更长的时间适应退休生活。

从健康状况来看，健康是老人参与社会活动的基础。^[8]身体健康充满活力的老人，其退休后的参与的社会活动会更多，而身体有疾病的老人则相反。

从退休前工作岗位来看，一般来说，退休前承担领导职位和干部职位的退休老人，更加难以适应退休生活，退休后的落寞感越强，退休前受到的尊重越高，退休后的失落感越重。而退休前的工作强度也与退休后的社会关系网络有着间接联系，一般来说，退休前工作强度越强的老人，越渴望退休得到身心的放松，其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的参与度也越高。

从个人性格来看，一般来说，性格更加外向开朗的老人，对退休后的角色适应会更快，会更加主动积极的学习新事物，融入新环境和退休的后的新的交际圈，获得的社会支持会更多，社会关系网络扩展会更快。

（二）家庭因素

主要分为婚姻状况，代际照料和家庭关系三个方面。

从婚姻状况来看，一般来说，已婚状态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老人参与社会活动。^[9]相对于独居的老人，有老伴的老人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一些家务负担，其家庭活动会更多，从而减少了社会活动的参与机会。

从代际照料来看，有照料责任的老人把绝大多数时间投入进照料孙子孙女中，从而减少了自身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的时间，影响其社会关系网络。

从家庭关系来看，和谐有爱的家庭环境和家庭氛围更有利于促进老人参与社会活动，会让其有强大的家庭力量支持，内心充满重新融入社会的希望和活力。

（三）社会环境

主要分为城乡差异和所在地区社区和社会组织的活跃度等因素。

从城乡差异来看，生活在城市的老人，其思想观念越开放，接触到的新鲜事物越多，且参与的渠道也更多，社会活动内容也就更丰富，形式更加多样

从社区和社会组织层面来看，所在地区的社区越重视老年社会工作，专业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越多，其地区的老人也就有了更多参与社会交往社会活动的机会，从而促进其社会角色的适应和转变，促进社会关系网络的拓展。

（四）社会政策

主要分为退休金和医疗保障等政策支持因素。

退休金和医疗保险可以保障老人的基本生活，基本生活富有的老人更加注重精神生活的富足，更加倾向于体验不同的社会活动，结交不同的朋友。

五、对策建议

根据问卷结果显示，大多数退休老人再次融入社会的困难占比最高的分别是以下几个因素：工作

单位同事都很忙，突然离开工作岗位不习惯，生活节奏变化很大和社区邻里不熟悉。相当大比例的退休老人都希望能从原单位获取帮助，他们的主要意愿依次为：希望多举办医疗保健健康类讲座，文化旅游类的讲座和培训，关爱慰问退休老同志和老年心理健康咨询。同时他们希望政府社会能够改善医疗条件，提供社会活动机会和老年大学的学习机会，也希望社区居委会，专业老年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老年社会工作团体以及家人能帮助其适应社会生活，链接资源，促使其社会再融入。

对此，笔者从个人，家庭和社会三方面提出建议：

（一）个人层面：关注思想需求和加强思想建设

做好退休人员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感受社会的温暖，发挥他们对年轻人言传身教的作用，对于提高其幸福指数、增进社会和谐、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一，多倾听退休人员的需求和困惑，坚持接纳，理解，尊重和非评判原则，讲究说话的艺术，避免语气生硬、态度冷漠，切莫让他们有“人走茶凉”的感觉，为他们排忧解难。其二，多开展积极向上、文明健康的社会团体活动，鼓励其多参加老年大学，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丰富退休人员的生活，树立其积极的退休态度和自信心，提升身心健康水平。

（二）家庭层面：发挥家庭的情感支持功能

家庭是人们的情感纽带，是满足经济合作和人类亲密关系的基本单位。问卷调查显示出，大多数老人退休再融入社会都希望家人给予理解帮助。和谐的家庭氛围和有效的家庭关注对老人来说至关重要。

其一，成年子女应尊重，接纳，理解退休老人的心理意愿，给予退休人员更多的爱与帮助，和谐的家庭氛围有利于其顺利度过退休的适应阶段。其二，在即将退休人员心理疏导，分析其退休后的各方面变化，让老人提前预知即将到来的退休生活，促使其思想观念的转变，便于以后更好的适应社会生活。其三，成年子女应帮助老人减轻家务负担和代际照料负担，让其拥有更多自己的时间，发展业余爱好。

（三）社会层面：链接资源和完善政策

人口老龄化的浪潮正在深刻地改变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格局，退休人员的队伍也受其影响不断壮大，作为一个我们不能忽视的社会群体，社会应加大对退休人员的重视力度，充分发挥社会的支持作用。

其一，完善养老保障体制，尤其是医疗保障体制，以提高老人看病的便利性和可获得性。其二，鼓励发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会组织团体，培养养老服务专业人才，为退休老人提供专业帮助。其三，针对退休人员“再就业”需求，建立相关信息平台，链接资源，为其提供就业机会，促使其再社会化。

总而言之，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全社会应当共同努力，给退休老人更多的关心照顾，完善机制，促使其重新适应社会生活，促进其再社会化。

参考文献:

- [1] Cobb Sidney, 1976, *Social Support as a Moderator of Life Stress*, *Psychosomatic Medicine*.
- [2]韩晓姣, 2010, 《人的社会化进程中空间变化的实证研究——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为例》,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3]Lefebvre, H.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Blackwell.

[4]姜乾金, 2004, 《医学心理学》,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5]邱红、魏雅鑫, 《我国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及影响因素分析》, 《教育与社会科学综合》。

[6]赵岳, 2013, 《退休人员角色转化的研究》,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第3期。

[7]周林刚、冯建华, 2005, 《社会支持理论——一个文献的回顾》,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第33期。

☆作者简介: 王 睿, 河海大学社会工作专业 2020 级硕士

施国庆,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刘会聪, 河海大学社会学专业 2019 级博士

☆责任编辑: 吴晓彤

※※※※※※※※※※※※※※※※※※※※※※※※※※※※※※

校地合作, 共建共赢 ——我院签约五老村街道“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

为进一步引导和激励学生深入社会、投身实践, 促进资源共享、双方共赢, 6月10日, 我院与五老村街道举行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共建仪式, 现场座谈、签约并揭牌。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朱志梅教授、副院长陈涛教授、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主任顾金土教授、MSW 教育中心主任武艳华副教授、社会学系张虎彪副教授、杨方博士和学院团委书记张莉婷出席签约仪式, 五老村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宁松、办事处主任朱雪松等班子成员、相关街道干部、社区书记主任参加仪式。

公共管理学院副书记朱志梅教授介绍了河海大学的基本情况, 以及公共管理学院的机构设置、专业设置、学科特色等情况。朱书记强调了大学生社会实践在高校育人中的重要性, 希望与五老村街道协同合作、互利互惠。

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陈涛教授回顾了双方在前期为推进基地共建所做的大量工作, 对五老村街道为师生提供的资源和支持表达感谢。他认为社会实践基地的成立, 拓宽了学校教育路径, 有助于学生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 强调要进一步创新合作形式, 探索更多的合作可能。

五老村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宁松表示, 河海大学社会实践基地挂牌成立, 标志着双方进入实质性合作阶段。双方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 河海大学有深厚的理论滋养资源, 五老村街道有丰富的基层实践资源,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将助力培养既有理论素养, 又有实践能力的综合性人才。

办事处主任朱雪松讲述了与我院开展共建的渊源, 表达了对公共管理学院各位老师的感谢, 希望河海老师今后在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等方面提供更多的理论和专业支持, 也期望学院选派学生参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新街口商圈党群服务中心服务等志愿服务活动。

随后, 陈涛副院长与朱雪松主任签订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共建协议书, 朱志梅副书记与李宁松书记共同为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揭牌。



书评 专栏

发轫与超越：法国教育史研究的总体史观

——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书评

刘静雯

摘要：涂尔干在《教育思想的演进》一书中运用独特的教育史观追溯教育发展史，考察法国教育实践的演变和教育观念的建构和变迁，并指出中等教育在法国存在的大部分时期内，整个教育舞台都是中等教育在唱主角。这本勾勒法国教育和教育理论的通史性著作不仅注重运用“以古鉴今”的方法研究教育演变，阐释教育发展规律，也焕发出对教育本质的讨论，最后回归到其社会实体的框架内理解文明社会的人性。本文在阅读《教育思想的演进》一书的基础上试图整理出教育学与社会学的关联、教育史观、基督教与教育三个部分，结合国内学者的相关论述，表达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涂尔干教育史观 中等教育 教育史观

一、教育学的基因：社会学研究以教育学为先声

作为一名伟大的社会学家，涂尔干对社会事实的关注始于法国大革命后个人主义的泛滥与民主的暴政，纵观他的前后期思想，其逻辑主轴是通过实证方式来考察道德事实的路径^[1]。涂尔干在“物”与“及物”的社会事实方法论框架内搭建起社会分工的思想谱系，表现出对宗教、对政治丰富的研究旨趣，更为显著和令人称道的是，涂尔干多年来持续不懈地关注着教育与教学，在大学执教期间也花费了大量时间在教育科学上，《教育思想的演进》^[2]即为涂尔干1904-1905年所开设的“法国教育史”课程的讲稿整理而成，凝结着涂尔干对法国教育制度和教育观演变的心血。

涂尔干在法国这片肥沃的思想土壤上为社会学与教育学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正印证了哈布瓦赫在《教育思想的演进》1938年版导言中提到的“社会学并未被允许大事声张地进入索邦，而是转经教育理论这扇小门悄悄进去的。”（涂尔干，2016：1-2）换言之，社会学之所以能在法国得以蓬勃发展，仰赖于涂尔干对教育社会学的开创性探索，他不仅成功贯彻了经典教育理论的三种研究视角：道德教育、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说史（涂尔干，2016，2），而且播种下了人文主义的生机，以教育推论人世，以人性推论文明社会。无论是在面临失范状态急需道德秩序重建的时期，还是在加洛林文化复兴时期，教育始终具有一副有力的身体，怀揣着独立的精神，映射着社会的构造，教育的器官与社会体中的制度、习俗、信仰、思想运动紧密关联，承载着历史的气息，鲜活的存在着、演变着（涂尔干，2016，2-3）。

正是因为教育与社会的高度亲和性，涂尔干研究教育的初衷即为考察在情势与社会环境的压力下教育问题如何产生，怎样发展，又能汲取怎样的教益，以古鉴今，寻求出路（涂尔干，2016，5-6）。

“教育”是一门有关人何以成人的学问，这个议题自古以来就富有延绵不断的生命力，得到了智者学家、政治领袖、宗教人士的高度重视。对洛克而言，现代人需通过反复的实践养成自我克制的习惯，理性认识自己的责任，从而避免陷入趋利避害、支配他人的恶的消极状态，才能拥有自由。卢梭在《爱

弥儿》一书中将教育与自然的逻辑相联，克服社会意见的侵害，诉诸于情感本能和真理，从自然自由过渡到道德自由^[3]。社会学以教育学为先声的真正理由肇源于一个判断：教育是将家庭、社会、政治、宗教等一切文明之要件综合起来的枢纽^[4]。因此，《教育思想的演进》承载着浓厚的社会学意味，涂尔干本人对教育史的考察也贯彻着社会学意义上的历史观（渠敬东，2015，25），建构了一种独特的教育史观。

二、教育史观的建构：书写法国中等教育史的研究意旨

（一）教育史的研究取径

本书第一讲厘清了教育理论研究的整体脉络，阐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对教育史的研究为何重要。涂尔干切中了中等教育领域内正发生着的以及将要发生的重大变革，运用反思性观照教学体系与教育人士，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过去，从而理解现在，而不是一味的预想未来。由此，教育史的探究为教育理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涂尔干，2016，19）。这种不同于普遍分科意义上的教育学视角的探究路径糅合了社会学的学科意涵，正如上文中所述，涂尔干搭建起了教育学与社会学间的沟通桥梁，在对教育史的书写注入社会学的生机，在尝试描绘和比较历史性个案的同时，把握各项因果关联，透视各条件组合或因果集合，最终为历史之实在构成给出一种总体性的解释（渠敬东，2015，25）。

涂尔干所运用的这种充满着历史性的教育史观要求深入研究构成教育的这些要素是通过怎样的方式一步步聚合，组合并形成有机关联的（涂尔干，2016，27），即需要探究构成教育这个复杂有机体的各要素具有怎样的内部演变与外部变迁，在生生不息的历史进程中是如何运作的，其身上积累的历史印记又会有怎样的呈现。涂尔干始终认为，要想真正理解一项教育主题，都必须将之放在机构发展的背景当中，放在一个演进的过程中（涂尔干，2016，21）。这种历史的解释尝试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确立一种相互构成的辩证关系，具有不同于文艺复兴期间对经院哲学极力否定的出奇的冷静与客观（渠敬东，2015，26）。涂尔干大抵深谙自然界的生存法则和生长逻辑，也具备长远的眼光和宽广的胸怀，他认为现在与过去不应为敌，也不应完全二元割裂，而是应当形成清晰的历史认识，与《旧唐书·魏征传》中的“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的反思精神极度契合。《教育思想的演进》所叙述的也是一部关于教育思想实验发展的历史，涂尔干本人也在不断实践着反思观，试图体验和描述着这种思想实验的历史过程^[5]。

涂尔干在阐述教育史观的用意的同时重点厘清了教育的目标。与其历史研究的核心逻辑一致，今日教育的目标必然是塑造时代标准下的典范，提升心智水平与道德修养，然而我们需要理解的主体并不仅仅属于自己的时刻，而是处在贯穿时间的整体性当中的人（涂尔干，2016，22-24）。如此看来，在确定教育目标的时候，并不能够仅仅参考单一时间点的标准与规则，而应当首先意识到自己的身上蕴含着曾经的历史印记，尽力还原其整个发展过程予以完整考察，将自己的时代与看似很遥远的教育思想体系形成对话，涂尔干认为只有着手研究欧洲文化最先肇发的那套教育思想体系，描绘、说明、追随、感受其的演变逻辑和发展脉络，从而使当代的我们有能力与自己的原则交流，继承被不断检验过、审视过的历史遗产，理解构成要素存在的正当性，以客观冷静的观察力直面当下的处境（涂尔干，2016，24-26）。

（二）中等教育史的研究切面

涂尔干在教育史研究中标识的重点事实是中等教育在社会生活的总体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在法国教育历史进程中，中等教育始终扮演着主角，14、15世纪以来整个国家最重要的思想力量就是

在中学中形成的（涂尔干，2016，31）。对法国大革命以后的变革时代而言，中等教育一直在经历着一场严重的危机，而这场危机也根本没有走到尽头（涂尔干，2016，16-17）。可以这么说，中等教育是法国教育演进的缩影，详细考察法国中等教育领域内的特征与变迁是最为适宜的描绘法国教育史的视角，因此涂尔干编撰这本法国的教育和教育理论的著作时也是在编撰中等教育史，详细考察实现教育理念为职责的学术机构，以及表达自身的学说（涂尔干，2016，31）。

将中等教育作为研究切面不仅具有上述必然性，还需有充分性。教育思想史和社会民德研究有密切的关联，而中等教育承担了对公民社会化的责任，在文化整体上产生多种效应。首先是中等教育对国家政治构造、民族精神塑造、西方文明的接续与重启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渠敬东，2015，27），不仅注重心智的培养和知识的传输，也承担着公民气质与国家精神的培育功能，注重人本主义的法国教育虽然难免存在着阶级分层，但仍然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主流话语，对知识精英及普通大众予以身心方面的培育。涂尔干也说过，中等教育特别的作用就是从民族性情中的某种特异之处而来的（涂尔干，2016，31）。以此，对中等教育领域的探究自然不是停留在法国教育史描述层面，而是国家、文明社会、文明样态的映射。涂尔干从加洛林文化复兴时期说起，经过大学、学院的建立时期、文艺复兴运动时期、法国大革命时期，最后在19世纪课程体系的变化时期对中等教育进行了再度界定，其间涂尔干关注到教育被赋予了两种不同的宗旨，一方面是期望教育能够为孩子提供替代旧式古典教育的选择，而另一方面，人们又期望它为特定职业做准备，即关注教育的专门性，这两种宗旨难以调和，直到1890年出台的条令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涂尔干，2016，457-258）。这就引出了另一个多年来被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古典主义教育与现实主义教育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联系？如何调和？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囿于古典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思想之间，价值目标应当如何确立？^[6]

现在让我们回到中等教育的这条主线中来。涂尔干对中等教育的描述是本书的核心线索，贯穿了这整部教育思想史的发展演变史。

无论是在经院哲学时代还是在人文主义盛行的时期，在失范状态还是在稳定状态，中等教育从来都没有以职业取向为根本的目标。有关于教育本质和实际生活联系的需求实现并不是依靠将中等教育完全变质为职业培训，而是通过传授辩证法、文法等训练心智，促使被教育者拥有正确的思考，即以正确的方式思考事物，理智面对现实（涂尔干，2016，458-465）。涂尔干之后在结论部分谈到了教育与人世以及教育与自然的联系，最后落点在了人本身上，即所有教育都必然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人与自然具有高度亲和性，人在自然中生存且源于自然，由此人事方面的教育要以自然方面的教育为前提，教育培养的目标其实已经不再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了，而是要在每个人身上培养全面的理性能力，培养社会关切能力，蕴含着语言的修养、科学的修养、历史的修养的教育才是促进全面发展的培养（涂尔干，2016，502-504）。

简单梳理过《教育思想的演进》一书中的教育史和中等教育书写之后，涂尔干的教育史观和研究路径已经大概明晰了。接下来我们不妨遵从涂尔干的历史观逻辑，追溯到文艺复兴之前，追随到经院哲学家之前，触及到现代社会历史中教育观念最初的那个“细胞核”开展研究（涂尔干，2016，32）。怀揣着对法国早期教育的探究心态，看一看西方早期教会与教育的关系以及基督教在法国的民情土壤上扎根发芽的历史。

三、教会与教育的亲缘性：基督教伦理与日耳曼社会的隐秘投契

（一）芽孢的追寻——罗马文明

法国的思想文化最早是可以追溯到罗马文明的。实际上，日耳曼人和罗马人之间的关系是憎恶的、

蔑视的，这种相互之间的敌意让这两个民族之间存在着一条深刻的道德鸿沟，只能依靠原始又野蛮的武力消弭文明。然而，在这两种文明碰撞的过程中却擦出了新的火花，罗马帝国的教会在法兰西社会中扎下了根，充当了沟通的媒介，使得罗马的精神生活与重建后的新兴社会产生了交融的可能，教育在其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涂尔干，2016，33）。教会的社会作用首先体现在两种文明间的互通有无，其次也体现在宗教层面和社会层面，更多的是与教育本身具有的功能和效用一致的。早期法国社会中教会与教育的水乳交融主要是源于两者特性的契合，基督教教义能够与日耳曼各社会中的种种欲望与心智取得一种完美的协调（涂尔干，2016，35），并且两者互动后产生了持续不断的回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承载着宗教精神的教会产出了一种特别的教育效应，基督教伦理也与日耳曼各社会形成了一种“隐秘的投契”。

在发现罗马文明与日耳曼文明的碰撞与交融这一现象之后，涂尔干不禁发问：这些孔武有力、生机勃勃的社会，为何会心甘情愿地臣服于基督教沉闷忧郁的生活规则呢？节制与自我约束的教义如何与蓬勃的欲望产生调和呢？（涂尔干，2016，34）罗马帝国在经历了极度奢侈和辉煌的鼎盛期之后，被各种内外部因素裹挟着，逐渐走向败落与衰颓，留给社会大众无尽的空虚与失落。而基督教从本质上而言是穷苦人的宗教，从贫苦大众的面向上构造了一种天国与上帝的想象，将其对此世的失望转化为对彼世的向往，为淳朴甚至有些粗鄙的日耳曼人提供了精神抚慰和教育意义上的证成（涂尔干，2016，35-36；渠敬东，2015，28）。这时候，教会与野蛮民族之间就形成了对应关系，形成了一种非常有力的亲和，有效的回应了衰颓期日耳曼民族的精神需求，也给予了他们重建文化的信心，民众们以基督教为精神寄托重拾民族的归属感，寻找着灵魂救赎的方向所在。

（二）复兴的符码——修道院与大学

基督教创建之后依靠讲道（讲学）进行观念和情感的传递，教会面临着神职人员和普通信徒理解和体悟教会精神的高层次需求，被迫开办学校，导致了学校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教会的事工，不仅具有宗教的成分，也具有古代文明的教益（涂尔干，2016，39-41）。换句话说，教会是连接古代社会与文明社会的沟通桥梁，同时也是神圣世界与凡俗世界的纽带，因此学校从缘起之时就饱含着宗教性与世俗性。在学校建立之后，授业方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早期教育体系内部相对分散，教师各司其职，学科严格分野，而受到基督教信仰影响之后教育观和教学观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关键的一点是要让受教者处在同一个道德环境中，让他们持续不断地接受到强有力的汇聚性的教育，从而形塑其本性，培养其心智，传递符合时代标准的道德原则和社会规范（涂尔干，2016，45-50）。我们可以从中体悟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所奉行的教育是培养专业性高的思辨人才，或者可以说是相对单一却精深的培养体系，而宗教要素注入教育之后，关注的是对教育土壤的改良，构建与宗教教义高度契合的教育体系，从而达到观念和情感传递的目的。

加洛林文化复兴时期，建立起了一套独特的学术等级体系，包括堂区学校、主教堂学校和大修道院学校、模范学校（宫廷学校）三个梯级，神职人员掌管教育，教学是为了稳固帝国基业（涂尔干，2016，69）。这种百科全书式的教育主要是包括文法、修辞和辩证法这三门学科，之后是被称之为“奢侈之物”的四艺（涂尔干，2016，72-78）。在这套教育体系中，我们依然能够发现基督教和教会的重要作用。比如，文法的传授是在三科四艺中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的，这就涉及到了对基督教教义的解释权的问题。研习文法就意味着学习怎样理解经文，而普罗大众苦苦追寻的真理就蕴含在这部经书中，只要掌握了打开这扇真理之门的钥匙，那就拥有了至高无上的解释权，也就相应的享有了权力，因此，文法研究历经多个时代都生生不息，从未停息，从对基督教教义的阐释到对各时期学者著作的诠释，

借助上帝之手完成现世之作。

经院哲学与大学建立之时，欧洲进入了十字军东征时期，掀起了一股经院哲学的热潮，开启了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将思辨性的真理作为救赎之路的指针。之后，具有涂尔干笔下法团特征的巴黎大学建立了，融合了普通教育和专科教育，并继续遵从心智培养的核心原则作为大学精神的核心。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宗教改革运动开启了一种“朝向个人主义与分化之运动”的自然趋势，“理性”观念的发展消解了中世纪的苦行与禁欲观念，呈现出有力的革命姿态。耶稣会时期，具有严格起居制度的膳宿学校内部发明了今天的导师制度，这种管理体制及建立了内部小群体的认同感。与此同时，知识操演和学术竞赛也成为了修炼信仰的工具（渠敬东，2015，29-30）。

通过涂尔干书中的几个重要时期，结合渠敬东老师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早期教会和教育交融阶段开始，其间经过两个文化复兴时期，出现不断的对立和调适，最后到辩证运动时期，教育体系内部不断得以完善，与现今的教育体系不断吻合。在整个中世纪教育史的发展过程中，宗教的因素始终是最核心的呈现，不仅从最初的修道院学校、宫廷学校、僧侣、神职人员到建立巴黎大学、文学院、艺学院等，最后，文艺复兴运动和耶稣会运动开启了新时代，将教育转移到释放人性与培育品性的主题上来（渠敬东，2015，38）。学校作为宗教的载体，承担着观念与情感传递的功能，教育的目标始终都存在一个原则，那就是形塑作为整体的心智，用知识武装头脑。同时，历史时期不断发生的教育改革也证明了涂尔干笔下的自觉意识和反思的理念。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教育学与社会学的关联、教育史观、基督教与教育三个部分的整理，我们首先可以感受到涂尔干本人始终具有的社会学关切，并运用历史性的教育史观展开对法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育思想的演进》一书中始终都有着社会学的映射，比如贯穿整个历史时期的反思性观照、教育本身具有的社会化功能、宗教仪轨与教育的紧密关联等。在通览全书之后，我们首先明晰了一点，那就是在法国这篇土壤上，学校一开始就是作为教会的事工的，带有浓厚的宗教意味，尘世与信仰的联结也是靠教育完成的，之后经历了多次的宗教改革和教育改革，不仅搭建起了完整且连续的教育体系，而且也与基督教精神高度契合。

在《教育思想的演进》最后，涂尔干最终回归到对人性的讨论上来，人性如此丰富且多变，我们也不能继续把人性理解为单一的存在，而是应当从基本人性的原材料中，发展出多种多样的思维体系，并且更要注重的是，我们要参考之前出现过的人性，以古鉴今才能更好的理解当下的人性，才能构建出契合文明社会的培养体系（涂尔干，476-484）。

实际上，涂尔干的这本《教育思想的演进》涉及到多个教育学和社会学的议题，本文并未提及和探讨的也有很多，其宽阔的总体史观决定了该书不仅具有历史性的辩证过程，也具有对传统与文明遗产的继承事实，书写现在和未来的首要前提就是要从过去的发展中寻找答案，这大抵也是唐太宗和魏征想要告知后人的至理名言吧。

参考文献:

- [1]王依娜、尹栾玉，2018，《“物”与“及物”：涂尔干社会事实方法论的核心范畴》，《社会科学论坛》第5期。
- [2]涂尔干，2016，《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3]渠敬东、王楠，2013，《自由与教育：洛克与卢梭的教育哲学》，《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1期。

- [4]渠敬东, 2015, 《教育史研究中的总体史观与辩证法——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的方法论意涵》,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4期。
- [5]展立新, 2006, 《揭秘历史“隐得来希”, 发轫现代大学理论——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历史观和大学观述评》,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2期。
- [6]李琳璐, 2020, 《古典主义教育与现实主义教育的对立与调和——基于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的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學刊》第1期。

☆作者简介: 刘静雯, 河海大学社会学专业2020级硕士

☆责任编辑: 王岚茜



博士毕业 论文摘要

2020 年博士毕业生毕业论文摘要*

“善变”的“守村人”： 南京市 Z 村乡村旅游发展的个案研究

吴蓉

指导教师：叶南客

答辩日期：2020 年 9 月

关键词：乡村经济精英 乡村旅游 多元理性叠加 社会结构 行动策略

摘要：改革开放后，伴随乡村市场经济和基层民主的发展与完善，乡村社会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乡村经济精英，他们凭借自身拥有的资源与能力获得了农民的认可与赋权进而成为左右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乡村经济精英凭借自身过人的胆识、敏锐的市场嗅觉、杰出的经济才能等优势积极地活跃在乡村社会新兴产业的舞台上。近些年乡村旅游作为大部分乡村地区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新业态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着力点，吸引了愈来愈多的乡村经济精英纷纷参与其中并成为乡村经济发展中一抹亮丽的风景线，也使得乡村经济精英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紧迫感。

本研究以南京市 Z 村乡村旅游发展为个案，根据安东尼·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及其提出的策略性行动分析方法和本文案例的实际情况构建乡村经济精英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行动者——结构”分析框架，以动态性方式阐述与分析乡村经济精英在乡村旅游萌芽期、建设期和运营期等不同阶段自身行动者特性和其面临的社会结构，分析乡村经济精英面对地方政府、基层组织、普通农民和管委会所采取的行动策略，进而系统性地提炼出乡村经济精英在参与乡村旅游发展中自身理性特征、面临的社会结构特征和行动策略特征，对乡村经济精英在乡村旅游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进行界定，最终探索性地提出乡村经济精英参与下乡村旅游治理变革的对策，从而实现乡村旅游产业多元主体共生式发展和推动乡村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目标。

第一，考察乡村经济精英在乡村旅游萌芽期内行动者特性、面临的社会结构和采取的行动策略。首先，乡村经济精英自身呈现出“穷则思变”的行动者特性。乡村经济精英通过对自身面临的生存困境进行反思，并借助“他者”认可完成合理化过程，由此激发了自主创办农家乐的行动动机。其次，乡村经济精英面对的社会结构有五个，分别是乡村经济精英自身积攒的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Z 村拥有创办农家乐所需的区位性资源、乡村旅游产业正式性规范的暂时性“缺位”、村内非正式性规范中熟人信任机制的作用、区域性农家乐案例所释放的标杆效应。在诸多社会结构中，以乡村旅游产业正式性规范的

* 以答辩时间和作者姓名首字母为序。

暂时性“缺位”为影响最大的社会结构。这是因为乡村旅游产业正式性规范的暂时性“缺位”不仅造成乡村旅游边缘化的产业地位，而且也影响了基层组织与普通农民对于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的信心，制约了乡村经济精英行动自主性空间，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形塑摘要了具有“八百年的枫树苑”色彩的社会结构。最后，在行动者自身和社会结构的双重作用下，乡村经济精英面对基层组织“无为”策略和普通农民徘徊观望策略而采取资源主导型的行动策略，即有限依赖策略和积极动员策略。所谓的资源主导型的行动策略是指在“穷则思变”的行动者特性的影响下，乡村经济精英以自身拥有的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为最重要的行动筹码，以此为行动基础发挥其他社会结构的作用，从而消除自身和社会结构所形塑的行动阻碍，最终乡村经济精英取得了更高层次的“生计在乡”的行动结果。

第二，考察乡村经济精英在乡村旅游建设期内行动者特性、面临的社会结构和采取的行动策略。首先，乡村经济精英自身呈现出“变而求强”的行动者特性。乡村经济精英对如何实现自我生计与村级产业共赢展开反思，并借助“不可因小失大”理念完成自身行动合理化的过程，由此激发了力争“拔头筹”胜利的行动动机。其次，乡村经济精英面临的社会结构有六个，分别是国家出台关于产业与民主以及“维稳”的正式性规范、政治锦标赛体制下高压性任务的连带责任、村内非正式性规范中“面子观”的约束机制、其他“征拆”维权案例所释放的警惕作用、地方政府所拥有的各项配置性资源、乡村经济精英积攒的经验型权威性资源。在诸多社会结构中，以关乎乡村旅游产业、民主与“维稳”等方面的正式性规范为影响最大的社会结构。这是因为相关正式性规范的出台一改乡村旅游发展边缘化的产业地位，而且也激发了地方政府、基层组织和普通农民发展乡村旅游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加了乡村经济精英行动自主性空间，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具有“柳暗花明又一村”色彩的社会结构。最后，在行动者自身特性和社会结构的双重作用下，乡村经济精英面对普通农民“摩拳擦掌”的积极创业策略、地方政府多重嵌入策略以及基层组织选择性“避责”策略而采取规则主导型的行动策略，即“两条腿走路”策略、柔性化争取策略和运用“韧武器”策略。所谓的规则主导型的行动策略是指在“变而求强”的行动者特性的影响下，乡村经济精英以国家、地方政府所下发的正式性规范为最重要的行动筹码，进而发挥其他社会结构的结构性作用，以此消除自身和部分社会结构对其行动的阻碍，最终取得了更高层次的“生活在乡”的行动结果。

第三，考察乡村经济精英在乡村旅游运营期内行动者特性、面临的社会结构和采取的行动策略。首先，乡村经济精英自身呈现出“遇挫求生”的行动者特性。乡村经济精英就如何保护本村不被征迁而进行反思，并借以“我们要吃饭”的理念完成行动的合理化过程，由此激发了“村在我在”的行动动机。其次，乡村经济精英面临的社会结构有六个，分别是国家对乡村旅游共生式发展的重视、N风景区打造文化休闲功能区的正式性规范的出台、村内“共同经济利益意识”的凝聚力、乡土文化重建所强化的村内非正式性规范的约束作用、Z村社会认可度和市场影响力的权威性资源再生产、乡村经济精英自身资源的再生产所形塑的地摘要 III 位。在诸多社会结构中，以地方政府出台的打造文化休闲功能区的正式性规范为影响最大的社会结构。这是因为管委会以打造文化休闲功能区为借口采取多番“征村”举措，从而直接危及了Z村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和Z村村庄的存续，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具有“树大招风风撼树”色彩的社会结构。最后，在行动者自身和社会结构的双重作用下，面对地方政府顺势退出策略、普通农民盲目闹大策略、基层组织暗中帮扶策略和管委会多番“征村”策略，乡村经济精英采取规则与资源双主导型的行动策略，即主动式默许策略、合理性分工策略、情理合作策略与依势化博弈策略。所谓的规则与资源双主导型的行动策略是指在“遇挫求生”的行动者特性的影响下，乡村经济精英充分强化与发挥自身因资源优势所形成的精英形象与作用，同时也充分利用规则和其他资源构建自身行动的合法性，以此实现“村在我在”的行动动机，最终强化了原先的“情感在乡”的层次。

第四，分析乡村经济精英参与乡村旅游发展中的“行动者——结构”互构，对乡村经济精英参与乡村旅游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进行界定，并提出乡村经济精英参与下乡村旅游治理变革的对策。首先，乡村经济精英自身呈现出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等多元化理性叠加的特征。因同一时期内不同理性因素之间力量对比存在差异，使得在同一时期内占据乡村经济精英主导性地位的理性因素有所不同。与此同时，生存理性是最基础的，与经济理性共同构成社会理性的基础，而社会理性一旦生成则会保障生存理性与经济理性的正向性。其次，乡村经济精英面临的社会结构呈现出多重地位性结构的特征。具体表现在以国家、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法规和政治锦标赛体制下连带责任为主的正式性规范占据政策导向的结构地位，以村内熟人信任机制和“面子观”机制为主的非正式性规范占据行动保障的结构地位，以社会现象和村内价值理念为主的表意性符码占据价值感召的结构地位，以乡村经济精英所积攒的资金与房屋、Z村所拥有的区位性资源、地方政府所拥有的各项资源为主的配置性资源加上以乡村经济精英所积攒的权威与经验、Z村乡村旅游产业认可度与影响力为主的权威性资源共同占据行动基础的结构地位。再次，乡村经济精英所采取的行动策略呈现出善变性与共生性的特征。乡村经济精英达成行动策略所依赖的行动筹码和所塑造的精英形象的强弱具有善变性特征，并且乡村经济精英行动策略所取得的行动结果和所构筑的关系类型呈现出共生性特征。基于此，乡村经济精英在参与乡村旅游发展中扮演了“善变”的“守村人”的角色，应采取多种措施发挥“善变”的“守村人”角色所附属的乡村旅游发展中多元行动主体间联结者与斡旋者的作用，进而有助于乡村旅游多元主体实现彼此利益共享共生的目标，以此推动乡村经济良善化发展。

质言之，乡村经济精英在乡村旅游发展中扮演了“善变”的“守村人”的角色，具体表现在乡村经济精英在参与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其自身呈现出多元化理性叠加的特征，其面临的社会结构特征表现为多重地位性，其采取的行动策略具有善变性与共生性特征，从而使得乡村经济精英在参与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善变”的“守村人”角色。为了确保作为当下乡村经济发展新业态的乡村旅游产业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目标，需正确认识与构建乡村经济精英的角色与权责制度，塑造乡村经济精英生成自身社会理性的条件，完善乡村经济精英参与乡村旅游发展所面对的社会结构，进而以乡村经济精英为联结者和斡旋者推动乡村旅游发展中多元主体合作对话、利益协商的实现。但是，应注意到在不同成长路径和不同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下乡村经济精英自身特性、所面临的社会结构的特征、所采取的行动策略的特征和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同质化，因此，关于乡村经济精英参与乡村旅游发展这一研究问题还具有可深入探究的学术空间与现实需求。

母职的再生产机制

——都市中等收入群体教育“拼妈”认同与实践研究

易彬彬

指导教师：叶南客

答辩日期：2020年9月

关键词：中等收入群体 密集型母职 结构 认同 主体性

摘要：本研究力图通过对NJ市中等收入群体内女性教育“拼妈”故事的深描，分析都市女性的母职角色认同形成过程及都市女性在教育“拼妈”中母职意识受到结构的形塑，“密集型母职”的话语意识渗透到中等收入群体内部，日愈成为一种整个阶层认同的实践意识造成了中等收入女性的焦虑。

中等收入群体女性基于家庭阶层再生产的动力和教育市场化转型的推力，同时受到国家政策、照顾体制、职场规则和家庭性别分工等结构性因素影响，自觉地内化“拼妈”意识，肩负密集型的教育母职责任。教育“拼妈”实质上是中产阶级再生产过程中资本转化为等级优势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施加在女性身上的“密集型母职意识”被绝大多数的中产认同，中等收入女性自己也被裹挟其中，并积极参与“密集型母职”的建构。在这种场域中，中等收入群体内部相互承认的竞争与自我延续的等级体系得以生产并循环往返，得以再生产。

根据不同生活情境中女性的认同及行动策略，笔者大致把城市中等收入女性的教养风格划分为四种类型：规划学业型、规划特长型、顺其自然型、纠结无奈型。不同的教养类型代表不同的母职实践，不同的母职实践背后是不同的母职认同。规划学业型妈妈精心规划子女学业发展，注重考试成绩，高强度地参与子女的成长，频密地参与子女的学校教育及课外班学习，通过精细化地管理子女的学习、生活时间安排，帮助子女获得良好的学业成绩。规划特长型妈妈注重子女个性保护，在教养过程中摒弃急功近利的应试教育，这一类型家庭往往能提供的社会、经济、文化资本更丰富。顺其自然型妈妈刻意为子女屏蔽竞争，制造“自然成长”的环境培养子女的独立性和创意，这一类型的家庭能提供足够的社会经济资本帮助子女适性发展。纠结无奈型妈妈受结构性条件制约，她们理性上权衡形势，竭尽全力想要做“理想的母亲”，但感性上容易陷入纠结与焦虑，自责囿于条件未能“善尽母职”。通过比较、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的母职实践主要受到家庭资本（经济、文化、社会等）的组成总量高低及代际支援、家庭内部分工等协作策略影响，尤其是亲职合作是影响母职实践的重要因素。

密集型母职对女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女性履行密集型母职与自我不可避免发生冲突。面对冲突，女性的行动策略大致分成：1.遵循传统，强调母职价值，牺牲主体性；2.追求平衡，肯定母职价值，放弃部分主体性；3.超越对立，重视主体性，创造性地把母职与自我融汇。

教育“拼妈”过程也是母职的再生产过程。“密集型母职”意识一方面使得女性主体性受到结构性因素的规训，另一方面女性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及行动策略也反身性影响家庭内部的分工结构、资源配置。政府积极落实友好型家庭政策，可以帮助女性缓解困境。女性主动构建中国新时代母职意涵，为超越自我与母职的二元对立提供了可能的途径。

候鸟式异地养老中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功能研究

陈际华

指导教师：黄建元

答辩日期：2020年12月

关键词：候鸟式异地养老 结构功能主义 国家 市场 社会

摘要：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业化的推进等，都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与行为。在交通条件日益便捷发达，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的今天，老年人口的迁移和流动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和大众性，移居的老年群体构成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老年人群体的移居也是经济发展、社会转型过程中养老方式多样化的必然结果。在此背景下，候鸟式异地养老应时而生。本文通过参与式观察、访谈等社会调查方法，选取海南省候鸟老人的主要聚集地点针对候鸟式异地养老开展田野调查，借鉴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分析其产生发展过程中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功能呈现及其调适。

社会在候鸟式异地养老发展过程中的功能，主要从社群、社团和社区等三个方面来实现。初到异地，候鸟老人倾向于以血缘、地缘和业缘等社会关系为基础形成各种类型的社群，通过社群的互动来进行抱团互助养老。候鸟老人通过在异地进行强连接关系的移植与弱连接关系的重构，通过内生性社会网络与外延性社会网络的建构，从而在新的生存空间“抱团”养老。从社会资本的缺失和补偿的视角，候鸟老人“抱团互助”养老，通过互帮互助有效补偿缺失的社会资本，获取稀缺的养老资源。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异地养老协会等类型社团的发展，不仅增加了候鸟老人的归属感，还有效整合了各种资源，为候鸟老人的异地生活提供更多的便捷和福利，提升其候鸟期间的生活品质，促进老人们的社会参与，帮助候鸟老人自我价值的实现。社区为候鸟老人搭建生活照料、文娱活动等各种平台，能够极大丰富候鸟老人在异地的生活，使他们实现在新的场域中更快地适应和融入。

市场功能的发挥首先体现在市场对候鸟老人的吸引。根据三亚等地候鸟式异地养老的发展过程，初始阶段，旅游市场吸引大量游客南下，使游客们对海南的环境有了直观感受，特别是身患慢性疾病的老年群体，对于海南的气候、环境等有了切身体会，萌生了来海南过冬的想法，对房地产、养老机构以及旅游市场产生大量需求，进一步推动了当地各类市场的发展。各类市场纷纷投其所好，吸引更多的候鸟老人前来养老。候鸟老人大量聚集之后，带来商机，推动和影响各类市场发展，同时也导致海南出现“冬暖夏凉”的半年经济现象。市场受到“看不见的手”的调控，在此过程中难免出现“失序”，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规范市场行为，引导市场有序发展。

从国家层面看待其在候鸟式异地养老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功能，可分为三个阶段。发展初期，海南省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得到全面提升，为大量候鸟老人落地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条件。快速发展期，海南推进国际旅游岛建设，这期间大量候鸟老人开始聚集，同时由于公共服务政策措施条件缺失与滞后，各方面的冲突与问题也层出不穷，例如医疗服务整体水平较低、异地就医结算不便、社会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等；与此同时，公共资源供求失衡、生态环境变差、基础设施不完善、城市管理水平较低等城市病凸显。过渡到平稳发展期即2016年以后至今，针对前一阶段候鸟式异地养老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方面问题，政府出台推进异地就医结算、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发展健康养生养老产业等相关政策、措施，力图充分发挥其扶持、调控与主导的关键作用。

候鸟式异地养老产生发展的初期，政府政策滞后，功能发挥有限；各类市场发挥着较强的吸引作用，客观上推动了候鸟式异地养老群体的发展壮大和候鸟式异地养老的发展；社会方面，社群发挥主要的支持功能，候鸟老人主要通过自发地抱团养老，共同面对异地养老期间的诸多问题。候鸟式异地养老快速发展期，政府政策逐步跟进；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继续发挥其资源配置功能，市场“失序”等问题大量出现；社会方面，除了候鸟老人通过社群抱团养老以外，各地的异地养老协会等社会组织开始涌现，社区的功能也逐步增加。候鸟式异地养老进入平稳发展期，国家、地方政府层面的相关政策文件大量出台，主导化解公共服务等领域出现的问题，加强调控市场由“失序”走向规范；社会方面，社群功能持续发挥作用；各类型异地养老协会等社会组织发展壮大，在国家的扶持下功能得到拓展；社区等功能进一步完善，多方共同促进候鸟老人社会融入，提升其在候鸟式异地养老期间的生活质量。

从候鸟式异地养老发展至今的过程中分析可见，国家、市场和社会在不同阶段的功能呈现各异，而且发生调适。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先行，国家的调控、主导在后。初期，市场凭借敏锐的“嗅觉”先行发展，当市场“失序”、公共服务缺失和滞后等问题凸显之后，国家发挥主导功能，化解公共服务等领域出现的问题，加强对市场调控，促进候鸟式异地养老平稳发展。国家和社会之间，从初期社会组织自觉发挥自身功能，到后期的国家大力扶持，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拾遗补缺的重要作用，由此进一步推动候鸟式异地养老的平稳、可持续发展。

政府、社区与民间志愿团体： 南京文化志愿服务的运行机制研究

李惠芬

指导教师：叶南客

答辩日期：2020年12月

关键词：社会治理 文化志愿服务 社会网络 社会资本 运行机制

摘要：社会治理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框架内考察各种主体元素之间关系调整与变迁的一种实践。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之一，以融入社会日常生活方式养成共同价值规范的志愿服务成了衡量一个国家、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在中国话语语境下，多元主体参与的志愿服务是我国志愿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普遍实践，已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升到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行的高度。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借治理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以南京为研究区域，通过对4支市内重点文化志愿服务团队的跟踪研究，结合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探究文化志愿服务多元主体如何在“了解-认知-认同参与”的渐进过程中实现社会治理的参与，把握志愿精神的认同和自我文化的再生产运行机制。进而为进一步理解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解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志愿服务多元共治机制提供研究视角，并为形成“治理文化化”视角下文化志愿服务理论本土化的实践逻辑提供鲜活案例。

本研究认为，不同的身份，决定了不同志愿服务组织的角色定位。在多元共治框架下，政府逐渐把一部分治理空间让渡给志愿者等社会组织，并不断调适身份定位，从行动的组织者转变为合作者，从控制型的管理者转变为合作型的治理者，但以行政组织为代表的国家权力在志愿服务建设中一直都“到场”并“在场”，从未缺席。带有行政性元素的社区居委会，在承接上级部门指派任务的同时也构建着社会治理的共同体空间，与政府、民间社会组织共同形成了共生性依赖关系，搭建了由“社区工作者-专业社工-社区网格员-社区文化志愿者”参与的互联互通式基层社会“四社”治理系统。民间文化志愿团体为获取政治、社会的合法性身份和参与社会治理的技术资本，采取了纳入行政、嵌入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文化志愿者在参与社会治理时体现了“来自政府，但又限于政府的一套机构和行为过程”，但“志愿冷淡”现象普遍。在文化志愿者参与社会治理这一场域中，多元主体对社会资源要素的利用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实现着志愿服务运行机制的协调有序运行。

本研究尝试从社会治理与社会网络的理论视角理解文化志愿服务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共治重组逻辑，并对社会治理中的不利于志愿场域、志愿惯习形成的体制机制障碍等问题进行反思。本研究认为，在“后志愿服务”时代，培育志愿服务精神与社会责任感，将志愿服务变成个体的“惯习”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实现这一目标，让文化志愿服务完成“文化符号所承载的进化论话语体系、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以及社区集体规范的规训”是今后文化志愿者实践与理论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这不仅是政府、志愿组织与志愿者的义务，也是研究者的责任，更是我们的使命。

家族企业接班人建立权威的过程研究

——以青岛市 A 纺织公司为例

任宇东

指导教师：王毅杰

答辩日期：2020 年 12 月

关键词：家族企业接班人 权威 接班历程 基层模式 权力与威望

摘要：家族企业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自诞生伊始，其代际传承问题便成为了学者们关心的重要话题。代际传承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也是一个涉及企业内外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复杂过程。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是指创始人将企业所有权与管理权过渡、转交给下一代的过程，过程中权威的更替与重建是决定传承能否成功的核心要素。在现实的传承实践中，接班人建立权威并非一帆风顺，极易面临“难以服众”的困境。权威不足不仅会影响家族延续与财富传承，还会影响企业长远发展，重建接班人的权威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的研究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

在家族企业场域中，代际传承表面上是所有权和管理权的转移与过渡，实质上是一个重建权威的问题。以往研究关注更多的是接班人权威要素的来源与构成，对于接班人建立权威的过程以及拥有权威要素后如何在企业中形成真实权威，这一作用机理被发掘的不够。基于此，本文以青岛市 A 纺织公

司为例，运用案例研究法，并结合“接班阶段—认可主体—权威要素”的分析框架，来总结基层模式中家族企业接班人建立权威的过程，试图解释家族企业权威系统得以重建、转变与更替的内在原因。文章创新点是将家族企业权威作为一个系统进行研究，通过论述权威系统与家族系统、企业系统以及外部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来阐释家族企业接班人建立权威的过程性机制与内在机理，在动态变化中找出利益相关者的认可方式与行动逻辑，从而找寻影响传承行为及结果的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按照接班人对家族企业经营管理的涉入程度，以进入公司为起点、担任董事长为终点，接班进程可分为初步参与、共同治理及独立经营等阶段。不同阶段会面临不同的约束条件，对接班人的目标要求会不同。而接班人权威的建立实质上是不断被利益相关者认可的过程，这个认可过程可以被细分为：认可主体（即利益相关者）与权威要素（即认可依据）。在不同阶段，认可主体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权威要素的表现形式也不一样，接班人会在优先考虑获取某种权威要素，来获得某个重要主体的认可，进而形成与之匹配的权威路径。具体来说：

首先，在初步参与阶段，家族企业接班人面临创始人认可、经验不足、融入公司等问题，通过展示工作能力、工作态度、道德品质等要素，来获得对其个人属性的认可和钦佩。而到了共同治理阶段，接班人虽然已获得了组织所赋予的管理权，但仍需要创业元老、家族成员、管理层及员工的认可与支持。一方面，他通过软硬兼施、走情感路线、划地而治等方式，兼顾情理法，依靠亲和力赢得了信赖，重建了相互信任的关系，获得了他们的支持；另一方面，他通过应对金融危机、投入研发、引进“6S”管理等方式，让元老、家族成员、管理层等看到了其危机管理能力与组织能力，树立起威望。最后，在独立经营阶段，经营绩效如何、有没有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等是衡量继承是否成功的核心要素，企业系统如管理者、员工与外部系统如合作厂商、政府及社会团体是最重要的认可主体，需要展示工作能力、社会资本、仁慈等要素。而接班人通过对内治理与对外经营相结合，建立起贯穿内外的关系网，展现了宏观把控、独当一面的能力，获得了企业内外部系统的认可，对公司整体的把控能力得以增强，也强化了威望。这一阶段意味着交接传承基本完成，形成了以接班人为中心的权威体系。

家族企业接班人建立权威的过程也是一个由表到里、由内而外的过程，内含多重行动力量。这一过程不仅是一个涉及企业系统、家族系统与外部系统的多重过程，还是一个重建、更替与转变权威系统的过程，融合了家族权威与科层权力。权威系统的多元性、动态性、层次性与家族系统、企业系统及外部系统融合在一起，进而形成了一个复杂而动态的运行体系。文章还进一步发现，接班人权威得以建立的根本原因是获得了合法性。此外，接班人所建立的权威兼具韦伯意义上的“正当性”与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合情合理合规”，努力实践着“义”与“利”的平衡，是个人领导权威与组织权威的混合体，也是情、势、理相结合的产物。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重点是以经验案例为依据，运用社会学理论剖析接班人建立权威的过程及背后的作用机理，为破解家族企业的“传承之困”提供理论指导与现实参照。目前，中国大陆家族企业仍面临接班人选择范围有限、职业经理人信任不足、融资困难、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都对未来的交接传承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如何让企业成功传承成为了创业者们普遍思考的重要命题。无论如何，家族企业顺利接班并完成转型与升级，是他们都要面对的生死攸关的挑战，但挑战也意味着转机。本研究希望为还在路上的家族企业，提供一些借鉴和思考。

环境治理压力下污染型乡镇企业的行为演变

——安镇水泥产业案例研究

王 昭

指导教师：陈阿江

答辩日期：2020 年 12 月

关键词：环境治理 社会焦虑 过度治理 乡镇企业 企业行为

摘 要：当今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达到空前的重视程度。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高污染工业，如水泥、钢铁、玻璃等进行转型升级势在必行。在环境政策规制下，污染工业如何应对以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成为学界关注的议题。本文以河北省安镇的乡镇水泥企业为案例，在扎实的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梳理基础上，通过对改革开放后不同阶段环境治理压力下乡镇水泥企业的行为演变进行考察，从社会焦虑的视角探讨乡镇工业污染治理的社会心理与文化机制，为推进环境治理建言献策。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主要的社会矛盾与社会需求有所差别，由此产生相应的社会焦虑心态，环境治理压力的强弱程度相应变化，从而影响环境治理的方式手段，以及各个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应对行动。从这个角度出发，安镇水泥产业的环境治理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改革开放初期至 20 世纪末，中国的经济处于起步阶段，因此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对而言环境保护尚未受重视，环境治理的压力较弱。在此阶段，安镇的乡镇水泥企业迅速发展起来，同时其简单经济理性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但是地方政府、当地村民与乡镇水泥企业之间结成了“政-企-民”利益同盟，对乡镇水泥企业的环境污染抱持保护、妥协、纵容的态度。

20 世纪末期至 2012 年前后，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出，国家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有所提升，环境治理的压力有所增大。但是“政-企-民”利益同盟的基础并未动摇，因此面对国家针对水泥产业先后进行的技术驱动与资本驱动的两次环境治理行动，水泥利益共同体采取了政策变通的应对方式，继续生存与发展下去。

2012 年之后，国家进入了环境治理的新阶段，尤其在面临雾霾等重大环境问题时，环境焦虑成为主流。在国家自上而下的大气环境治理运动中，水泥利益共同体的基础破裂，地方政府转而开始“一刀切”全面清理乡镇水泥企业。尽管乡镇水泥企业通过“诉苦”与“生产游击战”的方式进行反抗，但是在地方政府“软硬兼施”的手段策略下，最终被消解，被迫全面关停。进入后水泥经济时期，安镇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是地方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地方政府与企业主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寻求经济转型，但最终陷入转型困境，出现了隐性失业、村落空心化等社会问题。

可见，安镇水泥产业的环境治理经历了从过度污染到过度治理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水泥企业行为呈现出逐渐被动化的趋势。因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及环境污染问题的不断加重，追求生活质量的社会需求促使整体的社会焦虑发生从发展焦虑到环境治理焦虑的转变，并且在经过体制层级与地缘结构的传导后得到强化，地方政府倾向于选择刚性、激进的过度治理方式，水泥企业行为选择的主动性就被不断削弱。

因此本文主要揭示了环境治理的社会心理与文化机制，对过度治理的产生与运行进行了全面剖析与反思，并且提出应当探索、寻求一种能够实现经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性环境治理方式。

2020——2021 年度河海社会学 田野奖学金获奖名单

获奖人姓名	年级	文章题目	获奖等级
孟 皓	2018 级博士	民族地区家庭养老支持力的身体塑造与具身实践	特等奖
徐依婷	2018 级博士	丧偶式育儿：城市新生代母亲的母职困境及形成机制——基于儿童照顾性别框架的研究	特等奖
张晓芸	2019 级硕士	基层政府治理中的公众参与问题——以山东省 C D 县“合村并居”为例	一等奖
孙舒然	2019 级硕士	养老设施何以邻避？——S 市 H 社区康养中心的困局	一等奖
秦祥瑞	2017 级博士	垃圾分类试点的社区参与分化与政府主导定位——基于 BN 市的实证分析	一等奖
汪 璇	2019 级博士	污染企业的“漂绿”实践及其逻辑——基于 M 牧场沼液污染的经验研究	一等奖